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UK | CHINA | MALAYSIA



四川農業大學
SICHU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ooperative Ecosystem to Empower Small Farmers in the Poor Areas of China: Case Studies of Sichuan

中国欠发达地区合作社生态系统与小农赋能四川案例研究

诺丁汉大学全球挑战研究基金试验项目结题报告

武斌 傅新红 王西瑶 张社梅 齐顾波 丁昭 耿宝江 等

2020 年 12 月



CIDGA
国际发展与全球农业学院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GLOBAL AGRICULTURE



友成企業家扶貧基金會
China Social Entrepreneur Foundation

报告撰写人员

主笔：武斌

撰写人：傅新红 王西瑶 张社梅 齐顾波 丁昭 耿宝江 汪亦兵 高雯雯 申云 刘宇荧

参与撰写人员（按照姓氏拼音排序）：

廖露 曾丽萍 邓碧旂 蔡诚诚 黄悦 梁景智 莫经梅 廖昱颖 罗磊 彭洁 徐驰 杨勇 杨道川 朱嘉心 陈锐 廖倩 章睿馨 陈吉平 张警晔 楼宇晴

责任编辑：叶葳 牛德梅

特别致谢

本项目的准备和成功申请同下列人员的支持直接相关：诺丁汉大学研究创新部国际发展处主任 Maeve Fitzpatrick 女士，亚洲商务中心副主任 Min Rose 女士；诺丁汉大学未来食品卓越研究团队主任 David Salt 教授；诺丁汉大学商学院副院长 Scott McCabe 教授，Kim Tan 教授；创新创业中心主任 Simon Mosey 教授；诺丁汉大学生物学院助理教授杨妮博士；宁波诺丁汉大学商学院助理教授王仪博士；天津财经大学张丽艳教授，常德市农村合作经济管理局前局长张业湘；国务院参事、友成社会企业家基金会副理事长汤敏博士，友成社会企业家基金会秘书长零慧；中国合作经济学会秘书长刘洪林；四川农业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蒋远胜。我们特别感谢下列人员对本项目实施提供的支持和帮助：诺丁汉大学前助理副校长 Richard Masterman 博士，诺丁汉大学亚洲商务中心主任 Jason Feehily 先生；四川省委组织部省校合作办公室主任彭强；国家林业局林业经济研究中心刘璨教授；诺丁汉大学商学院创新创业中心副主任 Hannah Noke 博士，研究主任 Lorna Treanor 博士，研究创新部国际发展处项目经理 Joanna Green 女士；诺丁汉大学商学院 Janine Sey 女士，Elliot Baker 先生；四川农业大学国际合作处夏新蓉处长，陈庆副处长。

目录

执行摘要	1
1 导论	6
1.1 全球挑战研究基金项目（GCRF）	6
1.2 合作社生态系统的概念框架	8
1.3 本项目内容和设计	9
1.4 本报告的结构及主要内容	12
2 项目背景	14
2.1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政策环境的演变	14
2.2 四川农村发展的背景情况和挑战性问题	19
3 项目学术论文详细摘要	25
3.1 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生态系统的建构—四川案例研究	25
3.2 生态系统视角下贫困地区政府介入与合作社发展—黑水中蜂合作社案例	26
3.3 政府介入与土地股份合作社生态系统发展：崇州案例研究	28
3.4 生态系统视角下城市志愿者参与绿色农业和农民合作社发展的路径研究	30
3.5 生态系统视角下的中国贫困地区农村金融信贷与合作社发展的纵向研究	31
3.6 中国农村合作金融生态系统创新——四川“旭力”和“群力”模式的比较研究	33
3.7 社会组织主导的扶贫干预生态统一以友成基金会妇女电商培训案例研究	34
3.8 中国贫困地区科技小院生态系统与人才培养—布拖马铃薯科技小院案例	36
3.9 生态系统视角下高校团队支持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社区发展的案例研究	38
3.10 中国边缘地区逆向移民与乡村旅游发展—乡村旅游生态系统的建构	40
3.11 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创新模式与大学生返乡创业—四川藏区案例	42
4 社会影响报告	44
4.1 四川凉山州马铃薯产业化国际化研究示范项目	44
4.2 四川阿坝高端蜂蜜产业化国际化研究项目	49
4.3 四川边缘地区乡村旅游的社区发展与大学生参与	53
4.4 西部自然保护区的社会创新与社区可持续发展	57
4.5 中国贫困地区生态农业发展与社会生态建设	60

5 学生能力发展报告	64
5.1 参与学生问卷调查报告	65
5.2 参与学生心得体会报告	68
6 主要结论和政策建议	76
6.1 主要结论	76
6.2 政策建议	80
7 附录	82
7.1 诺丁汉大学-四川农业大学全球挑战研究基金项目团队简介	82
7.2 布拖马铃薯产业化联合考察报告	86
7.3 黑水蜜蜂产业化考察报告	87
7.4 项目博客发表目录和链接	90

执行摘要

本项目的主题是“中国农民合作社生态系统与小农赋能—四川案例研究”项目(以下简称“合作社生态系统研究”),它是诺丁汉大学承担的英国政府资助的“全球挑战研究基金”(GCRF)的试验示范项目。本项目的总目标是:基于中国特别是四川省合作社过去十年来的探索实践,理解合作社生态系统的构成、演变、类型及其对合作社存续和发展的影响,并通过建构一个利益相关者之间交流合作平台,共同探讨贫困地区改善合作社生态系统的路径,为实现本地区产业振兴、脱贫致富、农村可持续发展提供创新的思路和政策建议,为强化中英两国之间、诺丁汉大学同相关高校/研究机构/社会组织之间,在农村可持续发展领域的研究合作和人才培养做出贡献。

本项目由英国诺丁汉大学商学院海顿格林创新创业中心高级研究员武斌博士总负责,四川农业大学管理学院院长傅新红教授为四川农业大学项目团队协调人,项目参与方包括:四川农业大学(经济学院、管理学院、农学院、旅游学院),中国农业大学,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宁波诺丁汉大学(商学院)。

基于合作社生态系统概念和本项目的总体目标,本项目执行设计包括三个关联维度和目标:

1. **研究目标:** 针对四川省特别是四川贫困地区农村发展所面临的挑战性问题,揭示不同类型合作社生态系统对当地主导产业和农民生计的影响,探讨产业振兴和合作社发展的创新路径及其政策建议。研究发现以 11 篇学术论文详细摘要的形式呈现。
2. **社会影响目标:** 搭建利益相关者合作交流平台,围绕挑战性问题或共同感兴趣的主体,发展政策建议和行动方案,促进本项目研究成果的扩散和参与方的能力建设。社会影响成果以 5 篇社会影响报告的形式呈现。
3. **能力发展目标:** 着眼于参与本项目的大学生、研究生群体,培养他们以挑战性问题为导向的学术思维习惯、跨学科的综合思考能力、同利益相关者的交流沟通能力和面向不同读者群体的书面表达能力,其成果通过对参与学生的问卷调查和他们的项目参与体会报告来反映。

研究发现部分的 11 篇学术论文依其研究对象不同,可以分为 5 组论文。开篇论文是有关中国贫困地区合作社生态系统的理论模型建构,基于四川省贫困地区合作社发展所面临的挑战性问题和本项目的实证研究成果,概括出不同类型合作社生态系统的要素构成、整体特征及其对合作社发展的影响。

第二组共 3 篇论文，基于不同的地理条件和经济发展环境，分别从地方政府介入和城市志愿者嵌入两种外部干预方式入手，通过养蜂合作社、土地股份制合作社和水果合作社三个成功案例，揭示了合作社生态系统的不同类型及其对合作社发展的影响，指出了外部介入成功的条件和合作社可持续发展的路径。

第三组 2 篇论文聚焦于农村金融信贷这一制约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关键问题，通过对国家扶贫攻坚 5 年来贫困地区农村金融信贷领域的政策变化及其各地利益相关者的探索性实践，分别从纵向（样本涉及 4 省 10 县 180 个合作社的农户参与）和横向（两类金融合作模式比较）两个侧面，揭示了不同类型农村金融合作生态系统的变化及其对合作社发展的影响。

第四组论文共 3 篇，从贫困地区人才短缺和发掘内生动力的角度，揭示非政府组织、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在建立和培育新的生态系统，带动当地产业振兴和农村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特殊价值、成功条件、扩散路径。

第五组 2 篇论文基于在四川藏区乡村旅游和返乡创业企业家成长的田野调查和案例研究，分别从第三世界边缘地区乡村旅游生态系统的理论模式建构和社会资本在克服人才短缺瓶颈两个方面，提出了不同类型的生态系统中发展乡村旅游的模式路径、企业家素质要求、成功案例及其模式扩散条件。

社会影响报告部分共 5 篇短文。开篇报告从马铃薯在四川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口粮和生计保障的战略地位出发，总结了本项目在建构多学科、多层次参与的社会创新网络和国际合作平台方面的战略思路、主要活动，以及推进凉山州马铃薯产业化、国际化及其相关人才培养等方面的社会影响路径。

第 2 篇报告从四川阿坝州发展养蜂主导产业的资源优势、环保和扶贫效益等方面，总结了本项目在搭建多方参与的合作平台、成功建立邛崃蜜蜂科技小院、发展多学科跨部门研究团队的活动进展情况，提出了推进阿坝高端蜂蜜产业化、国际化的战略思路及其影响路径。

第 3 篇报告从四川贫困地区乡村旅游社区发展的人才短缺这一挑战性问题出发，总结了本项目对参与大学生、研究生在思想观念转变、生态系统思维发展、田野调研方法论提升、建立高校—旅游社区发展试验示范基地等方面所取得的成果，和未来进一步扩大本项目社会影响的努力方向和思路。

第 4、5 两篇报告分别从西部环境生态保护区的环境教育和有机农业发展的角度，揭示了社会创新和国际参与对中国西南贫困地区生态环境保护、有机农业发展、弱势群体赋能及其农村可持续发展的作用，提出了通过发展同诺丁汉大学战略伙伴关系，推动中英两国在中国西南贫困地区乡村旅游和生态农业领域的发展互惠合作关系，进而扩大本项目社会影响的思路、路径和具体建议。

学生能力发展报告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参与本项目的四川农业大学和中国农业大学的大学生、研究生进行的线上问卷调查报告，反映受访学生的项目参与方式、对本项目能力发展目标的理解及其接受认同程度，以及他们对本项目学生能力发展的总体和具体目标的打分评估结果。第二部分是学生提交的参与项目的体会报告的摘要选登。

就本项目的研究目标而言，报告中收录的 11 篇学术论文的研究发现或结论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 贫困地区合作社发展研究不能套用西方合作社发展理论，简单排斥政府介入。有必要引入“合作社生态系统”的概念，以便充分考虑各类环境因素、条件对当地农民合作社发展的制约性，理解合作社发展路径及其动力机制的多样性。
2. 贫困地区合作社发展中形成政府主导的合作社生态系统有其合理性，但政府主导并不是唯一的生态系统。本报告展示了社会组织主导的（友成基金会案例）、高校嵌入式的（如“专家大院”、“科技小院”）和城市志愿者发起的合作社生态系统。从合作社生态系统角度，有助于概括中国近 5 年来“精准扶贫”、全社会参与对贫困地区合作社发展和农民组织赋能方面的经验，为下一阶段的乡村振兴和农村可持续发展研究提供理论依据。
3. 反映四川省和其它贫困地区合作社发展、产业振兴的最新发展，本报告的研究范围覆盖不同产业（如：主粮生产、马铃薯、蜂蜜、水果、乡村旅游、电子商务等），合作社发展的关键问题（如：土地流转、金融信贷、人才培养、科技服务），不同少数民族地区（如：四川藏区、凉山彝族、云南瑶族等），不同群体（如：妇女赋能、大学生返乡创业）和不同方式的外部介入（如：地方政府直接参与、社会组织技能培训、城市志愿者嵌入、高校的“科技小院”与“专家大院”等），这不仅说明合作社生态系统概念框架的方法论价值，而且为相关领域的深化学术研究和理论发展提供了参考文献。
4. 本项目研究的贡献并不局限于中国贫困地区合作社和经济社会发展研究，而且对探索从第

三世界挑战性问题出发的跨学科、全方位和利益相关主体参与的学术研究具有方法论方面的启示意义。这是因为，只有生态系统概念才能最大程度的吸纳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不同专业的研究范式，也便于吸收和总结来自不同利益相关者（包括普通小农群体）的声音、诉求、尤其是经常被学术界忽略的本土知识和草根创新经验。

就本项目社会影响目标而言，本报告可以得出如下结论。首先，从贫困地区发展中所面临的挑战性问题出发，才能有效地吸引相关政府部门、企业家、合作社领导人和非政府组织的项目参与和积极配合，为搭建相互信任、有效交流、密切合作的创新平台提供坚实的基础。

其次，贫困地区挑战性问题的解决需要多学科（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工程技术和管理学科）、多主体通过搭建合适的交流沟通平台，发展出具有创新性、可操作性、兼顾不同主体利益、可持续性的发展愿景及其合作线路图，为下一步各方相向而行提供指南。

第三，本项目社会影响的突出贡献，在于明确指出了社会创新和社会组织/企业对于解决挑战性问题和产业化发展的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第四，国际化是本项目的多个领域社会影响中的共同要素，它为发展和强化中英两国间围绕本地区优质、特色农产品/服务出口方面的合作，实现双方互利共赢，勾画了清晰明确的愿景和路线图。

最后，本项目搭建了一个跨专业、跨高校、跨国界的大学生农村创新创业、可持续发展合作平台，涉及诺丁汉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四川农业大学和宁波诺丁汉大学，和友成基金会和丹巴森林学校等社会组织/企业的参与。

就本项目学生能力发展目标而言，本报告可以得出如下结论：首先，本项目为诺丁汉大学同四川农业大学和中国农业大学上百名学生参与提供了机会，也为进一步发展省校合作（四川省-诺丁汉大学）合作、校校合作（诺丁汉大学-四川农业大学，诺丁汉大学-中国农业大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其次，本项目学术能力发展的四个方面的目标（挑战性问题导向、跨学科思维、跨界交流能力、科研创新能力）被证明是合适的和可行的，已得到大多数参与学生的认可和接受。再次，参与学生对以挑战性问题为导向的学术研究和社会实践活动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并对此给予高度的评价，对农业高等教育系统的改革提供了新的思路。

最后，本项目所搭建的利益相关者参与的平台，对于参与学生发展跨学科、跨界交流能力作用明显，也为发展和强化大学与社会的交流互动，鼓励大学生、研究生发展以贫困地区的社区发展为主题的学术研究和社会创新实践活动，提供了案例参考。

基于研究发现，本报告建议中国的相关部门、企业、机构等：

1. 应以小农赋能赋权的核心、以发展本地区具有资源和市场比较优势的特色产业为主线，强化合作社生态系统和网络平台建设，创造有利于小农之间合作共赢的社会舆论、资源匹配、多个利益相关者相向而行的环境条件；
2. 地方政府应着力于启动、创造和完善有利于本地区合作社发展的生态系统建设，善于调动资源，把握介入的节奏、力度；
3. 应用合作社生态系统概念，总结近 5 年来合作社扶贫的成功案例，揭示政府介入成功的条件和失败的教训，发展出一个适用于贫困地方政府介入的指标体系和系统管理软件；
4. 应大力提倡非政府组织、高校和研究机构、城市志愿者团体参与乡村振兴和合作社发展，并为此提供政策和政府财力支持。

就发展中英两国商贸、科技、教育和人文领域的交流和合作而言，本报告建议：

1. 建立一个中英农村发展创新研究合作网络，以便客观、系统地总结中国西部地方政府主导、全社会参与的扶贫模式，及其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启示意义，促进中国、英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围绕食品安全、有机农业、乡村旅游、合作社发展等领域发展研究合作；
2. 在中国西南部建立若干中英合作有机农业、特色农业、乡村旅游试验示范特区，共同探索生态农业产业化、国际化和合作社同步、协调发展的路径及其机制，引领本地区乡村振兴和可持续发展，也服务于第三世界农村合作社领导人和企业家培训；
3. 借鉴和总结全球挑战研究基金项目经验，在中英两国牛顿合作基金和其它双边研究项目合作中，增加跨学科、问题导向和用户参与的内容，以便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的乡村振兴的人才培养和第三世界农村的可持续发展。

1 导论

随着中国精准扶贫工程进入尾声，欠发达地区农村如何巩固脱贫成果、实现产业振兴和合作社持续发展，是摆在社会各界包括学术界的挑战性课题。基于英国全球挑战研究基金的项目设计要求，结合四川脱贫攻坚和合作社发展的实践，本章旨在提出一个有关中国欠发达地区合作社生态系统的概念框架，本项目的设计思路、实施目标、主要成果和本报告的内容简介。

1.1 全球挑战研究基金项目（GCRF）

自进入 21 世纪以来，国际社会对第三世界农村贫困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由联合国出面隆重推出两个全球性的联合行动计划：“千禧年发展目标（2000-2015）”和“可持续发展目标（2016-2030）”。在阻碍第三世界农村消除贫困和实现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诸多挑战性问题中，首当其冲的是解决 5 亿小农赋能赋权问题，使其能够更好地适应和融入外部大市场，提高能力、发出声音并维护自己应有的权益。小农问题其所以如此重要，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是第三世界三分之二（约 20 亿人口）的贫困或低收入家庭的生计来源，另一方面是因为，在帮助小农学习技术、提高产品质量和附加值、强化市场竞争力等方面，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被认为是最为有效的组织路径之一，但至今进展缓慢、成效有限。比较西方发达国家约 40%的人口参与或受益于各类合作社组织，第三世界国家合作社的人口参与率不到 10%。如何通过合作社的发展来把第三世界小农组织起来，实现脱贫致富和可持续发展目标，便成为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重大课题。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是世界上小农最多的国家，现有 2.3 亿小农，约占全球小农的一半。经历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在工业化和城市化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但以家庭经营为主体的小农经济将长期存在，实现农业生产规模化、机械化、现代化目标任重而道远。为了解决小农问题，中国政府自 2007 年以来，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法律法规，力图在农村各类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实现了合作社的“高速增长”。截止到 2019 年 10 月，全国注册的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社达到 220.3 万家，实际利用农民专业合作社服务和培训的农户突破 1.3 亿户，占到全国农户总量的 50.1%。在肯定合作社发展成绩的同时，也要看到合作社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许多地方存在着重合作社发展的数量而轻合作社发展的质量；有些合作社徒有其名，发展不规范，或为少数“精英俘获”，排斥普通小农参与。此外，合作社发展中也存在着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相对应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贫困地区合作社发展起步晚，数量少，水平低。

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关系最为密切的是贫困地区的合作社发展及其在减少贫困中的作用。在这方面，中国政府近五年来在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大规模开展的精准扶贫工程，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研究价值。因为在政府主导、全社会参与的精准扶贫工程中，合作社发展已被列为重要的考核指标之一，通过政府扶贫资金和对口单位参与等多种方式，帮助贫困村和贫困户建立和发展合作社，发展专业化规模化生产，强化同外部市场的对接能力。截止 2020 年 6 月底，全国贫困地区（832 个贫困县）共建立农民专业合作社 68.2 万家，覆盖 90% 的贫困村，直接带动 2197.8 万余名贫困人口脱贫增收 (*People Daily*, 29 July 2020)。随着中国精准扶贫工程进入尾声，欠发达地区农村如何巩固脱贫成果、实现产业振兴和合作社持续发展，是摆在社会各界包括学术界的现实和挑战性课题。而中国政府在贫困地区消除贫困，促进合作社方面的探索实践，也为第三世界的减贫和合作社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参考。

作为对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响应，英国政府于 2015 年联合其国家研究创新基金会和海外发展署，投资 15 亿英镑设立了“全球挑战研究基金(GCRF)”的专项研究资助计划，旨在支持应对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挑战问题的前沿研究。不同于常规研究资助项目，本计划强调以发展中国家挑战性问题为导向的跨学科研究，建立和发展研究合作伙伴关系，增强在英国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研究、创新和知识交流的能力。在全球挑战研究基金的执行上，诺丁汉大学对申请参与团队提出了具体和明确的要求：1) 有清晰的愿景思路、综合计划和可测量的项目影响指标；2) 具备为研究对象所在的地区、国家所面临的挑战性问题提供解决方案的潜力；3) 有能力面对现实挑战性问题开展有意义、综合性和跨学科研究；4) 紧扣某一个或多个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清晰地展现所设计项目的贡献方式；5) 将开创性的研究设计同对当地社会、政治、经济、历史和文化背景的更好理解相结合。

围绕合作社发展来解决第三世界小农的赋能赋权这一挑战性问题，本项目被诺丁汉大学遴选为全球挑战研究基金系列的试验示范项目，通过对中国农村合作社发展经验的梳理，特别是对不发达地区合作社发展在组织小农学习技术、对接市场和扶贫帮困中的作用开展跨学科研究，为解决中国和其它第三世界国家贫困地区的合作社发展和小农赋能方面提供新的思路、平台和路径，并通过一定规模的试验示范行动，展示其研究成果的可行性、应用推广潜力及其社会影响。本项目于 2019 年 8 月批准立项，原计划 2020 年 7 月底完成，因全球新冠疫情爆发，推迟到 2020 年 12 月底完成。

本项目由英国诺丁汉大学商学院海顿格林创新创业中心(HGI)高级研究员武斌博士主持，四川农业大学管理学院院长傅新红教授负责川农大项目参与团队的协调。项目参与方包括：四川农业大学(经济学院、管理学院、农学院、旅游学院)，中国农业大学，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宁波诺丁汉大学(商学院)。

1.2 合作社生态系统的概念框架

本项目的研究基础和理论创新在于，提出和应用“合作社生态系统”的概念，理解中国近年来在合作社发展方面的探索实践，揭示不同地区、不同类型合作社在生态系统方面的差异性及其对合作社发展路径和小农参与的影响，并以此来设计相关的多主体合作平台和社会影响项目。

“生态系统”一词源于生态学，特指在自然界的一定的空间内，生物与环境之间的关联互动形成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统一整体，并在一定时期内处于相对稳定的动态平衡状态。生态系统强调不同类型要素、群体间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形成的相互依赖、不断演化的整体性，它为跨学科之间的相互交流合作提供自然科学的基础，也为人文、社会和管理科学的参与，以及自然和社会科学的结合提供了方法论的依据。不同于分析分解式的学术研究传统，生态系统代表着一个新的科学研究范式，它强调：1) 系统/整体思维，通过宏观-微观-宏观的过程，抓住研究对象的本质/关键性要素；2) 强调系统的开放性和自组织性，通过不断吸取负熵流，保持系统的稳定性，并为进化发展创造条件。

生态系统的思想和方法为研究第三世界合作社发展提供重要的基础和依据，它要求客观、全面、系统地看待和研究合作社现象，理解其复杂性、多样性和开放性特征，从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为合作社的发展创造条件，抓住机遇。在本报告中，“合作社发展”是指少数个体农户逐步接受合作社思想，志愿参与生产、经营、销售等环节的互助合作，逐步发展出内部稳定的互信、互利、互惠的集体行动和民主决策机制，对外交往、合作的集体意志和统一行动，进而吸引更多农户加入其中，或采用相似的方式组建自己的组织。本定义强调：1) **农民的主体地位**，以农民的志愿联合和自主决策为基础；2) **渐进过程**，合作社发展是个体小农学习、理解、接受进而自觉运用合作社原理，来协调内部利益关系，逐步形成集体意志和统一行动的过程；3) **整体相关性**，合作社形成和发展的基础是农村社区内部农户之间互信、互利、互惠关系，并通过经济上的互助合作实践得以加强和升级，逐步形成公平分配和民主决策的相对稳定的整体；4) **系统开放性**，合作社思想源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它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的小农思想，需要农民不断学习、适应和比较才能逐步接受，因而合作社发展，尤其是它的起步阶段，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外部刺激或诱导条件；5) **自组织增长扩散**，一个适应当地环境条件的农民合作社可以吸引更多的农民参与其中，或建立相似的合作组织，从而形成自组织的发展扩散过程。

第三世界农村的合作社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有利于合作社生长和发展的生态系统。在本报告中，“合作社生态系统”一词用以表达一切同农民合作社的建立、发展和扩散升级等诸多相互关联的因素、条件及其作用关系的总和。合作社生态系统包含自然、经济、社会、政治、文

化等不同类型的**因素和维度**，涉及宏观、中观和微观**多层级**的相互关联和作用影响，其研究范围的界定，取决于同所在地的农业生产发展和**农民生计**直接相关的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范围和影响程度。进一步，合作社发展作为一个**合作社思想的嵌入**和小农生产、经营、销售的一个自组织创新过程，不仅依赖和受制于合作社生态系统的形成条件，而且其个体合作社的成功建立和发展，会对合作社生态系统的改善起到积极的反馈和推动作用，从而吸收更多外部资源 and 合作社社员加入，实现个体合作社的结构升级和功能优化，或实现合作社模式的扩散输出，形成影响当地产业和合作社发展的“群雁效应”。

合作社生态系统概念为我们研究第三世界合作社发展和小农赋能赋权问题提供了新的方法论思路，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1) 合作社发展从本质上是小农生计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多方面因素相互匹配、共同作用的产物，是一个农民学习、适应、利用进而改变合作社生态系统的自组织过程；
- 2) 合作社生态系统不能独立于所在地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大环境而独立存在，因而受制于农村发展的大格局。换言之，发展中国家农村合作社发展是所在地农村发展和社会转型的一部分，并受其制约；
- 3) 合作社生态系统概念不能脱离地理环境而独立存在，地理环境的等级及其资源条件不同，合作社生态系统的性质及其差异性亦会很大，故可根据研究问题的不同，明确系统边界，观察和分析某一特定地理层级或区域内合作社发展现象。即使大的生态环境不利，合作社仍可以在适宜的小生境中建立、生存和发展，故全面揭示成功的合作社发展背后的关键条件十分重要；
- 4) 在特定时空环境条件下，合作社生态系统由诸多因素构成，其中必有一个或几个因素起着主导作用，由此决定了此类生态系统的性质和合作社的发展模式、路径及其扩散影响边界；
- 5) 合作社生态系统本身亦是一个动态开放系统，随着系统内合作社发展而调整系统结构和功能关系，推动生态系统的演化升级，或形成新的稳定平衡关系，或为合作社发展提供新的动力和条件，进而为本地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环境改善提供新的动能。

1.3 本项目内容和设计

本项目的主题是“中国农民合作社生态系统与小农赋能—四川研究试验示范”项目(以下简称“合作社生态系统研究”)，它是诺丁汉大学承担的英国政府资助的“全球挑战研究基金”(GCRF)的一个部分。本项目的总目标是：基于中国特别是四川省合作社过去十年来的探索实践，理解合作社生态系统的构成、演变、类型及其对合作社存续和发展的影响，并通过建构一个利益相关者之间交流合作平台，共同探讨贫困地区改善合作社生态系统的路径，为实现本地区产业振兴、脱贫致富、农村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创新思路和政策建议，为强化中英两国之

间、诺丁汉大学同相关高校/研究机构/社会组织之间，在农村可持续发展领域的研究合作和人才培养做出贡献。

选择四川省作为本项目的研究样本是基于如下考虑。首先，四川位于中国的西南部，既是人口大省，又是小农最多的省份之一，能代表中国不发达地区农村农业发展的基本情况。其次，四川连接青藏高原，三分之二的国土面积为高原和山地地貌，地质结构复杂，农业生态环境多样化，对理解第三世界山地农业和边缘地带农业农村发展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第三，四川居住着55个少数民族，占全国少数民族人口的5%。由于文化多样性保护同生态多样性保护密切相关，因而四川也是研究边缘地带农业、文化和生态协调发展的重要窗口。第四，四川是中国农村贫困人口集中连片地区，2014年全国重点扶贫县中，四川省占66个，占全国的832个贫困县的7.93%。2020年，中央政府挂牌督战的52个贫困县中，四川省占7个。因此，四川省是研究政府介入，精准扶贫和合作社发展的一个好案例。

基于合作社生态系统概念和本项目的总体目标，本项目执行设计包括三个关联维度和目标：

1. **研究目标：**在系统梳理合作社生态系统不同层级关联性、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围绕某一特定层级（特别是四川贫困地区）合作社生态系统的变化发展，进行深入研究，揭示不同类型合作社生态系统对当地主导产业和农民生计的影响，并通过搭建利益相关方参与交流平台的方式，共同探讨产业振兴和合作社发展的创新路径及其政策建议。

本项目课题组成员由来自诺丁汉大学（商学院、生物学院、宁波诺丁汉大学商学院），四川农业大学（农学院、管理学院、经济学院和旅游学院），中国农业大学国际发展和全球农业学院，友成社会企业家扶贫基金会等共近百名师生组成。本项目研究团队以四川农业大学的师生为主体，通过5个课题组组织实施（见附件项目参与名单）。五个课题组的研究主题和项目负责人分别是：

- 合作社政策环境演变与政府介入研究（傅新红）
- 合作社领导人成长路径与环境条件研究（张社梅）
- 农村合作金融生态变化与合作社金融研究（丁昭）
- 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合作社发展路径研究（耿宝江）
- 四川贫困地区马铃薯产业化国际化路径研究（王西瑶）

本项目研究发现以学术论文摘要的形式呈现，主要内容包括：

- 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生态系统的建构—四川案例研究

- 生态系统视角下贫困地区政府介入合作社发展—黑水中蜂案例研究
- 政府介入与土地股份合作社生态系统发展—崇州案例研究
- 生态系统视角下城市志愿者参与绿色农业和合作社发展路径研究
- 生态系统视角下的中国贫困地区农村金融信贷与合作社发展的纵向研究
- 中国农村合作金融生态系统创新—四川“旭力”和“群力”模式的比较研究
- 社会组织主导的扶贫干预生态系统—以友成基金会妇女电商培训项目为例
- 中国贫困地区科技小院生态系统与人才培养—布拖马铃薯科技小院案例
- 生态系统视角下高校师生团队支持少数民族地区社区发展的案例研究
- 中国边缘地区逆向移民与乡村旅游发展—乡村旅游生态系统的建构
- 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创新模式与大学生返乡创业—四川藏区案例研究

2. **社会影响目标：**同研究目标和内容直接相关，本项目的社会影响目标包括，搭建利益相关者合作交流平台，围绕挑战性问题或共同感兴趣的主体发展政策建议和行动方案，联合准备项目申请和组织项目实施，促进本项目研究成果扩散和参与方的能力建设。具体而言，本项目的社会影响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 四川凉山州马铃薯产业化国际化研究示范项目
- 四川阿坝高端蜂蜜产业化国际化研究示范项目
- 四川边缘地区乡村旅游的社区发展与大学参与
- 西部自然保护区的社会创新与社区可持续发展
- 中国贫困地区生态农业发展与社会生态建设

3. **能力发展目标：**同本项目的研究和社会影响目标不可分割，能力发展目标着眼于参与本项目的学生（包括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群体，培养他们以问题为导向的学术思维习惯、跨学科综合思考能力、同利益相关者的交流沟通能力和面向不同读者群体的书面表达能力。它通过如下渠道和方式实现：

- 生态系统研究方法论的学术讲座和师生沙龙：先后举办三次，围绕生态系统概念和应用、项目设计和田野调查方法论问题，交流经验、展开讨论；
- 田野调研项目的联合设计、讨论和实施：包括多个课题组参加的综合考察和各个课题组围绕项目总目标，应用生态系统方法论的线上线下调研；
- 学术论文的准备、修改、讨论和撰写：本项目吸收中国农业大学国际发展于全球农业学院的硕士生和博士生参与本项目，应用生态系统方法论指导他们的学位论文设计和田野调研工作；

- 项目博客和学生社会实践项目的准备（包括辅导川农大国际留学基金委赴诺丁汉大学的“乡村振兴”研究专项师生的项目设计）。

1.4 本报告的结构及主要内容

本报告由六个部分构成：1）执行摘要与导论；2）项目背景（中国农民合作社政策环境演变与四川省农村发展概况）；3）研究发现（11 篇学术论文的详细摘要）；4）社会影响报告（5 篇）；5）学生能力发展报告；6）主要结论和政策建议。

研究发现部分的 11 篇学术论文依其研究对象不同，可以再分为 5 组论文。开篇论文是有关中国贫困地区合作社生态系统的理论模型建构，在回顾国际有关第三世界农村合作社研究理论研究和农村合作社发展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本文概括了本项目的研究发现，提出引入生态系统概念研究贫困地区合作社发展问题的必要性和方法论方面的创新性，并依据四川省贫困地区合作社发展所面临的挑战性问题和本项目的实证研究成果，概括出不同类型合作社生态系统的要素构成、整体特征及其对合作社发展的影响、成功条件，以及合作社发展不同阶段对其生态系统的不同需求或条件要求，明确本项目研究发现的理论意义。

第二组共 3 篇论文，基于不同的地理条件和经济发展环境，分别从地方政府介入和城市志愿者嵌入两种外部干预方式入手，通过养蜂合作社、土地股份制合作社和水果合作社三个成功案例，揭示了合作社生态系统的不同类型及其对合作社发展的影响，指出了外部介入成功的条件和合作社可持续发展的路径，纠正了合作社发展理论研究中政府对介入的盲目排斥或过度依赖两种偏见。第三组 2 篇论文聚焦于农村金融信贷这一制约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关键问题，通过对国家扶贫攻坚 5 年来贫困地区农村金融信贷领域的政策变化及其各地利益相关者的探索性实践，分别从纵向（样本涉及 4 省 10 县 180 个合作社的农户参与）和横向（两类金融合作模式比较）两个侧面，揭示了不同类型农村金融合作生态系统的变化及其对合作社发展的影响。第四组论文共 3 篇，从贫困地区人才短缺和发掘内生动力的角度，揭示非政府组织、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在建立和培育新的生态系统，带动当地产业振兴和农村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特殊价值、成功条件、扩散路径，希望对理解中国特别是欠发达地区乡村振兴人才培养（包括在校大学生、返乡创业的大学生和农民工和农村妇女群体）的创新路径和成功条件，对理解中国乡村振兴和合作社发展所需的教育和社会生态环境、大学在服务于农村社区发展的创新辐射功能，具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第五组 2 篇论文基于在四川藏区乡村旅游和返乡创业企业家成长的田野调查和案例研究，分别从第三世界边缘地区乡村旅游生态系统的理论模式建构和社会资本在克服人才短缺瓶颈两个方面，提出了不同类型的生态系统中发展乡村旅游的模式路径、企业家素质要求、成功案例及其模式扩散条件。

社会影响报告部分共 5 篇短文分别从不同角度揭示了本项目的社会影响。开篇报告从马铃薯产业化在四川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口粮和生计保障的战略地位和凉山州布拖马铃薯科技小院的功能优化的角度，总结了本项目在建构多学科、多层次参与的社会创新网络和国际合作平台方面的战略思路、主要活动成果，以及进一步推进凉山彝族少数民族自治州马铃薯产业化、国际化及其相关人才培养的社会影响路径。第 2 篇报告从四川贫困地区特别是阿坝州发展养蜂主导产业的资源优势、环保和扶贫效益等方面，总结了本项目在搭建多方参与的合作平台、成功建立邛崃蜜蜂科技小院、发展多学科跨部门研究团队的活动进展情况，提出了推进阿坝高端蜂蜜产业化、国际化的战略思路及其未来影响路径。第 3 篇报告从四川贫困地区乡村旅游社区发展的人才短缺这一挑战性问题出发，总结了本项目对参与大学生、研究生在思想观念转变、生态系统思维发展、田野调研方法论提升以及建立高等院校—旅游社区发展试验示范基地建设等方面所取得的成果，以及未来进一步扩大本项目社会影响的渠道和思路。第 4、5 两篇报告分别从西部环境生态保护区的环境教育和有机农业发展角度，揭示了社会创新和国际参与对中国西南贫困地区生态环境保护、有机农业发展、弱势群体赋能赋权及其农村可持续发展的作用，提出了通过发展同诺丁汉大学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中英两国围绕中国西南贫困地区乡村旅游和生态农业领域的互惠合作关系，进一步扩大本项目社会影响的思路、路径和建议。

学生能力发展报告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参与本项目的四川农业大学和中国农业大学的大学生、研究生进行的线上问卷调查报告，反映受访学生的项目参与方式、对本项目能力发展目标的理解及其接受认同程度，以及他们对本项目学生能力发展的总体和具体目标的打分评估结果。第二部分是学生提交的参与项目的体会报告的摘要选登。

（武斌，诺丁汉大学-四川农业大学全球挑战研究基金项目负责人）

2 项目背景

2.1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合作社政策环境的演变

合作社政策环境的探索建构（1978 年——2006 年）

1978 年，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施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标志着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开始。对数亿农民而言，他们面对是由过去人民公社集体组织农业生产和销售向一家一户自己组织生产和销售的转变、农产品由国家的“统购统销” 转变为由市场定价。面对新的生产组织方式、市场环境和农产品价格波动的风险，他们不得不学习新的技术和管理方法，自主探索能扩大销售渠道、降低交易成本、保证收入稳定增长的方法。于是，以实用技术的学习和交流、市场信息的分享为主的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技协）出现了，它是农民专业合作社组织的雏形，为个体农户提供学习新技术渠道和服务。依其生产领域和发展水平的不同，许多农技协遵循合作社的自愿参与、自由退出原则，制定类似合作社的章程，为农户提供“产、供、销一条龙”服务。

各级政府对农技协持积极的支持态度，为其免费提供办公、生产、科研、贮藏、加工用地及水利设施建设等帮助，农技协得以快速发展。自 1982 年到 1994 年，全国农村以协会、联合会、合作社等名称出现的农民技术创新组织达 12 万多个，会员 450 万人（户）¹。这一时期农技协以技术交流合作为主，存在着规模较小、数量不多、稳定性差、制度不规范等问题。大多数农技协没有自己的章程和组织机构，无会员服务与非会员服务之分，缺乏长远规划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随着农村改革的不断发展，特别是中央政府 1983 年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要求农村经济组织，在土地公有制基础上设立地区性农业合作组织，鼓励农民在自愿的基础上发展经济合作实体。在这样的背景下，到 1994 年底大约 10%左右的农技协组织拥有自己的经济实体。该时期政府对于合作组织的态度逐渐从模糊到明确，政策方面更侧重宏观意义上的鼓励和引导，但没有提出很具体的措施，政策实施范围有限。

90 年代初，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各种类型的专业合作社逐渐出现，合作社覆盖范围逐渐扩大、业务逐渐拓宽、功能逐渐增强。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包括：在购买生产资料时的议价定价能力，引进新技术和优良品种的许可问题，农产品销售渠道的网络建设问题，以及为加工、购销的契约、出资等相关的法律授权等问题。这一时期中央政府开始重视农村合作经

¹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 农民自组织的成长与约束[J]. 管理世界,1994(06):176-182.

济组织的规范化管理，如 1996 年出台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财务制度》，从资金筹集、流动资产、收益及其分配等八个方面对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作了的规定。

该时期农民合作社形式多样，如养殖合作社、种植合作社、运销合作社等等，为个体农户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提供各类合作服务。据农业部统计，截至 2005 年底，全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总数超过 15 万个，成员数量已达 2363 万名，占全国农户总数的 9.8%，年培训农民 1500 多万人次，为成员和周边农户代销农产品 2 亿多吨，代购各类生产资料 1 亿吨²。

随着农民合作社进一步发展，农民合作社的合法地位成为现实需求。同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快速发展相比，相关的政策措施与体系建设相对滞后，难以满足新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要求。在政府涉及农村工作的意见和政策中，对专业合作社的定位基本是“逐步发展的集体经济组织”。

合作社政策环境的系统化（2007 年——2014 年）

2007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正式实施，要求农民合作社在工商管理局登记，确立了农民合作社的法人地位，以保护农民合作社及其成员的合法权益。该法律的出台，标志着中国农民合作社发展加入一个新的阶段，其主要特征是：1）要求农民合作社的规范化运作和管理，与国际合作社的原则基本接轨；2）从侧重于生产、加工、运输、消费农产品的各个环节的发展向专注于农产品的品牌一体化的方向发展；3）从单一发展向跨社、跨产品、跨领域的发展；4）从民间力量为主向民间与政府相协同的方向发展。

同《合作社法》相配套，国务院还颁布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管理条例》，国家工商总局颁布的《关于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管理的若干意见》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文书格式规范》；农业部颁布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章程（农业部 4 号令）》，财政部发布了《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试行）》。各部门的支持政策各有侧重，但又相互衔接。

相对宽松的政策环境为中国农民合作社大发展的增添了动力，体现在：数量稳定增长，覆盖面不断扩大，已遍布于农业各领域，涵盖种植业、养殖业、加工业、产品销售等各领域，和种植业合作社、农机合作社、旅游合作社、沼气合作社、产品加工合作社等多种类型。合作社着力于发展当地的特色农产品和特色产业，将分散农户的个体经营组织起来，形成比较优势。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务是该时期农民合作社业务扩展的一个重要方向，通过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延

² <http://npc.people.com.cn/GB/4581331.html>

长农产品产业链和价值链，把原来由经销商获取的利润留在了合作社，使农民分享到农产品加工增值收益。

针对农民合作社的发展普遍面临资金短缺问题，中央政府加大了对合作社的资金支持、补贴和信贷支持力度，但受益者主要是这些示范合作社。例如，2013 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把示范社作为政策扶持重点。对示范社建设鲜活农产品仓储物流设施、兴办农产品加工业给予补助。在信用评定基础上对示范社开展联合授信”。中央政府将合作社示范社作为资金重点扶持对象的意图非常明显，它有助于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进一步推动示范社成长。然而，合作社本身具有一定的益贫性，要实现中国落后地区农民脱贫的任务，就需要充分发挥示范社以外其他众多合作社的作用。而现有对合作社的政策支持并不具有普惠性，能够享受资金或补贴支持的毕竟只是少数的示范社。

中国农民合作社发展的另一瓶颈问题合作社领导人才短缺问题。为此，中央出台政策，要求加大对合作社领办人或带头人的培训，鼓励和引导高校毕业生到合作社工作。但政府对于高校毕业生到合作社工作、创办或领办合作社，没有制定明确具体的优惠政策措施，留不住人才，高校毕业生就业难的社会现实问题和合作社人才严重匮乏的问题并存。

随着《合作社法》的实施，民间农民合作社纷纷在地方工商部注册，获得相应的法律地位，民间组织逐渐合法化，成为带动农户进入市场的基本主体，农村规模经营的重要组织载体，也是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新型实体的有效载体。此外，《合作社法》为地方政府推动和介入合作社的发展提供了依据，它不仅要求对合作社的支持和促进，还要求对其加以引导、规范和监督。截至 2013 年 11 月底，农民合作社已发展到了 95.07 万家，农户达 7221 万户，占我国农户总数的 27.8%³，参加合作社农户的收入普遍比非成员农户高出 20%以上⁴。

合作社政策环境的发展完善（2015 年——至今）

中国农民合作社发展迅速，但也出现了很多新情况。早期农民合作社主要采取“生产导向性”经营活动，随着农民合作社经营业务的发展和外部市场环境的变化，其经营活动以市场需求为导向。近年来随着所有权边界和经营边界的调整和变革，我国农民合作社呈现出从生产导向性向全要素合作拓展的发展趋势，涌现出了大量多种类型的合作社，如土地股份合作社、社区股份合作社、资金互助合作社、农机合作社、消费合作社等。这些农民合作社并非人们逐渐熟悉

3 张红宇. 农民合作社发展迎来又一个“黄金期”[J]. 农业科技与信息,2014(03):25.

4 张宝文. 在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实施十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J]. 农村工作通讯, 2017(18):13-15.

的以农产品经营为主要业务、以市场竞争为基本导向的农民合作社，而更多的是强调各种要素的共享与互助。且各地不断涌现出建立农民合作社联合社的积极探索，既有基层农民合作社自发联合形成的自下而上的开放式或封闭式联合，也有由较强政府意愿推动的自上而下的联合。农民合作社从原来的普通农户之间的“抱团”经营逐渐向社与社之间的社际联合“一体”经营发展。

一方面，近年来涌现的股份合作社、联合社等新型合作社不断突破专业合作和生产合作的界限，超出了合作社法的适用范围，农民合作社发展创新与现行合作社法的冲突不断升级；另一方面，农民合作社发展也存在成员资格不清楚、发展不规范等诸多问题。为了适应农民合作社发展的新要求，中央政府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获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后于2018年7月1日起实施。

新修订的合作社法专门规定：保障农民专业合作社享有与其他市场主体平等的法律地位，允许农民专业合作社投资公司等其他企业；取消了有关“同类”的限制，以列举的方式明确农民专业合作社经营和服务的业务范围；增加了“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一章，赋予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法人地位，明确联合社应当是经营实体，只有农民专业合作社才能成为联合社的成员，还对注册登记、组织机构、治理结构、盈余分配等问题作了规定。

针对农民合作社数量快速增长中存在的“空壳社”、“休眠社”、“挂牌社”、少数人控制等不规范等问题，新修订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规定，合作社连续两年未从事经营活动的，吊销其营业执照；合作社应当向登记机关报送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2019年2月，农业农村部印发了《开展农民专业合作社“空壳社”专项清理工作方案》，对全国的“空壳社”进行全面排查，清理整顿，以促进农民合作社向规范化方向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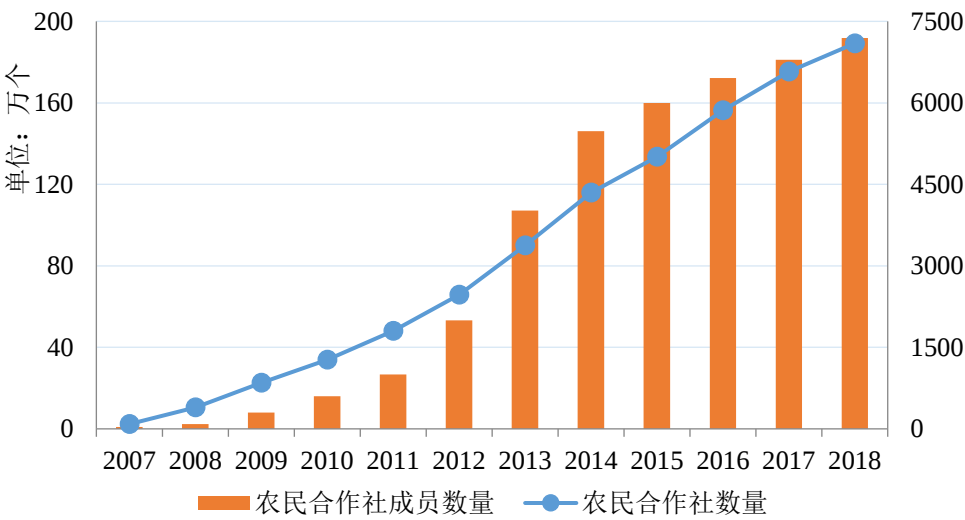
针对合作社发展中区域发展不平衡，特别是贫困地区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空白的问题，中央政府把扶持合作社发展列为国家精准扶贫战略（2015-2020）的一个重要内容，陆续推出一系列适用于本地区的特殊政策，从完善合作社与贫困户利益联结机制、合作社税收优惠以及贷款等资金支持三个方面，以期通过合作社发展来促进贫困地区产业振兴和贫困人口的就业、收入增长。例如，2015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提出对合作社实施扶贫小额信贷、扶贫再贷款等政策。2016年8月旅游部发布《关于印发乡村旅游扶贫工程行动方案的通知》，要求探索“合作社+农户”等多种类型的旅游扶贫新模式，鼓励一个合作社带动不少于20户建档立卡贫困户，通过招工、订单采购农产品、建设绿色食品基地、成立互助社等方式帮扶脱贫。2018年6月中央政府《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强调精准帮扶这一举措，推广“合作社+管护+贫困户”模式，建设生态扶贫专业合作社

（队），吸纳贫困人口参与防沙治沙、石漠化治理、防护林建设和储备林营造，并鼓励贫困人口将林地经营权入股造林合作社，增加贫困人口资产性收入。

2007 年以来中国农民合作社的增长态势及其分布

自 2007 年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出台，全国的农民合作社数量增长迅速，农民合作社成员数量也保持着稳定的增长（见图 2-1）。在 2015-2018 年间，农民合作社成员数量共增加了 1196.25 万人，年均增长率为 6.25%。截至 2019 年 12 月，我国注册登记农民合作社达 220.1 万家⁵，成员 4668.74 万户⁶，在带领成员发展产业、增收致富等方面取得了瞩目的成绩。

图 2-1 全国农民合作社及成员数量变化趋势图



目前，我国农民合作社类型具体可分为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和服务业合作社，其中，从事种植业的农民合作社占比超过 50%（见表 2-1）。从事林业和渔业的农民合作社比较少，但也处于稳步增加的形势，在 2018 年占比为 6.0%和 3.2%。在从事畜牧业的农民合作社中，生猪产业的比重较大，生猪产业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合作社在推进生猪产业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肉牛羊产业、奶业、肉鸡产业和蛋鸡产业的合作社偏少。在从事服务业的农民合作社中，农机服务合作社的数量最多，占服务业合作社数量的 60%以上。服务内容已从单一的生产资料购买、生产技术服务等方面，向开展标准化生产、进行无公害基地认证和品牌包装等经营领域的合作拓展。

5 http://www.samr.gov.cn/zhghs/tjsj/202003/t20200305_312509.html
6 本刊编辑部.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发展[J].中国农民合作社,2020(01):1.

表 2-1 全国农民合作社类型划分（单位：万个）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种植业	总量	71.06	84.35	95.36	103.56
	粮食产业	27.63	32.49	37.91	40.83
	蔬菜产业	12.76	14.70	15.61	17.68
林业	总量	7.93	9.18	10.41	11.26
畜牧业	总量	32.44	37.08	40.41	42.79
	生猪产业	10.86	12.08	12.77	13.32
	奶业	1.52	1.62	1.59	1.59
	肉牛羊产业	7.38	8.64	9.22	9.66
	肉鸡产业	—	—	1.57	1.85
	蛋鸡产业	—	—	1.07	1.29
渔业	总量	4.56	5.11	5.71	5.99
服务业	总量	10.87	12.32	13.90	14.65
	农机服务	6.86	7.59	8.40	8.80
	植保服务	1.26	1.31	1.43	1.40
	土肥服务	0.45	0.48	0.52	0.52
	金融服务	0.87	0.12	0.13	0.11

数据来源：《中国农村经营管理统计年报》（2015-2018 年）

为了更好分析不同地区农民合作社的情况，将全国的农民合作社按区域拆分为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部。从各个地区的农民合作社总量来看（见表 2-2），东中西部的农民合作社数量较接近，均超过 50 万个。在农民合作社的产业分布情况中，种植业农民合作社的占比最大，尤其是在东北部，其种植业农民合作社的占比为 63%；畜牧业农民合作社在西部的占比最重，占全国畜牧业农民合作社数量的 44.9%；林业、渔业和服务业合作社在四个地区的占比均很小。

表 2-2 全国农民合作社按区域和行业类型划分（单位：万个）

	东部	中部	西部	东北部
总量	55.10	57.71	56.88	19.50
种植业	33.02	32.32	25.92	12.29
林业	3.58	3.79	3.52	0.38
畜牧业	8.66	11.38	19.20	3.55
渔业	2.31	2.32	1.19	0.17
服务业	4.67	4.48	3.28	2.23
其他行业	2.86	3.42	3.77	0.88

2.2 四川农村发展的背景情况和挑战性问题

本报告中中国欠发达地区特指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西北和西南两大地区，共有 12 省、自治区、直辖市组成，国土面积为 690 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国土总面积的 71%；本地区

人口总数约为 3.8 亿（2017 年），占全国的总人口的 27%；本地区乡村人口为 1.79 亿人，占本地区户籍人口的 47%；占全国乡村人口总数的 32%。2019 年本地区人均 GDP 为 48884 元，农村可支配收入为 13107 元，分别为同期全国平均值 16021 元的 82%。

四川省概况

四川省位于青藏高原和长江中下游平原的过渡带，无论从地形地貌、资源生态、人口分布、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复杂性、多样性而言，对研究中国西部特别是西南 3 省（云南，贵州和四川）的农村合作社发展和小农赋能问题，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意义。四川省国土面积为 48.6 万平方公里，总人口 8375 万人（2019 年），乡村人口 3870.1 万人，分别占本地区（即：云贵川）国土总面积、总人口和乡村人口的 46%，50%和 48%。本地区和四川省乡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分别为 49.3%和 47.7%，高于全国平均值 39.4%的 9.9 和 8.3 个百分点；2019 年本地区和四川省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 14218 元和 14670 元，是同期全国平均值的 88.7%和 91.6%。本地区和四川省也是中国 25 个少数民族地区的主要聚集地，其人口总数分别占全国少数民族总人数 31%和 5%（2019 年）。四川农村以小规模经营农户占绝大多数，截至 2018 年底，全省农业经营耕地 10 亩以下的小规模农户数达到了 1955.1 万户，占比高达 90%；而经营耕地在 100 亩以上的农户仅有 3.6 万户，占比不足 0.2%⁷。这与中国整体的农业经营状况十分相似（全国农户总数为 2.3 亿户），因此，四川农村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代表中国农村问题。

四川省乡村人口、资源分布情况

四川省地跨青藏高原、横断山脉、云贵高原、秦巴山地、四川盆地等几大地貌单元，地势整体西高东低，地形地貌复杂，可分为东部的四川盆地和西部的川西高原。其山地、丘陵、平原和高原分别占全省面积的 74.2%、10.3%、8.2%、7.3%。

四川气候多样，区域差异显著。水资源总量为 2952.6 立方米，居全国第二，人均水资源量为 3548.2 立方米，高于全国人均水平。四川省的耕地，草地和林地分别占全省国土面积的 13.8%，25.1%和 45.6%；其中，耕地则集中分布于东部盆地和低山丘陵区，占全省耕地的 85%以上；林地集中分布于盆周山地和西部高山高原，占总土地面积的 68.9%；园地集中分布于

⁷ 数据来源：中国农村经营管理统计年报（2019）。

盆地丘陵和西南山地，占全省园地的 70% 以上；交通用地和建设用地集中分布在经济较发达的平原区和丘陵区。

四川林地资源的分布，占全国森林面积的 7.5%，除具有经济价值外，还具有涵养水源、防风固沙、调节气候等生态价值，对于长江流域生态系统保护至关重要。就有限的耕地资源而言，四川省中低产耕地面积占比达到 70.51%，而优高等耕地只占 29.49%，低于全国水平（31.24%）⁸。

四川省 46% 的人口集中分布在仅占全省国土面积 18% 的成都平原地区。川西攀西少数民族区（包括攀枝花市，凉山州，甘孜州和阿坝州）占全省国土面积的 62% 却仅有全省 10% 的人口。同经济较为发达的成都平原地区相比 2018 年川西攀西少数民族区无论城镇化率达（60%：40%），还是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534 元：5648 元），均存在较大的差距。

四川贫困地区的人口分布和发展机遇

国家级贫困县的划定标准以当地人年均纯收入作为依据。2012 年中国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公布的标准，人均年收入少于 2300 元人民币的算国家级贫困县，少数民族地区与革命老区则相应的降低标准。四川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川西北高原地区、大小凉山地区、秦巴山区和乌蒙山区“四大片区”，贫困集中连片特征十分明显。凉山州、甘孜州、阿坝州都属于全国“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是脱贫攻坚的重中之重（表 2-3）。

表 2-3 四川省国家级贫困县 2013 年和 2018 年数量

地区	2013 年	比例	2018 年	比例
成都平原区	4	6%	2	4%
川东川南丘陵区	20	30%	15	28%
川西攀西高山区	42	64%	37	69%
全省总计	66	100%	54	100%

数据来源：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

四川省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区域发展差异大，政府出台的相关农村发展、扶贫干预政策也存在较大差异。针对欠发达地区，四川省则开展了一系列省内对口支援工作，由一批经济基础较

⁸ 数据来源：《国土资源部关于发布 2016 年全国耕地质量等别更新评价主要数据成果的公告》。

好、财政实力较强的县市区对口支援协作贫困县工作，抓好产业发展、智力支援、社会帮扶、劳务协作、支部共建、群众工作等六项重点任务。“飞地经济”扶贫战略是四川省对口支援工作的典型代表，通过引导经济实力较强地区与贫困地区联建产业园区，共同开发优势资源，探索建设多种合作模式的飞地园区，助推脱贫攻坚。截至 2019 年底，飞地产业园区落户企业共计 261 户（数据来源：四川省农业农村厅）。实现工业总产值 336.4 亿元，同比增长 25.3%；实现营业收入 306 亿元，同比增长 21.5%。

四川贫困地区自 2015 年国家精准扶贫战略实施以来，贫困地区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包括：

1. 基础设施建设。过去许多边远山村不通公路，绵延的大山阻隔了群众出行。现在，“溜索改桥”项目全面完工、10 多万群众告别了溜索出行的历史，基本实现了“乡乡通油路、村村通硬化路”。所有具备条件的乡镇和建制村都通了客车，快递网点也基本实现全覆盖，即使在最偏远的乡村，群众也能用上电灯、看上电视，可以打手机、上互联网。全省有 136 万贫困群众实施了易地扶贫搬迁，62.2 万贫困群众进行了农村危房改造，有 295.9 万存在饮水困难的群众现在都喝上了“干净水”。
2. 教育医疗。如 2018 年，四川省投入教育扶贫资金 182 亿元，共建成学校 110 多所、全面实行民族地区 15 年免费教育、“9+3”免费职业教育和“一村一幼”，贫困家庭的孩子从幼儿园、小学到初中，有的还包括中职学校，费用全部由政府承担，适龄儿童少年失学辍学的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
3. 农业科技。每个贫困县都建有现代农业园区、每个贫困村都有集体经济，全省共推出优质农产品品牌 149 个、区域公共品牌 12 个，有力助推了贫困地区的发展。全省 88 个贫困县去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9557.9 亿元、是 2013 年的 1.68 倍，全省贫困家庭去年人均纯收入 7690 元、是 2013 年的 2.81 倍。
4. 乡村旅游投入。四川省大力推进旅游业发展，旅游接待能力全面提高，2017 年全年实现投资总额 1377.6 亿元，相比 2016 年增长 7.2%，占四川省第三产业投资总额的 6.3%，在全国同年度旅游投资中占比达 8.9%⁹。其中乡村旅游投资规模快速增长，投资项目数量达到 304 个，投资金额达到 231.1 亿元，在各类型项目投资数量与金额排行榜中均位列第一。乡村旅游投资促进乡村振兴、助推精准扶贫效果明显。2017 年，带动 509 个旅游扶贫重点村退出，占全省 3769 个退出贫困村的 13.5%；带动 17.3 万贫困人口参与旅游业，其中 12.6 万人实现脱贫，占全部 108.5 万脱贫人口的 11.6%，带动贫困群众人均增收 20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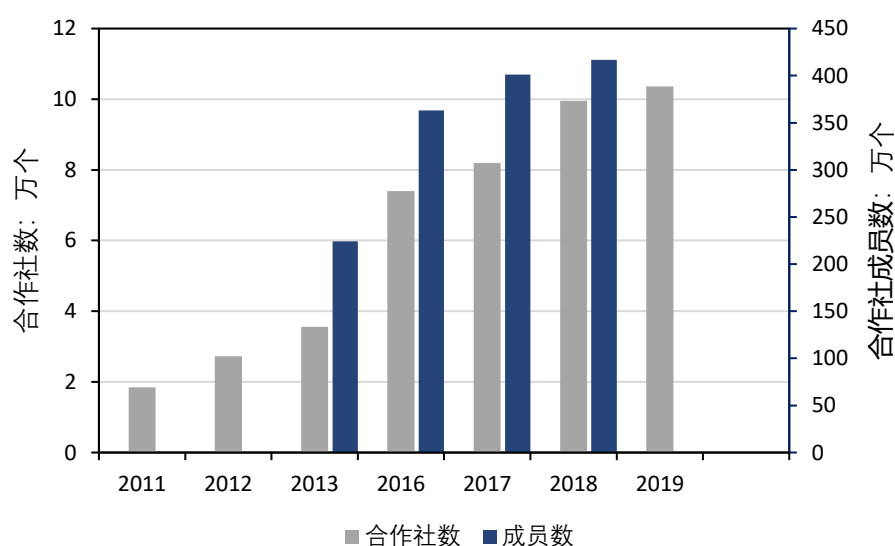
⁹ 数据来源：《四川省旅游投资 2018 年白皮书》

元。

四川省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情况和相关政策

截至 2019 年底，全省在工商登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 103605 个，从事行业广泛，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和服务业均有分布，其中以种植业和畜牧业为主，种植业占比 47%，畜牧业占比 30.2%，其中，生猪产业达 39%（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 and 四川省人民政府）。2019 年底，全省创办实体的农民专业合作社 2542 个、开展农村电子商务的农民专业合作社 2552 个、开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的农民专业合作社 989 个，分别比上年增长 189.5%、156.5%、85.9%。2019 年底，全省农民专业合作社经营收入 424.8 亿元，社平 41 万元；实现可分配盈余 72.6 亿元，入社成员户均分得盈余 1795.8 元。同时，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帮助贫困户脱贫增收上的效果显著。2019 年底，全省农民专业合作社吸纳 317498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同比增长 22.4%。

图 2-2 四川省合作社数量与社员数量



数据来源：中国农村经营管理统计年报

四川省 2010 年颁布了《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实施办法》，省委省政府先后出台一系列合作社支持政策，着力构建政策体系，不断优化发展环境。从以往支持合作社创建以给予合作社财政扶持资金，减免税收的扶持政策为主，到目前四川省着力推进农民专业合作社高质量发展，出台了多项关于开展农民专业合作社规范提升行动的文件，同时财政资金对合作社的支持目标也更明确，对标信息、技术、培训、质量标准认证、市场营销和基础设施建设等通过优化农业内部结构，提高农产品加工企业提档升级，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实施“互

“互联网+现代农业”行动计划，推进农村新型信用互助合作服务等来积极推动全省农村合作社产业链的融合发展。

2016 年，四川省通过大力开展乡村旅游扶贫工作，创建了 2291 家乡村旅游合作社，带动了 448 个贫困村脱贫摘帽，以及 83.56 万贫困人口受益，实现乡村旅游年收入 2015 亿元。截止 2018 年 6 月底，四川省新增了 952 个贫困村和 56 个贫困县加入发展乡村旅游队伍，使 14.6 万贫困人口增收就业，实现乡村旅游半年总收入 1642 亿元。

2018 年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公布关于扶持发展脱贫攻坚造林专业合作社的意见，提出以深度贫困县为重点，扶持发展造林合作社。各类政府投资造林绿化项目原则上全部由造林合作社承接。

2019 年出台的《四川省农村信用社专合社贷款管理暂行办法》中还开发了针对合作社的系列金融贷款产品，加大对农民合作社的扶持力度，贷款条件不断放开。截至 2019 年底，四川省当年获得财政扶持资金的合作社 2604 个，同比增长 110.9%；四川省农民合作社当年获得财政扶持资金总额 40668.4 万元，同比增长 64.2%；四川省农民合作社上缴的税金总额 5282.9 万元，同比减少 16.1%；四川省农民合作社当年贷款余额 57853.5 万元，同比增长 51.6%。

3 项目学术论文详细摘要

3.1 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生态系统的建构—四川案例研究

目前世界上共有 5 亿小农户，他们是发展中国家（或中低收入国家）的三分之二贫困或低收入家庭（约 20 亿人口）生计来源的基础，也是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消除全球贫困和实现食品安全保障的关键。面对全球化的冲击和气候变化的挑战，如何帮助小农通过采用新的技术和生产组织方式来适应外部市场环境、提高产品的竞争力和农户的收入水平，改变他们在世界农业供应链中弱势群体地位，这是摆在国际社会面前的一个挑战性问题。

自联合国 2000 年发布“千禧年发展目标”以来，国际社会围绕第三世界通过对小农的赋能赋权来消除贫困、解决粮食安全，已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实践，形成了诸多创新性的解决方案和发展思路，其中通过发展合作社组织，把分散的农户组织起来，实现规模化、专业化、标准化、品牌化的生产和销售，被普遍认为是解决世界“小农问题”的一种最有效的途径何方式，并得到了联合国组织的大力倡导和支持。然而，不同国家因其历史、制度、观念的不同，在合作社发展的实践和政策层面上会有很大的区别，特别在政府是否应该参与、如何介入农民合作社发展问题上，理论界尚无共识，而争议背后的一个核心问题是：是否需要遵从西方社会发展成熟的一整套“合作社原则”来研究发展中国家小农组织和合作社发展问题？合作社研究有无可能从发展中国家农村发展所面临的现实约束和环境条件出发，揭示合作社发展的现实路径和内在动力机制？

本文试图通过中国农村合作社发展的曲折路程和探索实践，来回答上述问题。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小农农户为 2.3 亿，约占世界小农总数的一半。通过发展农民专业生产合作社来解决小农问题，已成为国家农村发展、扶贫攻坚、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并以合作社法的形式予以确认。基于中国合作社发展实践，特别是它的西部贫困地区“精准扶贫”过程中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建立和发展实践，本文目标是建立一个有关贫困地区“合作社生态系统”的概念框架，用以理解发展中国家政府干预合作社发展的必要性，建立一个适用于观察贫困地区的合作社发展的生态系统的分类框架，揭示政府干预在贫困地区合作社发展的作用及其成功条件。

本文的经验证据材料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对 20 世纪中叶以来中国政府在合作社生态系统中角色变化的历史梳理，和对自 2007 年《农民专业合作社法》颁布以来中国合作社发展的综合概括。其次，考虑到中国贫困地区农村和合作社发展的复杂性，本文选取四川省为研究样本，对合作社生态系统进行分区分类研究，分析政府在不同类型合作社生态系统中的作

用。再次，基于合作社生态系统类型和典型案例调查，本文概括总结了不同类型合作社生态系统的特征及其政府干预的成功条件。

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为发展中国家合作社发展的理论研究提供了有益的思路和贡献。

1. 针对学术界对合作社原理的狭隘理解和教条应用问题，本文提出应把第三世界农村合作社发展视为当地解决农村发展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来研究。
2. 本文为建构一个适用于观察分析第三世界农村贫困地区合作社发展的生态系统概念框架和理论模型。
3. 通过四川省贫困地区合作社发展的案例研究，本文提出了有关本地区合作社可持续发展的指标体系，为评估政府干预合作社发展的结果（成功或失败）提供依据。

（武斌等）

3.2 生态系统视角下贫困地区政府介入与合作社发展—黑水中蜂合作社案例

发展中国家合作社研究学者面临的一个难题是如何看待和评估政府的介入，因为有诸多因素或条件影响政府介入的效果，进而影响合作社发展的质量和成效。

本文是本项目中合作社领导人成长路径子课题的一部分，聚焦于政府介入在中国农村贫困地区合作社开发中的作用与影响。与中国其他地区相比，中国贫困地区的小农更为脆弱和贫困，这些贫困地区主要位于中国西部，并以山区、偏远地区、少数民族聚居为主。为了解决这一挑战性问题，中国政府把建立和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列为本地区扶贫攻坚的重要组成部分，集中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试图通过本地区农民专业合作社组织的发展，推动当地主导、优势产业发展的振兴。相关研究表明，在贫困地区政府介入合作社发展方面，既有成功的经验，也不乏失败的教训。

就政府介入的必要性而言，贫困地区政府对合作社发展的强力介入无疑有助于克服本地区合作社发展所面临的各种制约因素(如地理、资源、基础设施和人才)。根据官方数据，政府介入不仅令国家重点扶贫县的贫困人口从 2012 年的 9899 万下降到 2019 年的 551 万，而且促进了本地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迅速发展，在全国范围内达到 68.5 万个，覆盖了 90%以上的贫困村庄，惠及 2198 万农村人口。

但与此同时，中国农村大规模、运动式扶贫预计将于 2020 年完成，意味着此后政府介入和外部资源输入将呈下降趋势，由此提出了“后扶贫时期”本地区合作社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课题，而上述问题的破解，离不开对本地区地理、资源、气候、基础设施、经济、社会和文化条件的系统理解和全面把握。

基于我们在四川贫困地区进行的一个案例研究，本文试图从生态系统的角度分析和评价政府对贫困地区合作社发展的介入，揭示本地区合作社成功建立和可持续发展的条件。本文试图回答以下问题：为什么中国贫困地区农村的合作社发展需要政府介入？政府介入在何种条件下才能取得成功，从而促进地方合作社的可持续发展？

本论文选择四川省阿坝州作为案例研究有以下考虑：该地区在中国西南老少边穷地区具有代表性，处在全国扶贫攻坚的核心地带。实证研究位于该州黑水县，属于高山区，西藏少数民族占主导地位，是政府名单上国家最贫困的县之一。黑水县因其山区环境和独特的野生植物资源，有生产高质量药蜂蜜的潜力。为了动员和组织当地西藏农民参与商业生产，兴牧养蜂合作社于2014年成立并由政府注册，两年后将领导权移交给当地一名村长。这是许多贫困地方政府参与和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典型做法，也是当前中国政府介入合作社发展的一个缩影。

本论文从中国扶贫攻坚和政府介入合作社的大背景出发，围绕政府介入的方式及其后果提出了一个分析框架，并通过案例研究说明了本框架的价值和可行性，最后讨论了合作社生态系统的研究结果和影响。

本文的主要研究发现和论文贡献包括：建立贫困地区政府介入合作社发展绩效的观察与评价框架；总结政府介入成功或失败的条件和指标。

本文采用“合作社生态系统”的概念，以反映政府介入在启动和促进贫困地区农民合作社发展中的作用。首先，发展中国家贫困农村的合作社发展不是目的，而是政府介入地方发展和减贫的一种手段。第二，政府介入在构建合作生态系统方面至关重要，以汇集相关要素或条件来启动和促进合作社发展。政府主导的合作社生态系统在贫困地区尤为重要，在这些地区，合作社发展的多样性主要归因于地方政府在方法、承诺和经济发展战略方面的差异。第三，政府介入的作用不能过分夸大，因为贫困地区的合作社发展是由生态系统中的许多因素决定的，而政府介入只是其中之一。此外，政府介入不是一成不变的，相关部门可根据介入的效果，及时调整介入方式方法，进而影响或重塑合作社生态系统。简而言之，本文试图将合作社生态系统的概念应用到发展中国家农民合作社发展实践，而不是简单套用来自西方世界的合作社原则，以更好地理解贫困地区合作社发展的复杂性和政府介入的必要性及其后果的多样性。

本文的政策建议包括：

1. 需要制定政府介入合作社发展的必要规则和程序，以确保内部和外部所有利益相关方的参与、协调和相互匹配，从而提高政府介入项目的成功率；
2. 邀请贫困地区之外专业相关的合作社或非政府组织作为关键利益攸关方参与政府介入项目规划的讨论制定过程，从合作社领导层和核心成员的识别、培训和赋能和合作社文化的培

育两个方面，增加政府介入的有效性；

3. 政府介入的核心重点应是创造和促进有利于合作社发展的生态系统，而不是合作社的数量增长或技术、组织规模方面的“示范合作社”的质量。这是因为，任何政府介入，只有在充分挖掘、调动和释放了农户之间合作需求，形成内在发展活力和自下而上的发展过程后，合作社发展才会成功和具有可持续性；
4. 政府介入的力度和方式因地理位置、当地支柱产业和经济发展、社会文化环境以及合作社发展阶段而异，因而有必要发展用于帮助政府或专业机构规划、监测和评估农民合作社发展项目的专业软件或工具包。

（张社梅、陈锐、武斌、梁景智）

3.3 政府介入与土地股份合作社生态系统发展：崇州案例研究

随着新型城镇化和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加快，我国“农业边缘化”的倾向愈加明显，农村“空心化”、劳动力“老龄化”程度不断加剧。与此同时，年轻人“无心种田、不会种地”，导致农村“弱者种地”“差地种粮”等问题不断凸显，原有的农业经营模式阻碍了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可持续发展。

针对上述挑战性问题，本论文聚焦于土地承包经营权股份合作社（简称土地股份合作社）这一中国农村近年来出现的新的经营形式，围绕如何通过合作社发展帮助小农赋能赋权、实现农村可持续发展这一主题，本文的研究目标是揭示政府介入在土地股份合作社发展中的作用，通过对四川省崇州市土地股份合作社改革的案例研究，为推动和深化中国农村制度改革和合作社发展提供新的思路。

崇州市位于成都平原的南部，是全国新增千亿斤粮食生产能力建设县、四川省粮食主要产区。近年来，崇州市围绕解决农村土地细碎化、农业兼业化、劳动力弱质化等问题，推进承包土地“三权”分置，探索土地股份合作社+农业职业经理人+农业综合服务“三位一体”模式，对中国西部县域经济发展强劲、农业资源条件较好地区的农村改革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目前学术界关于土地股份合作社的研究，多从产生动因、运行机制、制度绩效、问题及对策等方面进行探讨，尚缺乏一个对其产生的外部因素和环境条件，特别是土地股份合作社演化成长中政府介入的原因、路径、政策工具等方面较为系统、全面的研究。事实上，崇州土地股份合作社发展过程是诸多主体、要素及其条件相互关联、共同作用的结果，地方政府在其中扮演着及其重要的角色。

本文试图构建一个土地股份合作社的生态系统分析框架，以便揭示土地股份合作社成功和可持续发展的条件。具体而言，通过剖析崇州土地股份合作社的成功案例，本文试图回答以下问

题：为什么土地股份合作社发展需要政府介入？政府在土地股份合作社不同发展时期过程中介入的形式、特征、力度及边界如何？一个有利于土地股份合作社成功、可持续发展和创新模式扩散的生态系统是如何建立和发展起来的？

本文选择崇州案例研究是基于以下考虑：本案例 2015 年被农业部作为推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典型案例之一向全国推广。目前，崇州市建立土地股份合作社 246 个，农户参与合作社的比重超过 80%，土地规模化经营面积所占比重超过 70%，合作社职业经理人超过 2000 人，农业标准化服务覆盖率达到 92%，农作物综合机械化水平从 2010 年的 59.8% 大幅提高到现在的 90%。崇州模式为中国其它有条件的地区，通过适当的政府介入发展土地股份合作社，对实现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农民权益保护和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型升级，进而彻底解决困扰中国农村发展的“小农问题”，具有借鉴意义。

本文的主要研究发现和论文贡献包括：

1. 提出了“土地股份合作社生态系统”的分析框架，为破解中国农村所面临的土地流转、规模经营和小农赋权赋能的难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论依据；
2. 揭示了“崇州模式”背后利益相关者参与的动机和关键因素，为有条件地区发展和推广土地股份制合作社，加速小农向现代农民的进程，提供了论据；
3. 剖析了“崇州模式”背后政府介入在协调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构建与土地股份合作社发展不同阶段相适应的介入方式及其配套政策措施，进而提高政府介入的成功率，提供了可借鉴的分析框架。
4. 为推广“崇州模式”，创造有利于合作社发展（包括土地股份制合作社）的生态系统及其政策环境，提供了案例支撑和文献参考。

本文的政策建议包括：

1. 中国的合作社发展处于市场经济不健全、农民合作意识和契约精神不完善的宏观环境，重视并加强政府对农民合作社发展的引导，对于促进合作社的发展至关重要；
2. 政府的介入要因地制宜，就不同地区、不同产业和经济发展水平条件下的合作社创新，进行现象分类、特征概括及其要素、结构、功能分析，以利于分类指导，减少政策执行过程中的盲目性。
3. 生态系统的打造并非一蹴而就，需要政府因势利导、持续跟进，适时调整策略，以促进其可持续发展。

（合作社政策环境演变与政府介入研究课题组）

3.4 生态系统视角下城市志愿者参与绿色农业和农民合作社发展的路径研究

解决食品安全生产和农村的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有效途径是城市志愿者下乡参与组织农民，改变农产品生产和组织方式并对接城市消费者。在 21 世纪中国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越来越多来自城市的非政府组织和志愿者通过各渠道参与并为中国农村的可持续发展做出了贡献。中国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为城市志愿者的参与提供了有效的途径。在激发农民自组织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农民专业合作社是一个有效的组织。

本文从中国社会在食品安全方面所面临的挑战性问题出发，从城市志愿者参与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入手，探讨了数字技术时代城乡互动、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对解决食品安全和乡村可持续发展的特殊价值。基于电子商务的发展，目前学者们关注城市参与农村经济社会的视角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受经济利益的驱动，通过引进城市资本下乡，搭建电子商务平台，以市场监管方式来检验农产品质量，进而保证食品安全。二是消费者自组织网络，对接农户，以自己体验保障食品安全，尚缺乏聚焦于城市志愿者参与的农村合作社发展。

本文通过对四川省成都市蒲江 JT 水果合作社的案例研究，试图理解三个方面问题：1）城市志愿者参与乡村振兴和合作社发展的必要性及其条件；2）城市志愿者参与食品安全项目的动机及网络平台；3）城市志愿者、合作社领导人、农村社区干部群众之间相互信任关系建立的基础、条件和机制。

四川省成都市蒲江县位于成都、眉山、雅安三市区交汇处，毗邻天府新区，属成都“半小时经济圈”，农业基础发展良好，2019 年，实现农业总产值 385036 万元，是四川省现代农业建设重点县，省级农业绿色发展先进县。蒲江县 2016 年成功申报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示范县，农村电子商务发展起点高；拥有市级电子商务示范镇 2 个，市级农村电子商务试点村 14 个，农村电子商务发展战略落地实施广；与京东、邮政、易田、天虎云商等知名电商联合建成村淘服务站 30 个、京东帮服务站 17 个、镇村服务站点 150 个。农业产业的支撑，使蒲江县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促进了农户增收。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迅速发展，深刻地改变了中国城乡产业生态，在农村地区，信息基础设施不断强化，互联网使用更加便捷、成本更加低廉，让新技术和新业态扩散更更加迅速。技术和业态创新，催化了资本投资和组织形式变化。电子商务作为数字经济的一种新业态，获得飞跃的发展机会，数字新业态新业态延伸到农业上，最直接地，电子商务为农产品产销提供了新的途径，为城市参与农产品产业链活动提供了渠道，因此，城市参与的积极性和方便性提高。

通过对蒲江 JT 水果合作社的案例研究，运用生态系统框架，探寻城市参与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生态系统的边界、生态系统的环境条件、城市志愿者参与的关键因素、以及合作社建立与发展的过程。

结合国际上关于发展中国家农村可持续发展和合作社发展的文献，本文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了理论贡献：

1. 在城市化和乡村振兴的背景下，城市志愿者参与对于农村振兴和提高小农可持续生计能力的特殊价值；
2. 政府介入与城市志愿者公民参与相结合的合作社发展路径；
3. 电子商务技术背景下城市志愿者成功参与合作社发展的条件。

（张社梅、莫经梅、武斌）

3.5 生态系统视角下的中国贫困地区农村金融信贷与合作社发展的纵向研究

长期以来，解决传统农户信贷融资困境，强化农村合作金融的组织衔接功能，创造一种农村合作金融与农业产业链、农业供应链有机衔接的合作金融生态系统成为金融机构与农业农村工作者一直探索的内容。这也是中国第十九届五中全会重点针对“十四五”时期需要着力于深化农业供给侧改革、推进农业产业链现代化发展任务。农村合作金融生态系统的构建对于加快农村金融要素流动以及市场化改革、乡村振兴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本文重点围绕农民合作社在农业供应链金融信贷中，如何有效衔接小农户与现代农村金融机构、发挥农业产业链与农业供应链的作用将贫困地区的小农户有效组织起来。我们重点从两个方面进行研究：一是围绕农民合作社供应链金融信贷模式的创新，探讨了农民合作社供应链金融信贷减贫的作用机制及其减贫效应进行了评估；二是围绕农民合作社供应链金融如何运用金融科技手段，发挥数字普惠金融的作用进行数字化转型，将农民合作社供应链金融数字化普惠来发挥金融的“长尾”普惠效应推动农村合作金融生态体系的构建与完善。

具体而言，通过对国家扶贫攻坚 5 年来贫困地区农村金融信贷领域的政策变化及其各地利益相关者的探索性实践，分别从纵向（样本涉及 4 省 10 县 180 个合作社的农户参与）和横向（两类金融合作模式比较）两个侧面，揭示了不同类型农村金融合作生态系统的形成和变化及其对合作社发展的影响。通过对 2015 与 2016 年第一次调查数据和 2019 年的追踪调查数据，重点分析了农业供应链金融信贷的减贫机制，并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维度探讨了农民合作社这一主体在农业供应链金融信贷中衔接小农户的重要作用。

研究发现,自主发展模式下的农业供应链金融信贷主要通过产业发展、金融支持与风险防控等三大利益联结机制来实现对社员贫困农户的“造血式”扶贫。委托发展模式下的农业供应链金融信贷主要以优化合作社内部治理结构和利益联结机制为前提,借助政府专项扶贫资金及贫困农户信贷资金的股权量化,发挥债权和股权等资产收益扶贫作用机制,增加对无脱贫能力的贫困社员农户财产性收益来达到减贫增收的目的。为此,进一步加强合作社为载体的农业供应链金融信贷产品创新和强化合作社内部治理结构,提高合作社融资增信能力和构建农村征信体系。此外,基于农民合作社的视角,以A-F双界线分析法构建农户多维贫困综合指数,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PSM-DID)比较评估了不同主体领办型农民合作社供应链金融信贷对农户多维贫困状况的影响。发现农户获得农民合作社供应链金融信贷的概率每提高1%,农户多维贫困综合指数和多维贫困阶数下降的概率分别提高8%和10%,减贫效应显著。种养大户、企业和村干部领办型农民合作社供应链金融信贷对纯农型贫困农户均具有显著的减贫效应。农户非农收入占比越高,种养大户和村干部领办型农民合作社供应链金融信贷的减贫效应越低,而企业领办型农民合作社供应链金融信贷的减贫效应越高。因此,因地制宜的创新农民合作社供应链金融信贷产品和模式,加强农民合作社供应链金融信贷中的精准施策,对于提升金融精准扶贫成效尤为关键。

另外,在农业供应链金融数字化转型方面,重点围绕农民合作社信用体系的建设为出发点,通过地方政府对农民合作社的信用评级,将合作社的信用等级纳入到银行征信体系建设中,逐步将合作社供应链金融传统信贷业务与农村数字化乡村建设、农村征信体系建设融合起来,逐渐实现数字普惠金融的有效覆盖。具体而言,针对调查问卷数据,重点分析了农民合作社在信用评级与数字化应用过程中,农户信贷可得性的变化及银行风险水平的变动状况,预期得出的结论为:农民合作社供应链金融通过数字化征信及信用评级,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提高合作社的信用得分,提高信贷整体可得性,间接带动农户信贷可得性的提升。依托农民合作社供应链金融信用评价体系的数字化转型,对商业银行的风险水平(资产负债率、不良贷款率、合作社内部呆账坏账水平等)可能存在一定的负向影响,降低农民合作社供应链金融的风险(有待实证计量分析)。总体而言,农村贫困地区的农民合作社供应链金融依托模式创新与数字化转型,将农民合作社互惠合作组织化理念与数字金融“长尾”效应有机融合,对于完善和深化农村合作金融生态系统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申云、武斌等)

3.6 中国农村合作金融生态系统创新——四川“旭力”和“群力”模式的比较研究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三农”问题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长期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经济发展的核心是金融，农村金融是中国整体金融体系演进的一个缩影，其发展亦然较为滞后。当前，我国一方面面临着外部发达国家过剩的金融资金向全球实体经济国家转嫁和内部城市产业资本、商业资本、金融资本全面过剩双重压力；另一方面农村金融面临新的发展需求，现有农村金融制度在满足乡村振兴和统筹城乡发展方面还存在着不足，农村金融需求主体“融资难”、“融资贵”的现象仍然严峻。有别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商业性金融，以及追求特定领域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政策性金融，合作金融作为一种“弱者”的自助、“弱者与弱者”的合作与联合。它不以利润最大化为其宗旨，而以实现互助为目的，以追求组织内享有金融服务的最大公平为最高目标，成为了激发农村金融活力、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已有研究学者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区域视角研究了农村合作金融组织的性质、参与主体行为、运作机制、绩效、风险防控等问题，这对本项目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但现有文献主要针对合作金融的内涵和发展进行了研究，从金融生态视角对其实践性的探索还需加强。

本文是本项目农村金融子课题中的一部分。研究融合生态经济学、制度经济学、行为经济学、社会学、农村金融学等多学科知识，基于金融生态系统理论、制度变迁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委托代理理论、“自组织”理论等理论，通过对国内外合作经济思想及合作金融发展脉络的梳理，从金融生态视角出发聚焦四川省合作金融的典型案例分析，运用典型案例分析和归纳-演绎等分析工具，对研究金融生态主体（即：农村资金互助社、农村经济组织、供销合作社等）的行为动机，外部压力以及运行机制与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上，提出促进农村合作金融创新发展的对策建设，为政策制定者与实务界提供可供参考的经验模式。

本文在四川平原与山区自然差异迥异的地区各选择一个典型合作金融案例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案例之间的不同之处，试图回答三个方面的问题：

1. 不同经济水平的区域，合作金融形成和发展需要什么条件？
2. 农户加入合作金融生态系统的行为动机是什么，是否存在外部压力？
3. 合作金融运行机制受到哪些因素影响，其中社会资本是否是一个主要的影响因素？

本文的案例研究由彭州市旭力农村资金互助合作社和平昌县群力资金互助社构成，重点对模式异同以及对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营商环境等方面的影响进行分析；实证研究利用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库（CHFS）展开微观分析。

本文的主要研究发现和贡献在于：

1. 为理解中国特色环境下不同外部环境下金融生态主体行为动机、合作机制以及合作路径提供了理论解释；
2. 为借鉴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融合过程中，影响农村经济组织合作的基础条件，特别是基于“业缘、地缘”等强社会关系对生产、资金和供销互助的作用，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和案例解释；
3. 为探究中国农村合作金融创新模式的试验示范和推广运用提供参考价值；
4. 为揭示在“强制性制度变迁”与“诱导性制度变迁”下中国农村合作金融制度的创新提供现实依据。

本文的政策建议包括：

1. 在制度创新方面，一方面，加强上下联动，创新政府激励机制和规制；另一方面，完善市场机制调节，加快农村普惠金融建设。
2. 在管理运行方面，其一，增加社员组织群体，创优运行机制；其二，拓宽战略合作伙伴，深入“三社”融合发展；其三，提升业务服务水平，重塑合作金融理念。

（丁昭、杨道川、楼宇晴、张警晔）

3.7 社会组织主导的扶贫干预生态系统——以友成基金会妇女电商培训案例研究

社会组织参与我国农村扶贫开发已近 30 年，是贫困治理的重要主体，在扶贫理念、资源动员、模式创新、目标群体识别、灵活性、专业化等方面发挥了其独特的优势，成为政府主导下农村贫困治理的有效补充。2014 年，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扶贫开发的意见》中，明确提出“积极引导社会组织扶贫……支持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等各类组织积极从事扶贫开发事业”，社会组织扶贫作为社会扶贫的重要组成部分，已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

在“大扶贫”格局下，扶贫主体的多元性是现阶段贫困治理的主要特征之一，各级政府、高校、企业、社会组织、媒体、公民个人都加入到脱贫攻坚的行列，各主体发挥各自优势的不同扶贫方式也为贫困治理提供了多样化的案例参考。也正是由于这种多元化的特征，在实践中也出现不同主体之间缺乏协同配合的问题，出现扶贫干预“碎片化”的困境，更提出了扶贫干预后过程中和结束后，贫困地区农村发展的内生动力培养和可持续发展这样一个挑战性问题。

本研究从生态系统论的视角，以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妇女电商培训项目为例，揭示社会组织（友成）在构建的宏观、中观、微观扶贫生态系统的过程中，多层次之间、多元主体之间的相

互关联、协同进化机制，进而理解有利于贫困地区妇女企业家成长的生态系统的结构特征、功能条件及其赋能赋权的社会影响。具体而言，本文的研究问题如下：

1. 社会组织是如何以社会扶贫为契机，引领和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扶贫生态系统的？
2. 多元扶贫主体在电商扶贫项目各个不同阶段是如何互动的？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3. 针对农村妇女电商培训的高效动员、赋能、规模化的关键条件有哪些？这些条件实现的机制是什么？

选择该项目作为研究案例有如下几点考虑。首先，该项目是以社会组织为主导的扶贫项目，体现了此类扶贫项目一以贯之的“以人为本”的内源性发展理念，尊重目标群体的本质需求，强调目标群体自我发展能力的提升、以及目标群体的主体意识和潜力的有效发挥。

其次，该项目在设计上又有创新之处，形成了目标群体从增权赋能到生计改善的闭环；设置了可供多元主体参与协作的入口，有效调动了地方政府、企业、专业志愿者、媒体等多元主体参与项目的积极性；

第三，在项目实施的各阶段、各环节上，探索和积累了不同层次之间、多元利益主体之间的互动合作关系，形成有助于不同主体作用发挥和生态系统功能优化的协调机制；

第四，区别于传统或常规的农村电商培训项目，该项目强调对通过建构和发展对农村妇女赋能赋权的生态系统，通过对农村妇女中参与培训的积极和骨干学员的传、帮、带，发展农村社区妇女电商企业家群体，形成有助于妇女企业家成长和农村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系统和社会环境；

第五，该项目已运营五年，覆盖全国 8 个省份 76 个县（其中 37 个是贫困县）14909 位贫困学员，具备进行比较研究找出相关关键核心要素的条件。

本研究的主要理论贡献在于：

提出了以社会组织为主导的扶贫生态系统的概念。虽然社会组织参与贫困治理已有近 30 年的历史，但在政府呼吁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扶贫之前，社会组织在贫困治理中的利益相关方较为单一，学者们研究较多的也是社会组织贫困治理过程中与政府的互动和政社关系，鲜少有从“生态系统”的角度看待扶贫和社会组织在动员组织多元主体参与的作用；

通过研究扶贫生态体系中多元主体的互动和协作过程，为探究“大扶贫”背景下多层次、多元利益主体之间的协同配合，形成有助于地方特色和主导产业发展和企业家成长的生态系统和社会环境，提供了一个理论视角和分析框架；

围绕农村妇女的电商培训、赋能赋权和企业家群体成长的生态系统建设，本文为理解如何发现、利用和更好地利用现阶段农村发展的内生动力和发展潜力，推动自下而上的农村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案例支持。

（中国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研究部、武斌）

3.8 中国贫困地区科技小院生态系统与人才培养—布拖马铃薯科技小院案例

农业技术研发及创新扩散是促进发展中区域减贫的重要方式之一。过去几十年，无论是 CG 系统（国际农业研究磋商小组）的建立及其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研发力量的支持，以及双边多边机构的技术援助，还是各发展中国家自主的农业研发体系的设立和不断完善，都对贫困地区的农业发展产生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进而影响到那些区域的减贫进程；同时，针对一些农业研究成果较低的采纳率，农业实践需求与农业研发之间的差距，乡土知识在应对自然风险所发挥的作用等等情况，农业研发体系中的研究和推广方式不断受到反思。在农业科学技术研究方面，经历了主体转换的过程，刚开始的以科研人员为主的实验站研究（on-station research），过度到以科研人员与生产者合作的农地研究（on-farm research），后来出现以生产者为主体的农业系统研究（FSR）。在农业推广方面，也发生了从单向向双向以及多边合作的转变，参与式农业技术发展的方式的提出，则是应对了科技成果传播到采纳过程中面临的挑战：如何创建并维持一个多方有效沟通合作的平台，以使得研究推广人员和生产者都能更好地理解和使用地方资源，生成创新并实施，以提升小农户生计系统。

中国农业研发过程亦经历了上述不同的方式，更多的时候，几种方式并存，在不同区域根据不同条件和需要各自发挥作用。在贫困区域，一些来自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研究成果看似很先进，但是并不一定能作为地方创新而得以应用；另一方面，贫困区域对于能够链接市场的、适应本土条件的、有利于提高贫困户收益的农业和系统创新均有很大需求。两者的差距源于很多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是现代科研忽视了当地需求和经济社会条件，还有一个原因是推广体系不力，新成果不能启达用户，此外还有原因是单个生产者作为用户发生技术采纳行为转变的成本-收益率较高。过去十年来，由中国农业大学发起，已经在全国各个区域得到推广应用的“科技小院”成为农业创新研究及扩散的有效方式，以研究生与科技人员驻地研究，零距离、零门槛、零时差和零费用服务农户、农业企业及其他生产组织，并于 2018 年在中国科协大力支持下成立了中国农村专业技术协会科技小院联盟。在贫困地区，囿于有限的自然资源贫乏的生计资本和有限的市场渠道，即使通过科技小院的方式，农业科技创新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应用并对减贫发挥作用，仍然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本研究聚焦中国的少数民族地区，以四川农业大学在四川省凉山州布拖县（彝族为主）的科技小院为案例，拟回答以下问题：科技小院模式如何构建、以及为什么能构建多主体参与研发的结构？这种模式对于贫困地区农业技术提升、人才培养、可持续发展有什么意义？为什么在区位、基础设施和经济条件等限制下，科技小院模式能够在创新应用和减贫方面发挥作用？这种模式又对农业高等院校的人才培养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本研究采用案例研究的方法。收集数据以参与观察和日常记录为主。自 2019 年 2 月开始入驻，农学院“马铃薯研究与开发中心”先后安排 10 余名专家及学生前往小院，开展马铃薯指导工作 14 次，累计入驻达 200 天，从资源调查、原原种培育、病虫害防控以及散户安全贮藏等多方面开展马铃薯产业科研与推广工作。同步进行的是专项扶贫，团队 50 余名师生先后前往布拖县开展扶贫工作 33 次，累计服务时长 500 余天。工作报告、超过十万字的日常记录等均是重要的数据来源。也通过与布拖县、各乡镇村干部、农户的半结构访谈获取一手资料。

研究发现：

1. 科技小院为少数民族地区的减贫及减贫效果持续提供了一个多方（政府、企业、农民、合作社、研究人员等）共同工作平台，这个平台具有创新性，而且较为稳定；这个平台也是多方参与共同建成的，其中科研人员尤其是常住的研究生在动员人力资源、与政府和企业等机构沟通等方面起到重要的主导和协调作用。
2. 贫困地区的资源条件和乡土知识与发展需求之间的差距，需要外部支持来协助予以弥补。这些差距存在于基础设施、技术、资金、人力资源、信息、获取市场的渠道等等。当前的减贫策略在上述各个方面都采取了相应的措施，科技小院得以发挥作用，与这些措施紧密有关；
3. 科技小院对于当地人才培养——包括农民教育——有一定贡献，不过，外来的人力资源的支持撤出之后，仍然需要关注可持续性的问题。
4. 科技小院也是一种创新的高素质人才培养方式，对于参与的研究生的能力建设、科研和教学方式改革等已经发挥了作用；
5. 科技小院不应局限于农业科技师生和研究团队，需要社会科学特别是管理科学的参与和贡献，已解决新技术推广、应用和市场化中所面临的复杂性问题。

本研究对于农业研发创新、科技研发的减贫路径、高校人才培养等均有一定启示：

1. 科技小院为科学研究与一线需求直接对接提供了很好的条件，有助于科研人员从当地的生产或发展进程中发现研究问题、甄别适合的乡土知识、促进不同知识的融合。

2. 科技小院搭建的平台促进科研人员、政府部门、合作社、小农户、企业等的交流与合作，可以纳入当地发展规划或者农业部门的工作计划。
3. 减贫的各项工作与科技研发工作相辅相成，在脱贫巩固拓展的过程中，应考虑将科技小院纳入乡村振兴方案。
4. 科技小院对于端正研究生的研究态度，提升研究能力、服务意识和服务能力，有很大帮助，不失为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的一个方向。
5. 科技小院可升级为“科技小院+”的模式，成为多学科参与和技术创新、社会创新相结合的平台。

（马铃薯产业化研究课题组，齐顾波，武斌）

3.9 生态系统视角下高校团队支持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社区发展的案例研究

围绕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首要目标即消除贫困，中国近年来全社会参与的大规模的减贫实践，无论在体制动员、资源整合、社会参与，特别是形成创新机制和新业态方面，均新的探索和突破，对第三世界国家跨越贫困陷阱这一挑战性难题提供了示范和参考案例。在全社会参与贫困村庄发展和贫困农户能力发展方面，除了常规的党政协同、自上而下的帮扶系统的贡献外，高校和研究机构在参与减贫，特别是在贫困地区发现、发掘和培育内生动力方面的探索实践和机制创新，做出了特殊的贡献，值得总结提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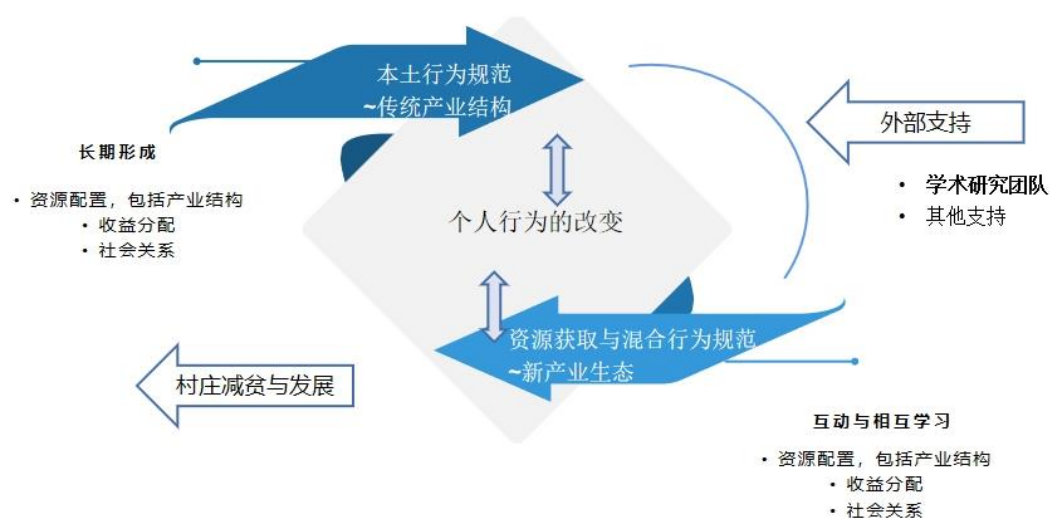
就贫困地区农村社区内生动力和可持续发展的培育而言，其起步阶段需要吸纳外部支持，促使资源集中投入，提供更多的可选择机会。一方面，实践者和学者都在不断探索和推广促进农村社区发展的机制，特别是在贫困地区的类似机制。普遍的共识是，有效的社区发展需要依靠市场营销系统的优势（Si 等，2020），在不同情况下通过资源和资本投资（例如小额信贷和风险投资）采取因地制宜的方法（Ahlstrom 2010; Banerjee and Duflo, 2012; Bruton, Ketchen, and Ireland 2013; Chen, Chang, and Bruton 2017）或采取体制变革及“穷人做主”的模式，在变革过程中为当地人民寻找机会，联合不同参与者的特长和贡献，找到创新的方式（Goel and Karri, 2019）。但是，外部支持和社区居民整合所形成的价值——有什么额外机会以及获取利益的渠道，减贫如何产生，极端贫困地区减贫成果的持续性如何，经验研究仍然欠缺。另一方面，在 1998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框架内通过的世界高等教育宣言已经明确指出：应特别注意高等教育对社会的服务作用，特别重视高等教育在那些旨在消除贫困、饥饿、文盲、环境退化和疾病、以及发展和平的活动的活动的作用。消除贫困活动中，高等教育和科研机构对未来人才的培养是长远的贡献，引领和参与减贫活动，输入技能、社会资本，开展相关

政策研究，则是当前的贡献，既能发挥高校或科研机构的能力助力减贫，同时又能在研究中发现有效减贫的规律。这个方面也存在较大的争议，即：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社会服务作为教学补充还是也作为解决社区发展问题的一份力量。

因此，社区发展与减贫实践中，高校和科研院所在发挥着什么作用，又是通过什么动员资源和整合资源的方式发挥作用的；这些支持对于高等教育和科研工作有什么意义，对于农村社区的长远发展又有什么启示，均值得进一步研究。

本研究以中国西双版纳勐腊县的一个瑶族村庄 H 村作为研究对象。H 村五年前是一个极贫困的小村庄，在过去的五年间，村庄收入水平、产业结构、基础设施建设——水电路，房屋建设、卫生条件、环境美化、农户收入结构等方面都产生了显著变化；且于 2019 年建立农民专业合作社，经营其以会议和旅游产业为主体的新经济活动；村民与外来人打交道的方式和能力出现新的特征，村民间的收入水平亦从原来的整齐划一逐渐出现差距。这些变化产生的过程中，有各种来源的外来支持，其中的一个来源是坐落于北京的一所有着 100 多年历史的农业大学的 L 教授带领的研究团队（简称 L 研究团队）。这篇论文拟回答的问题是：卷入 H 村社区发展的各种行为主体**怎么创建了一个有效的新产业形态**，继而促成村庄减贫与发展？其中 L 研究团队的角色和作用是怎样的，与其他外部支持有什么不同？

本研究主要基于 2016 年至 2019 年 L 研究团队的作者和学生收集的数据。研究对村庄中共 57 户家庭进行了个人访谈，主要内容是家庭生计变化及村民对外部支持的评价意见。整个研究过程中进行了记录，观察，以及日常交流等。每年有数个国际或国内的研讨会和会议，文献收集和参与观察也已经完成。



研究表明：

1. 学术团队采用“外部支持路径”加速了当地村民的参与，进一步提高了穷人摆脱贫困的能力。
2. 在外部研究人员进入村庄的第一阶段，权力结构以及当地人对生计资本的掌控能力有限，难以使当地人找到自己最偏好的机会。不过，伴随着外部支持力量承诺下建立的相互信任，知识共享和产业调整，形成了学术团队主导的生态系统。这个生态系统包括整合的资源，创新的社会经济治理规则和组织模式，引发了创新产业的实施，从而使社区收入结构实现巨大的飞跃。贫困人口的生计资本大量积累，也为他们寻找新的机会指明了方向。
3. 在学术团队的推动下，村民经历了观察，参与，积极参与和自组织的过程。外部支持打破了该村以前的稳定状态，使得该村慢慢实现了更高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平衡状态。村级治理结构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且在合适的时机建立了村民合作社。
4. H村形成的新的产业业态、组织模式不仅对周边或条件相似的农村社区有借鉴、辐射和带动作用，并通过各种类型的观摩、研讨和参观活动，对其它高校和研究机构参与农村社区发展和扶贫，已有很大的启示意义。

本研究发现对外部支持与社区发展的启示：外部支持的设计需要同时考虑利益最大化，以及创新适应的过程，这也是新业态的生态系统形成过程；外部和内部动力的整合比单纯强调某一方的作用更为重要；学术团队所具备的承诺和多重身份为社区发展的生态系统构建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与动力；需要进一步明确高校研究机构的参与或干预成功的初始条件及其边界条件。

（齐顾波，宋海燕，武斌，李小云*）

3.10 中国边缘地区逆向移民与乡村旅游发展—乡村旅游生态系统的建构

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关键是根除第三世界国家的农村贫困，特别是解决它的边缘地区人力资本缺乏，基础设施和产业基础薄弱的问题，而在这些地区发展乡村旅游被认为是消除贫困的有效路径。

本论文是本项目中乡村旅游子课题的一部分，聚焦于四川藏区乡村旅游在脱贫攻坚，可持续发展的作用。四川藏区是全国第二大藏族聚居区，属于全国14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范围，部分县区贫困发生率高达20%，是脱贫攻坚的重要战场。四川藏区特殊的地理区位、脆弱的生

态环境、频发的地质灾害、薄弱的经济产业等，决定了发展旅游是其实现脱贫减困的最佳选择。在中国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的背景下，我们注意到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反向（或返乡）移民的行列，即从城市逆向流动到农村，通过发展乡村旅游拉动当地经济发展和贫困农户的脱贫致富，为本地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和机遇。

目前学术界关于乡村旅游以及返乡创业的研究基础多停留在现象描述和单向度研究阶段，关注返乡创业者的意愿、返乡创业遇到的具体问题，以及阻碍乡村旅游发展的某一特定或几个因素，缺乏一个对贫困地区环境因素复杂性、多样性，及其对返乡创业和乡村旅游发展的将为系统、全面的认识和把握。事实上，边缘贫困地区的返乡创业和乡村旅游发展，是诸多主体、要素及其条件相互关联、共同作用的结果，需要系统的理解和把握。

基于我们在四川藏区的田野调研，本文试图构建一个乡村旅游的生态系统（RTE），以便理解和揭示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旅游项目的成功和可持续发展的条件。具体说来，通过收集和分析有代表性的返乡（反向）创业者的成功案例，本文试图回答三个问题：边缘贫困地区逆向移民和返乡创业背后的动机和因素是什么？在乡村旅游项目实施过程中，不同利益相关者的作用是什么？在这些案例的背后，一个有利于项目成功、可持续发展和创新模式扩散的生态系统是如何建立和发展起来的？

本论文选择四川省甘孜州作为研究对象，因为乡村旅游是该地区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和主要依托。目前已有二十多万农牧民直接或间接加入乡村旅游中来，人均增收 800 元。当地农牧民积极参与到交通运输、接待住宿、餐饮娱乐等涉旅服务项目中来，关联行业产值 2019 年突破 100 亿元，吸纳 8.5 万劳动力就业，带动 1.5 万人脱贫。而乡村旅游的发展，不仅吸引越来越多藏区青年返乡创业，而且开始吸引城市资本和管理人才到本地区，进一步推动了乡村旅游产业的发展，一个有利于本地区乡村旅游发展的生态系统的正在建立和发展中。因此，四川甘孜州乡村旅游发展案例，不仅是中国边缘贫困地区新出现的逆向移民和返乡创业助力本地区乡村旅游和可持续发展的一个缩影，也是我们理解本地区乡村旅游生态系统的一个好案例。

本论文的实证研究由 5 个案例构成，涉及民宿、农旅结合、藏族企业家（包括女性）成长、社区发展、社会企业家和国际参与。案例收集包括线上和线下访谈，以及社区实地观察调研。访谈对象以藏族企业家为主，包括村干部、村民和政府官员。

本论文的主要研究发现和论文贡献包括：首先，它为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中国等新兴经济体边缘地区农村的扶贫帮困和可持续发展研究提供了一个乡村旅游生态系统的分析框架，以解释或确定影响乡村旅游项目在成败的维度和关键因素。

其次，它为理解中国近些年来出现的逆向移民和企业家成长现象，特别是边缘贫困地区乡村旅游创业成功案例背后的关键条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第三，它为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可持续乡村旅游项目的关键因素，提供了成功的案例和有参考价值的参考。第四，它揭示四川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旅游、企业家成长、成功案例的规模扩大和模式扩散，提供了不同类型的生态系统和发展路径。

本文的政策建议包括：在西部“老少边穷地区”的乡村旅游规划、相关政策设计和项目评估中，参考、发展和应用本文提出的生态系统原则和方法；在高等院校相关的旅游专业课程，以及乡村旅游企业家、返乡创业培训课程中，介绍和应用旅游生态系统的概念、方法和案例；政府相关部门（如文旅、科技）应用本文提出的生态系统方法论框架，倡导和组织跨学科的研究团队，就不同类型的发展领域和创新生态系统现象，进行较为系统和深入的研究。

（武斌、耿宝江、廖露、王仪、Scott McCabe、曾丽萍、邓碧旂）

3.11 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创新模式与大学生返乡创业—四川藏区案例

第三世界农村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关键性，是解决边远贫困地区人力资本短缺和内生发展动力不足问题，而这一问题解决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发现、激活和有效利用外部社会资源。在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的背景下，中国贫困地区乡村旅游产业的发展正吸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包括大学生和“农民工”）返乡创业，它为本地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和机遇。在鼓励农村大学生和农村背景的企业家返乡创业的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创业资源禀赋与创业路径选择的不同导致创业效果大相径庭，对返乡创业者群体也会产生负面影响。

本文聚焦于中国贫困地区人才短缺和有代表性的返乡创业成功案例，从社会资本视角，理解乡村旅游返乡创业者如何激活、利用内部和外部资源，探索出一条符合当地实际、具有可持续性和可复制性的乡村旅游创新模式。目前学术界关于乡村旅游创新模式和社会资本研究多停留在现象描述和单向度因果分析，尚缺乏从宏观的旅游生态系统和微观的内外社会资本的相结合的角度，分析乡村旅游创新模式，及其企业家成长路径的研究。

本文以四川藏区为研究对象，通过收集和分析有代表性的返乡（反向）创业者的成功案例，试图回答三个问题：不同类型贫困区域，返乡创业家是如何形成和发展的项目创新理念的？回乡创业过程中的关键环节，决定性因素，及社会资本的作用。创业成功案例中不同类型模式的形成条件及其可持续性、可复制性。

四川藏区是全国第二大藏族聚居区，也是全国 14 个集中连片国家脱贫攻坚的主战场之一。旅游扶贫作为本地区“精准扶贫”的主要手段，已吸纳 20 多万农牧民直接或间接参与，创造了 8.5 万个劳动力就业机会，带动 1.5 万脱贫人口。乡村旅游的发展不仅吸引越来越多的藏族青年返乡创业，而且开始吸引城市资本和管理人才到本地区，缓解了本地区人力资本短缺问题，推动了乡村旅游新型业态的培育和创新模式的产生。对四川藏区乡村旅游成功案例，不仅是中国贫困地区通过乡村旅游实现当地农户脱贫和当地经济发展的一个缩影，也是我们理解社会资本在老少边穷地区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作用的一个有效的研究路径。

本论文的实证研究由 5 个案例构成，涉及民宿、农旅结合、藏族企业家（包括女性）成长、社区发展、社会企业家和国际参与。案例收集包括线上和线下访谈，以及社区实地观察调研。访谈对象以藏族企业家为主，包括村干部、村民和政府官员。

本论文可能的学术贡献包括：理解第三世界国家边缘贫困地区不同类型资源（或资本，包括：地理和生态资源、基础设施发展、社会文化环境）环境和政府扶贫干预背景下，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不同模式及其路径；理解中国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过程中，影响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特别是内外部社会资本在返乡创业成功的作用；对理解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创业成功及其示范推广价值和可持续发展的条件，具有启发意义；对揭示四川藏区乡村旅游企业家成长路径和关键条件，具有参考价值。

本文的政策建议包括：在中国欠发达地区乡村旅游规划和相关政策设计中重视社会资本的作用，特别是外部社会资本和在外地就学或已毕业工作的少数民族大学生的作用；更好地利用他们的智力和社会网络资源；动力鼓励和宣传大学生返乡创业、发展乡村旅游创业产业，协助他们建立社会网络以分享、扩散成功的创业经验，切实帮助他们克服创业起步和发展阶段面临的实际困难和挑战，为他们创业成功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政府相关部门应倡导和组织跨学科的研究团队，总结提炼不同条件下的乡村旅游创新模式，在同类区域进行示范推广。

（耿宝江、廖露、武斌、曾丽萍、邓碧旂）

4 社会影响报告

4.1 四川凉山州马铃薯产业化国际化研究示范项目

项目背景

四川是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的主要集中区之一，其中特困山区（多为少数民族聚集区）占四川总面积的 68.3%。四川是中国马铃薯的主产区之一，马铃薯是四川省少数民族地区特别是凉山彝族自治州的主要粮食作物、贫困农户的口粮以及保障和主要生计来源。凉山州依其地理、气候、水土等资源优势条件，具有发展高品质、面向国内国际市场的种薯供给基地的潜力，但面临着当地品种混杂、种薯活力低、栽培和加工技术落后等诸多挑战性问题，长期制约了马铃薯产业链的有效延伸以及在脱贫增收中的优势发挥。故凉山州政府把发展马铃薯种薯产业列入当地经济发展和脱贫攻坚的支柱产业。

为改善凉山州马铃薯产业技术落后情况，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和应用，发挥当地马铃薯产业优势，四川农业大学马铃薯研究创新团队在中国农技协、四川省科协、中国农业大学和布拖县政府等单位的大力支持下，以布拖县布江蜀丰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为依托单位，于 2019 年 2 月在中国西部贫困地区建成第一家以科技扶贫、当地特色产业发展和农民增收增收为目的的“四川布拖马铃薯科技小院”。

布拖马铃薯科技小院，以川农大马铃薯团队的科技创新为基础，以研究生长期入驻、科研团队及时帮扶的方式，及时发现、解决当地马铃薯生产中从品质选育、播种、植保，到收获、储存和加工等一系列技术问题，通过马铃薯育种基地和扶持马铃薯专业合作社的示范效应，提高当地小农的组织化程度和标准化生产水平，提高抵御气候、病虫害和市场风险的能力，并对凉山州其它区县的马铃薯产业化发展，起到新技术辐射源和规范化生产组织模式的示范作用。

布拖马铃薯科技小院的建成，不仅为本项目在四川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的开展跨学科的学术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科学实验和田野调研基地，而且为设计、观察、实施和记录本项目的社会影响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平台。依托这一平台，凉山州马铃薯产业化国际化被四川省-诺丁汉大学省校合作领导人会议（2019 年 11 月 13 日）列为 2020 年省校合作的优先领域，为进一步发展和扩大大项目的社会影响提供了坚实的组织基础和政治保证。

项目目标

针对四川特困山区的马铃薯产业化发展和科技扶贫所面临的挑战性问题，借助国家“精准扶贫”战略和四川省-诺丁汉大学省校合作的特殊机遇，本项目包含如下目标：

布拖科技小院的功能升级：通过人文社会科学参与，提升“科技小院+”技术推广模式，探索解决影响马铃薯产业化创新的短板问题，如当地农民参与积极性不高、人才外流和短缺、外地帮扶干部资源的高效利用潜力需要进一步发挥等，通过孵化社会创新来促进技术创新和马铃薯产业化发展；

凉山马铃薯产业国际化：对接协调诺丁汉大学、英国马铃薯公司和四川马铃薯公司，打开凉山州乃至四川省马铃薯种薯的海外市场，进而发展和延伸当地马铃薯的产业链条，为凉山州马铃薯的产业化和合作社发展注入新动能；

社会创新网络建设，以布拖马铃薯科技小院为平台，借鉴中国社会创新的最新成果和社会企业扶贫的经验，吸引国内顶级非政府组织和社会创新研究机构参与，形成同马铃薯技术创新相匹配的社会创新网络；

研究生和青年教师能力培养，通过组织研究生/青年教师参与田野调研，案例分析，科技服务和博客/田野调研报告的准备，帮助他们突破狭隘的专业限制，理解问题导向、跨学科和系统思考方法论的重要性，为四川省及其同诺丁汉大学在乡村振兴和可持续发展领域（包括马铃薯产业化国际化）的长期合作，培养人才。

项目活动情况

基于上述目标，本课题组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工作：参与马铃薯产业国际化圆桌会议、组织诺丁-川农大凉山州马铃薯产业化综合考察、推广新技术、建设示范基地、打造并改善马铃薯生产贮藏体系及无人机防治、通过项目与社会实践提升研究生综合能力、推广马铃薯科技小院模式至周边地区。本项目参与师生达 50 余人，项目覆盖区平均脱贫率超过 94%，累计培养 900 多名本地人才，具体项目活动情况见表 4-1。

社会影响路径

本项目的社会影响路径可以概括为提升“科技小院 +”的模式，其核心内容是：通过提升布拖马铃薯科技小院的功能定位，建构多学科多层次参与的社会创新网络，为高等教育机构的人才培养和更好地参与/服务于本地区农业产业化（包括马铃薯产业化）和农民组织创新（包括专业合作社发展）；通过英国诺丁汉大学的深度介入，吸引英国相关研究机构、企业、公司同四川相关的机构、企业、公司对接，发展产学研一体化的国际合作平台，为四川省贫困地区特色优质农产品（包括马铃薯）打开在英国和欧洲市场创造条件和平台，为本地区的乡村振兴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综合创新能力的研究和管理人才。具体而言，本项目社会影响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观察和测量：

科技小院的功能升级，由过去的“薯类专家团队+企业+农户+科技小院”的线性技术推广模式，提升为“科技小院+多学科参与+国际化+社区发展”的新模式，即在原有农业科技推广服务的基础上，通过四川农业大学农学院、经济学院、管理学院和旅游学院专家和介入，和同诺丁汉大学等国际研究机构、企业、公司的合作，为本地彝族社区和专业合作社领导人提供技术和管理培训，为四川农业大学及其它高校大学生参与马铃薯产业化、国际化和农民合作社发展提供平台。

马铃薯产业化国际化战略伙伴关系：诺丁汉大学已同苏格兰农业科学院（James Hutton Institute）、英国最大的马铃薯种薯公司（James Hutton Ltd）、四川喜玛高科农业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和四川农业大学达成战略合作协议，共同探讨凉山州马铃薯打开进军英国、欧洲和海外马铃薯种薯市场的路径、条件和行动路线图。

贫困地区社会创新网络建设：针对以贫困地区农民参与不足和合作社领导人短缺等问题，友成社会企业家扶贫基金会、中国农业大学国际发展和全球农业学院等中国顶级的非政府组织和社会创新研究中心，已经同布拖县政府达成合作协议，共同探索布拖马铃薯产业化和合作社可持续发展的相关问题，借助布拖马铃薯科技小院平台，对彝族社区/合作社领导人、返乡创业企业家和布拖科技小院大学生志愿者进行培训，形成同马铃薯技术创新相匹配的社会创新网络。

乡村振兴人才联合培养机制：本项目通过组织青年教师/研究生学术沙龙、参与田野调研、案例分析、学术论文和项目博客的撰写，帮助他们突破专业限制，理解问题导向、跨学科和系统思考方法论的重要性，为本项目结题后的长期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外本项目同国家留学基金委乡村振兴专项资助计划相衔接，促成四川农业大学同诺丁汉大学达成战略合作协议，在未来3年间（2020-2022）从川农大具备外派留学资格的教师和研究生中，联合选拔和培养赴诺丁汉大学的访问学者，通过诺丁汉大学农学院和商学院共同介入，为访问学者配备双导师，为四川省及其同诺丁汉大学在乡村振兴和可持续发展领域（包括马铃薯产业化国际化）的长期合作，培养人才。

“科技小院+”模式扩散：本项目形成的“科技小院+”的模式（多学科参与、社会创新网络和特色产业国际化）已得到各级政府、高校和研究机构的普遍认同，并开始应用到四川的其它地区和生产领域（如蜂蜜，猕猴桃），为大学和科研机构更好地参与和服务于四川省贫困地区的可持续脱贫和乡村振兴提供了有益的探索和参照系。但因新冠疫情限制，许多规划的行动（如国际合作，社会创新和领导人培训）尚无法如期进行，故提升“科技小院+”模式的实际效果尚无法充分体现，其发展潜力和社会影响有待进一步观察总结。

（马铃薯产业化研究课题组）

表 4-1 马铃薯产业国际化与学生能力培养

活动主题	活动时间	主要内容	成果体现	能力培养
马铃薯产业化国际化圆桌会议（第六届全球农业科学家院长论坛的一部分）	2019 年 11 月 14 日	中英两国在四川马铃薯产业化、国际化方面合作的愿景、目标及其路径	国际马铃薯中心、国家/四川薯类体系专家等 40 多人、英国马铃薯研究机构与公司（JHL）、四川相关企业、英国驻华使馆农业参赞 Ray Smith、诺丁汉大学助理副校长 Richard Masterman、巴西政府社会发展前部长 Tereza Campello 等参会 诺丁汉大学，英国 JHL 公司，川农大马铃薯创新团队就本项目的实施方案和行动线路图达成共识	GCRF 项目团队 30 余人出席，马铃薯课题组全体成员全程参与讨论
诺丁-川农大凉山州马铃薯产业化综合考察	2020 年 1 月 5-9 日	在四川省委组织部的协调下，实地考察凉山州和布拖县，探讨马铃薯产业化的动力机制、发展模式及其所需的顶层设计、外部条件和诺丁汉大学的作用	形成调研报告和政策建议，提交省政府和相关部门 四川喜玛马铃薯科技公司参与，同 JHL 公司对接 友成社会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参与，对接布拖县政府 中国农业大学国际发展与全球农业学院参与 就布拖科技小院的功能定位和跨学科参与达成共识 同当地相关部门/企业/合作社建立合作关系	川农大农学/经济/管理学院 15 名教师学生参与 跨学科田野调研方法论交流讨论 同政府官员，企业家，帮扶干部和彝族群众就挑战性问题及其政策对策的讨论 调研报告、博客撰写
新技术推广服务	2019 年 2 月至 2020 年 10 月	四川农业大学农学院马铃薯研究与开发中心师生多次下乡开展调研培训工作	累计服务时长 600 余天，长期入驻研究生已达 17 人，记录 12 余万字工作日志 “乌洋芋”等资源生产调研报告、马铃薯晚疫病无人机统防统治建议书、2020 年布拖马铃薯科技小院抗疫情保生产工作方案等书面文件和意见 30 余篇 指导建立当地马铃薯产业合作基地，协助创办农民夜校，为当地社区提供技能培训以促进可持续发展	川农大农学院 50 余名师生参与 研究生专业知识、综合能力的提升
示范基地建设	2019 年 2-12 月	川农大农学院马铃薯团队/布江蜀丰公司/布拖县农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布拖县农业农村局等单位共同建立了科技成果核心示范+推广应用+辐射带动的联动模式，建立马铃薯高产优质栽培标准样板	逐步推广到四川省其余贫困县（特木里镇、补尔乡、美撒乡等乡镇，昭觉县、喜德县、美姑县、甘洛县、通江县等） 开展集中培训 89 场次、现场技术指导 600 余次，提供马铃薯等作物栽培手册 2000 余份 培养科技示范户 30 余户、农技人员 100 余人、本土人才 900 余人 与马铃薯企业合作申报获得产业项目 2 项。	川农大农学院 50 余名师生参与 学生对公司运作模式的了解 撰写材料、现场演讲等综合能力的培养提升
生产贮藏体系	2019 年 2 月-2020 年 9 月	川农大农学院马铃薯团队和布江蜀丰公司共同打造了标准的“原原种—原种—生产种—商品薯”的四级薯生产体系并改善 1000 平米贮藏冻库	指导建立 5000 平米智能雾培大棚，2019 年雾培大棚繁殖原原种生产较 2018 年增加近 100 万粒，带来直接经济效益 50 万元 建立了原原种周年生产体系，成功实现一年生产原原种 460 万粒。拓展原原种基质繁育提升产能，计划周年生产原原种 1700 万粒 全产业链基地创建降低损失 30%以上，计划三年内实现布拖县优质种薯全覆盖，预计提升产能 5.1 亿元 改善 1000 平米贮藏冻库，马铃薯贮藏损失由 30%降低到 5%以内，折合效	川农大农学院 50 余名师生参与 与人沟通协调的能力、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得到较大提升 与政府官员、帮扶干部紧密联系，充分了解时政方针

			益 50 万元以上，间接效益提升 500 万元以上 农户散户贮藏，商品薯减损 5%以上、增产 10%，平均每户将减损 1000 元，增收 4000 元	
无人机植保系统	2019 年 7 月， 2020 年 7 月	四川省马铃薯专家团队和布拖马铃薯科技小院向县委县政府提交植保无人机统防统治建议以及植保无人机在飞防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建	2020 年实施进行马铃薯晚疫病防治，飞防示范面积 2 万亩，按照马铃薯种植产量损失 30%，常年平均亩产 1600 公斤，价格 1.4 元/公斤计算，今年无人机防治减损 672 万元以上 2020 年再次提交无人机防治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及建议进一步扩大防治范围与影响。	川农大农学院 20 余名师生参与 效益分析能力显著提升 新技术、新成果的推广对落后地区产能提升的重要性
研究生培养新模式	2019 年 7-8 月	川农大农学院学生围绕技术落后地区开展创业、支教等活动	以市场运作的方式全程陪伴帮助布拖农户种出优质高产、市场价格高的紫色马铃薯 创建国内外销售渠道，形成了稳定、持续且精准的扶贫模式，并将此模式复制和推广至四川省甘孜、阿坝等市州，种植规模超过 30000 亩，每年增收 1.62 亿元以上 项目覆盖区平均脱贫率超过 94%，人均收入从脱贫前不到 2000 元，增加到脱贫后的 5000 元以上。 引领 35 名农业相关专业大学生开展脱贫调研、支教、双帮扶、科技培训、科普及健康培训等社会实践	川农大农学院 50 余名师生参与 自助创业能力提升 三农情怀的培养效果更加
科技小院的影响	2019 年 2 月- 2020 年 10 月	中国农技协四川布拖马铃薯科技小院作小院建设经验分享	2020 年布拖马铃薯科技小院在全国已建 64 个中国农技协科技小院中获 得“2020 十佳中国农技协科技小院” 在全国科技小院经验建设交流及培训会中，以布拖马铃薯科技小院为助力脱贫攻坚典型案例分享经验 参与成渝地区经济圈建设 以布拖马铃薯科技小院为样板，四川新建 7 个中国农技协科技小院，已吸引至少 8 所高校共同协同发展	川农大农学院、管理学院、经济学院、园艺学院等师生参与 推进科技小院工作，进一步明确工作方向与内容 各科技小院、高校等科研单位之间不断的进行跨学科、多层次的深入交流与研讨



中央记者团采访



农户家座谈



无人机统防统治



实验成效与农户合影

4.2 四川阿坝高端蜂蜜产业化国际化研究项目

项目背景

就中国西部包括四川省的边缘地区（或“老少边穷地区”）实现农村脱贫和可持续发展而言，其最大的挑战性问题：如何更好地利用和保护当地的自然和生态资源，发展有地方特色和比较优势的主导产业/产品，形成市场品牌和规模效应，带动地方经济发展和小农生产方式的转型升级，从而更好地适应和融入外部大市场环境，增强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在这方面，诺丁汉大学-四川农业大学全球挑战研究基金（GCRF）项目选择阿坝中蜂的产业化发展问题作为一个研究对象和产生社会影响的平台，主要是基于如下理由：1）四川是中国最大的蜜蜂生产基地，而发展蜂蜜产业被 55 个县列为产业扶贫的重点领域；2）蜂蜜产业的发展同当地生态环境保护、生物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当地藏民的养蜂传统，能够有机衔接；3）同本地区生物多样性系统和近年来退耕还林还草、植被恢复相关联，许多地区（如阿坝州）能生产具有中医药医疗保健功能的高质量蜂蜜，但高端药蜜的尚未被蜂蜜高端消费者所认可和接受，存在着高质低价或优质不优价的情况，无法充分调动通过加入养蜂合作社来学习技术、标准化规模化生产、统一品牌和市场销售的积极性。

基于上述理由，本项目选择以阿坝中蜂（一个东方高端蜜蜂的亚种）产业化发展为主线，通过搭建同四川养蜂合作社明星企业（蠡鑫蜂业合作社）、黑水县兴牧养蜂合作社和阿坝州/黑水政府的合作网络平台，探索四川贫困地区蜂蜜产业化提升的突破口、农业大学师生参与技术创新扩散和蜂农合作社发展的路径和条件，为实现本地区养蜂业和合作社的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项目目标

针对四川特困山区的蜂产业化发展和扶贫所面临的挑战性问题，借助前期邛崃市蠡鑫蜂业合作社与阿坝畜牧税务局良好合作基础，以及四川省-诺丁汉大学省校合作的特殊机遇，本项目的社会影响目标可以概括为：

1. 从生态系统视角，找出四川欠发达地区特别是阿坝州养蜂合作社发展所面临的挑战性问题，探索当地产业振兴和合作社发展相互促进的途径与对策；
2. 搭建研究者和利益相关者之间交流合作的平台，促进少数民族地区高端蜂蜜的产业化、国际化和合作社发展；
3. 发展跨学科研究团队，为优秀教师和学生的成长和国际交流打造平台。

项目活动情况

为改善和推进阿坝高端蜂蜜产业化国际化进程，GCRF 课题组开展一系列研究与活动，包括建立邛崃蜜蜂科技小院、开展阿坝黑水县蜂产业综合考察等活动，为进一步发展和扩大本项目的社会影响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具体活动情况见表 4-2。

社会影响路径

本项目依托邛崃蠡鑫蜜蜂科技小院所搭建的产学研合作平台，以阿坝黑水中蜂蜜的产业化和国际化为主线，利用合作单位的技术优势、研究力量和与工业界、商业界的合作网络，突破蜂蜜精深加工和产业化、市场化的技术瓶颈；探索四川高端中蜂蜜产国际化的生态模式、发展路径和政府支持政策体系，为相关部门、地方政府、企业和合作社提供智力支持。

1. 参与养蜂协会工作和“世界蜜蜂日”的宣传：积极参与省市养蜂协会工作，从养蜂全产业链的视角，为养蜂合作社领导人和广大蜂农就养蜂产业化发展方向、商业模式选择、经营机制创新、支持政策对接、品牌形象与公众参与等问题，提供咨询服务和学术支持。从应对世界气候变化的高度，利用每年“世界蜜蜂日”公众参与的平台，提高全社会对蜜蜂对环境保护和人类生存的特殊意义，感谢广大蜂农为此所做出的贡献。
2. 阿坝蜂产业国际化路径探索：从四川阿坝州的高端蜂蜜国际化入手，针对黑水蜂蜜以中药材植作物为主，品质高、药蜜产品特色明显但产量有限的特点，制定高端化、直销化的商业模式，对产品的特效和营养物质进行鉴定，突出治愈功能优势，瞄准细分市场群体，借助诺丁汉大学平台，开展高端优质黑水中蜂蜜的商业模式设计，寻找高端蜂蜜出口的突破点，打开英国和欧洲市场，进而促进和带动本地区养蜂合作社的规范化发展。
3. 政府、企业、协会社会网络联结：蜜蜂科技小院是继粮油、生猪之后，四川农业大学与邛崃市政府、企业合作的又一个落地举措，科技小院也将成为一个新的突破，为邛崃蜜蜂产业做出新的贡献，将助力邛崃蜂业发展更上一层楼，与川农大建立更为紧密的合作关系。此外科技小院从科技创新、提质增效、脱贫攻坚角度与邛崃市科协进行合作，提升传统产业科技支撑，抓住科技小院发展机遇，从成果转化角度提出，通过市场需求将蜂业产业进行转型，以科技小院助力邛崃蜂业产业越做越大。
4. 人才培养机制：项目通过田野调研、学术沙龙等，与其他子课题进行交流学习，打开新视野，探索建立新的科技小院。邛崃蜜蜂科技小院正是在参观学习中开辟的新思路，通过充分发挥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融合、技术与经济交叉的优势，把科技小院作为学院人才培养、教学实践、科学研究的重要平台，与合作社紧密合作，实现多赢。入驻学生以此作为人生的新起点，贴近三农、服务三农，为学业、就业和事业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蜂蜜科技小院成立



电视台采访



布拖调研



黑水调研

（合作社领导人成长课题组）

表 4-2 蜂蜜产业化研究与活动情况

活动主题	活动时间	主要内容	成果体现	能力培养
诺大-川农大凉山州马铃薯产业化综合考察	2020 年 1 月 5-9 日	在四川省委组织部的协调下，考察团实地考察凉山州和布拖县，参考学习马铃薯产业化的动力机制、发展模式及其所需的顶层设计、外部条件和诺丁汉大学的作用，探索四川蜂产业发展路径	参观学习布拖马铃薯科技小院，探讨建立邛崃蜜蜂科技小院，服务四川蜂产业发展。 形成调研报告和政策建议，提交省政府和相关部门	川农大农学/经济/管理学院 15 名教师学生参与跨学科田野调研方法论交流讨论 同政府官员，企业家，帮扶干部和彝族群众就挑战性问题及其政策对策的讨论
参加“5.20 世界蜜蜂日”主题活动并做报告	2020 年 5 月 20 日	加强中蜂遗传资源保护，建立和完善蜜蜂良种繁育体系，强化蜂产业新技术新成果的示范与推广，持续推动养蜂业的转型升级	子课题组负责人张社梅教授做专题报告 张社梅教授接受了四川电视台采访，介绍了蜂产业的初级产品与精深加工产业 四川省蜂业企业、专业合作社、蜂业协会、蜂农代表等 200 多人参加活动 活动现场认购了贫困户 300 多斤蜂蜜，企业订购 6000 斤 吸引了周边上千市民参与蜜蜂与蜂产品知识科普宣传。	加强提高项目社会影响力的能力
黑水县蜂产业扶贫调研	2020 年 6 月 14-15 日	通过调研四川省阿坝自治州黑水县中蜂产业扶贫的主要进展和面临的问题，为加快推进贫困地区蜜蜂产业化进程、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寻求思路	课题组一行 5 人赴黑水县开展实地调研 通过走访、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召开座谈会等多种方式开展考察研究 了解黑水县蜂产业的基本情况、发展瓶颈、技术需求和发展趋势 形成中国国贫困地区蜂产业发展建议报告	研究生、博士生参与实地调研学习 调研报告的准备讨论、博客撰写
蜜蜂科技小院建立与发展	2020 年 9 月 1 日	通过高校研究生扎根生产与管理一线，发现并解决实际问题，对蜂产业拓展新产业、新业态提供帮助和智力支持	四名动物科技学院、管理学院研究生正式入驻蜜蜂科技小院获得中国农技协授牌 与四川省科技馆开展蜜蜂科普活动对接 参与蜂蜜果酒产品设计，并进行产品包装实践 协助合作社项目申报与宣传资料编辑，扩大社会影响	研究生长期驻扎合作社场区，参与蜂业生产生活实践

4.3 四川边缘地区乡村旅游的社区发展与大学生参与

项目背景

近十年来中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对许多边缘贫困地区发展乡村旅游来说，是一个难得的机遇，有助于扭转劳动力外流、乡村衰败的局面。但有条件发展乡村旅游的地区如何能抓住机遇，解决当地思想观念保守、社区凝聚力差、专业人才短缺的问题，这是顺利启动乡村旅游项目并使其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也是巩固扶贫攻坚成果，实现乡村振兴的挑战性问题。

贫困地区发展乡村旅游的实践经验表明，成功的乡村旅游项目固然离不开外部投资、景区规划和政府介入，但更需要挖掘旅游社区内在的潜力，激发农户参与项目的积极性，二者缺一不可。通过对旅游社区的赋权赋能，实现自上而下的外部干预同自下而上的社区发展的有机结合，这是目前贫困地区发展乡村旅游的一个薄弱环节，在这方面大学以其公立属性、各类人才和学生志愿者聚集的优势，可以也应该发挥积极的作用。

四川边缘地区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是诺丁汉大学全球挑战研究基金(GCRF)项目的重要内容。由四川农业大学旅游学院同宁波诺丁汉大学商学院合作组成的乡村旅游课题组，聚焦贫困地区发展乡村旅游的挑战性问题，即旅游社区内生动力的产生和发展，探索外部干预特别是高校生参与旅游社区发展的路径和机制，力图实现学术研究、社区参与和学生能力发展三者之间的有机结合，同步发展。本报告试图总结一年多以来本课题组的探索实践及其初步成果，为本项目研究成果的扩散、高校参与的深化和学生能力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依据和参考。

项目目标

针对四川少数民族地区发展乡村旅游的挑战性问题，在过去的研究积累和合作网络的基础上，本项目的总体目标是：通过大学生研究生参与旅游社区发展规划、领导人培训和田野调研设计和执行，提升他们理解问题、综合和创造性思维的能力，搭建川农大同旅游社区长期合作、试验示范、创新扩散的平台，为高校旅游专业的教学改革和创新性人才培养提供试验示范，为高校参与和服务于乡村振兴、特别是旅游社区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依据。本项目的具体目标包括：

1. 转变学生观念，以贫困地区旅游社区所面临的挑战性问题和成功案例为基础，思考理论学习、研究选题和参与社会实践的目的和意义，激发学生参与项目的热情和积极性，解决高校普遍存在的理论同实践脱节的问题。
2. 打破学科界限，发展跨学科、系统思维，理解贫困地区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特别旅游社区自下而上发展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3. 聚焦于旅游社区发展带头人的返乡动机、成功因素及其复制扩散条件，为破解当地人才短缺和旅游社区赋能问题，提供新的思路。
4. 同若干乡村旅游社区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破解贫困地区发展乡村旅游瓶颈和挑战性问题，提供试验示范、领导人培训和大学生实践基地。

项目活动情况

基于上述目标，本课题组一年来开展了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工作，提升学生的能力，扩大本项目的社会影响：对学生进行思想和方法论培训；设计和参与典型案例学术调研；参与旅游社区发展规划；参与示范社区基地建设；参与旅游社区技能培训项目。本项目参与的大学生（本科生和研究生）多达 600 余人次，涉及乡村旅游社区有 500 多个，其中：少数民族社区 66 个，国家重点扶贫村 28 个，主要分布在甘孜、阿坝等国家扶贫攻坚的重点州县。受益社区人口 9.1 万余人，其中：贫困人口为 65%。项目受益人数和大学生参与人数多，受益区域覆盖广，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具体项目活动情况见表 4-3。

社会影响路径

本项目自启动以来，注重对于项目社会影响的推动，关注学生参与项目情况，从多个方面引导和鼓励大学生参与乡村旅游社区发展规划，注重学生的能力提升和素质拓展，本项目的社会影响情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乡村旅游社区培训和发展规划人才队伍。本项目发展出一系列针对四川不同地理文化类型、资源环境条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旅游社区领导人进行培训的课程体系、旅游社区的发展规划模板及其学生参与团队，不仅为进一步发展和扩大本项目的社会影响力奠定了基础，而且为培养一批理解贫困地区挑战性问题、关注旅游社区发展的规划和培训人才成长创造了条件，为推进本地区旅游社区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智力资源储备。如乐山市中区乡镇干部培训班人数 60 人，课程内容侧重从行业发展角度解读乡村振兴和乡村旅游有关政策，促进中层管理干部对乡村旅游产业发展规律的理解；峨眉山家庭农场主培训班有 55 人，课程内容则侧重企业微观经营层面，介绍乡村民宿改造、运营管理、案例借鉴等实用型内容。

同政府机构和旅游社区之间的资源共享、示范合作平台。本项目通过学生参与藏区乡村旅游田野调研项目、社区发展规划项目和示范社区建设项目，同相关旅游社区、旅游景区和旅游合作社等建立了长效合作机制，搭建学校与社会组织之间的沟通平台，学校与乡政府、社会组织、地方社区联系的桥梁，通过资源共享平台，实现多方组织资源的整合运用，促进多方组织的共同发展与进步。如四川农业大学旅游学院与都江堰市飞虹社区共同合作搭建的校地合作平台，一方面，学校通过为社区管理人员开展的乡村旅游经营管理和提升培训，鼓励和引导大学

生参与飞虹社区旅游规划设计大赛，为飞虹社区乡村旅游规划提供理论支持和相应对策方案，促进了社区乡村旅游发展的可持续性，另一方面，飞虹社区作为学院实践基地，为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提供了良好的平台，促进大学生专业知识与实践能力的有效融合，推动学生能力提升和综合素质培养。同时，学院积极与经济学院、管理学院等兄弟学院开展跨学科合作，搭建大学生交流合作平台，通过研讨会、学术沙龙等形式鼓励学生跨学院、跨专业学习交流。

西南地区旅游社区可持续发展社会创新网络。针对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多、生态资源和文化资源丰富多样、旅游社区人才短缺和发展滞后的问题，本项目同诺丁汉大学创新创业中心、友成社会企业家扶贫基金会、中国农业大学国际发展和全球农业学院、甘孜云和森林学校，已形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借助川农大旅游学院和云和森林学校平台，共同组织“绿色家园、旅游社区、可持续发展”创新创业大奖赛，对有意返乡创业，发展乡村旅游的大学生和企业家进行培训，并纳入中国参与世界气候变化大会（COP26）活动的一部分。

中英乡村旅游社区发展合作。发展多层次乡村旅游培训已纳入四川省-诺丁汉大学省校合作协议的内容，并得到英国驻重庆总领事馆的支持。此外，发展中英两国在乡村旅游社区方面的交流合作也将是本课题组师生赴诺丁汉大学留学访问期间的主要工作。

(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合作社发展研究课题组)



都江堰市乡村旅游社区调研



都江堰市涉旅残疾人培训



康定市乡村旅游培训



飞虹社区旅游规划设计大赛

表 4-3 大学生参与旅游社区发展的活动方式、能力提升及其社会影响

参与方式	时间地点	主要内容	能力提升	社会影响
思想/方法培训	2020 年 4 月至 7 月，微信和腾讯网络会议，每 2 周一次	围绕本项目的田野调研设计，生态系统方法论和大学生如何参与社区发展实践，展开交流和讨论	形成以现实挑战性问题为导向的学术思考 理解社区发展、人才培养和返乡创业重要性 理解生态系统概念和方法的价值	共有 100 余位大学生，研究生参与了学术沙龙和专题讨论活动
项目田野调查	2020 年 8 月 10 月，线上线下相结合	围绕四川藏区乡村旅游的生态系统、社区发展和企业家成长开展学术研究和田野调查工作	突破专业限制，系统搜集整理二手信息，理解挑战问题和创新案例 发现理论研究不足和研究聚焦点，提出有价值的学术问题 注重样本选择程序的严格性，样本的代表性和典型性 充分利用相关资源，确保研究问题的针对性，研究对象的相关性和信息收集的完整性	针对四川藏区乡村旅游发展的瓶颈问题，同 8 个典型社区建立了互信合作关系 对上述社区企业家、社区领导人和农户，共 15 人进行了访谈，并建立了个人联系 围绕大学如何参与上述社区的发展进行了讨论，并对他们所关切的问题提出意见或建议
社区发展规划和评估（包括扶贫评估）	2020 年 5 月（四川片区） 2020 年 5 月（四川省都江堰市） 2020 年 9 月（四川省甘孜州） 2019 年 12 月（四川省甘孜州） 2020 年 1 月（贵州省黔南州） 2019 年 12 月（四川省都江堰市）	大熊猫国家公园入口社区规划 都江堰市龙池镇乡村振兴示范社区规划 康定市木格措景区研学旅游产品规划 四川省甘孜州石渠县、德格县脱贫摘帽第三方评估 贵州省黔南州三都县、荔波县、独山县脱贫摘帽第三方评估 都江堰市乡村旅游社区调研	10 名大学生参与社区调研，资料收集和规划编制 80 名大学生参与社区调研，资料收集和社区规划编制 8 名大学生参与木格措景区实地调研、资料收集和研学旅游产品规划设计 60 名大学生参与四川省甘孜州石渠县、德格县脱贫摘帽第三方评估实地调研和宣讲 90 名大学生参与贵州省黔南州三都县、荔波县、独山县脱贫摘帽第三方评估实地调研和宣讲 40 名大学生参与乡村旅游社区实地调研和资料收集	共涉及 486 个社区，9.07 万人
示范社区基地建设（包括大奖赛）	2020 年 10 月（四川省都江堰市）	飞虹社区旅游规划设计大赛	共有 300 名大学生参与飞虹社区旅游规划设计大赛	共涉及 1 个社区，260 人
社区技能培训项目	2019 年 12 月（四川省甘孜州） 2019 年 7 月（四川省都江堰市） 2020 年 3 月（四川省都江堰市） 2020 年 4 月（四川省德阳市） 2020 年 10 月（四川省乐山市） 2020 年 10 月（四川省乐山市）	康定市乡村旅游培训 都江堰市涉旅残疾人培训 都江堰青城后山农家乐培训 德阳市罗江区职业农民培训 乐山市中区乡镇干部培训 峨眉山市家庭农场培训	共有 44 名大学生参与乡村旅游培训活动资料整理和培训宣讲	共涉及 33 个社区，605 人

4.4 西部自然保护区的社会创新与社区可持续发展

项目背景

到 2017 年底，中国共建立自然保护区 2750 个，总面积 147.17 万平方千米，占陆域国土面积的 14.86%，为保护生物多样性、自然资源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面临着保护区周边农村社区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和不平衡的问题。由于保护区内国家级贫困县所占比例高，农户以传统农业为主，对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高，利用方式简单，加之生态补偿机制不完善，缺乏多方参与特别是公众参与的有效机制。

为了破解上述难题，中国的社会创新机构、环境公益组织在保护区社区发展方面进行积极地探索。2015 年以来，中国的自然教育开始蓬勃发展，有超过 20 家自然教育机构在保护区周边社区开展自然体验的活动，试图通过社会创新，探索用商业的手段解决保护区发展面临的问题。位于四川省藏区的登龙云合森林学校本就是其中的一个成功的代表，它通过旅游社区参与自然教育项目，探索出一个解决本地区多方参与、社区发展和环境保护的社会创新模式，并开始对当地的教育系统和中国西部地区自然保护区的管理培训系统产生影响。

本案例的成功实践，同友成社会企业家扶贫基金会-中国最有影响的非政府组织-的对本案例核心人物，登龙云合森林学校创始人的刘璇的培训和扶持密不可分。刘璇通过入选参与友成基金会的社会企业家培训和赋能平台——“猎鹰计划”，不仅明确了森林学校的战略定位，而且得到了社会企业在其初创期所需要的外部资源，例如推广、宣传、网络连接、人才推荐和社会企业的资质认可。本案例也为进一步发展同四川农业大学和友成基金会在未来乡村旅游企业家的培训，扩大全球挑战基金基金项目在中国自然保护区旅游社区建设方面的社会影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项目目标

1999 年，墨尔多山区域正式被确立为四川省省级自然生态综合型保护区，甘孜州丹巴县中路乡被划定在此保护区的实验区。这意味着，自然保护区中的群众需要遵守保护区相关法律法规，彻底抛弃以前的掠夺资源，破坏环境为代价的生产生活方式。基于丹巴乡村旅游资源的特点和前十年旅游开发的经验和教训，当地政府发现原来采用的“政府+投资公司+景区管理公司+社区”的开发模式并不能给当地社区带来可持续的发展，反而造成了投资公司 / 景区管理公司和当地社区的矛盾。为此，当地政府 2015 年邀请登龙云合团队对中路乡发展乡村旅游进行规划设计，提供一个乡村可持续旅游的经营模式。

经过七个月的社区调查，登龙云合团队发现社区发展瓶颈主要在于社区能力不足，人才流失严重，村民的环境保护意识有待提高，产业相对单一。针对以上的问题，登龙云合团队决定建立一所森林学校（生态环境教育与社区发展中心），通过自然教育和体验的手段，将当地农村社区优质的旅游资源转化为教育型旅行的产品，协助社区村民建立自己的乡村旅游专业合作社，用协议的方式保证多方参与和合作，带动当地社区可持续发展。本案例的核心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国际参与的生态教育。**为了解决当地环境意识薄弱的问题，森林学校开发设计一套生态教育课程系统，通过研学旅行活动方式，深度挖掘当地的文化自然特点，创意独特，活动体验性强，并与当地社区有良好互动。截止 2019 年 12 月，森林学校的课程共吸引了来自英国、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 20 个国家和地区 700 多位游客，他们在中路藏寨的平均停留时间也从以前的 2 天增加到了 7 天，平均花费从 200 元提升至 5600 元，为当地村民创造了可观的收益。森林学校采用对研学者收费、对当地人免费的模式，既降低了当地人参与环境教育的门槛，也可维持森林学校的正常运营。通过参与一次次的环境教育，村民们逐渐认识到伐木、采石、垃圾、废水、地膜、肥料等等的危害性，对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也有了更多的认识，也提升了他们的文化自信，有意识地去保护自己家乡的环境和文化。
2. **社区参与的生态建筑。**森林学校的生态建筑成为吸引当地群众参与社区发展的一个重要契机。森林学校与当地农户共同探究什么是最适合当地的生态建筑，并尽量采用当地技艺，聘请当地匠人，而非像其它旅游项目那样，从外面请更便宜的汉族工人。此外，森林学校还邀请了一些知名设计师参与森林学校的建筑设计，实现传统技艺与当代设计的相互交流和融合。共有 40 余位优秀设计师参与森林学校的设计，45 位当地工匠参与了森林学校的建设过程。同时，森林学校还积极探索垃圾与污水的处理和新能源的利用，启动在地垃圾问题调研，推广对土地更友好的种植方式，倡导中路乡游客及村民环境友善行为公约，挖掘当地传统文化中的生态知识等等活动，给村民们提供了生动形象的“生态教育课程”。
3. **发展生态产业链。**丹巴县是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县，也是贫困地区，当地农业生产单一，土豆、玉米、青稞、羌根，既是口粮也喂养牲畜，蔬菜瓜果等经济作物受环境所限难以发展。为改善和提升社区农产品收益，森林学校在充分考察环境和评估日照、水源、土壤等综合条件后，在学校土地范围内种植马鞭草、薰衣草、萝卜等可深加工农作物，帮他们把现有土地做成农业景观，发展即可观赏又能产生经济价值的作物。2019 年，森林学校协助当地合作社获得了一百万的政府扶贫示范项目资金，发展薰衣草种植示范，已成为代表中路形象的文创产品进入市场。

4. **社区能力建设。**自 2015 年森林学校建立以来，为来自当地 5 个村的近 700 位村民定期提供生态旅游、民宿管理、游客接待、餐饮技能、垃圾处理、自然导赏等旅游技能培训，在提升社区竞争力的同时也激发了村民的活力。通过定期为社区输入国内外研学旅行团，为社区居民提供餐饮服务、住宿服务、车辆服务、社区导赏等工作岗位，为社区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稳定和实际的经济收益。在森林学校的积极推动下，学校所在的村成立了“丹巴呷仁衣乡村旅游专业合作社”，发展当地农产品和乡村特色旅游。通过农旅合作社，与合作社成员家庭签订了“中路乡好邻居公约”、“保护与发展协议”等基础性条款，以保证当地居民不盗猎、不砍伐树木和采挖石头等破坏保护区环境的事情。当地旅游社区的发展也吸引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返乡工作和创业。

社会影响路径

1. 以森林学校为基地，森林学校的自然教育课程已融入丹巴县中小学正规教育体系中，并获得了师生们热烈的反响，为培养一大批热爱家乡，自觉保护环境的新一代青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 森林学校的成功模式得到多地国家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的肯定，纷纷邀请为其管辖的干部和巡护员进行社区发展方面的培训。近年来森林学校先后为祁连山国家公园、三江源国家公园、格聂山自然保护区、丹巴县文旅局进行了 12 场培训，参加人数超过 800 人。
3. 森林学校同诺丁汉大学、友成基金会、四川农业大学等单位合作，围绕西南地区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企业家成长和大学生返乡创业等问题，建立合作研究、培训网络，发展试验示范项目。
4. 森林学校已同英国及其它欧洲国家的教育和环保机构、组织发展起密切的合作关系，准备围绕世界气候大会（COP26）主题，动员社会各界参与绿色生态旅游、环境保护、社区可持续发展项目，发出中国的声音。

（刘晓梅、武斌）



国际参与的生态教育



社区能力建设



轻干预方法种植的薰衣草

4.5 中国贫困地区生态农业发展与社会生态建设

项目背景

随着中国城市化和居民收入水平的迅速发展，人们对安全和有机食品的需求日趋强烈，也激励越来越多的城市资本和企业到农村承包土地，发展有机农业。然而，在这个过程中有许多企业或投资人惨遭失败，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长期主义和生态系统的理念和维度，不善于把企业的发展、农户脱贫、农村社区发展，三者有机地统一起来，以至于“有机农业”缺少与之匹配的社会土壤和环境。

针对制约中国有机农业发展的“社会瓶颈”问题，本文通过对云南碧丽源生态茶园的成功案例的剖析，试图揭示自然生态、商业生态和社会生态相互依赖、同步建设的必要性，和社会公益组织在帮助商业企业融入当地社会、促进社区可持续发展的作用。

2000 年创建于广东顺德的碧丽源茶业有限公司主要从事茶叶欧美市场的贸易，由于严格的质量把控，成为英国顶级茶品牌 Twining 的中国供应商。2000 年 7 月 1 日，进入欧盟市场的茶叶实行最低农残限量标准，使中国出口欧盟的茶叶遇到很大困难。因此碧丽源创始人邹氏姐妹决心要在茶叶种植源头寻找一种不一样的茶叶种植方式，并让“中国茶叶”这个符号重新闪现光辉。恰在此时，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始人王平理事长正在各地调研社会企业的理念和实践。一个偶然的机会，两位创始人碰到了一起，王平理事长向碧丽源创始人讲述了社会企业的概念和实践，立即点燃了碧丽源创始人心中的梦想：一定要用生态的方式来建设生态的茶园，一定要用社会企业的方式来建立良好的社会生态。

经过 15 年的发展，碧丽源不仅在边远贫困地区建立起来全国最大的连片有机茶园，成为地方的龙头企业，其“65 里林间茶”品牌的有机茶正在开始获得市场认可，并且为所在地区农民脱贫致富和地区经济做出了直接贡献。

项目设计：长期主义和生态系统理念

有机茶叶及其品质对自然环境条件，尤其是土壤、水源、空气质量等因素高度依赖，而茶叶的采摘和加工又依赖于工人的态度和技艺。有机茶叶企业家需要巨大的耐心和爱心同当地农民打交道。碧丽源创始人将企业的愿景定为：不求 500 强，但求 500 年，这个愿景体现了企业强烈的长期主义价值观。碧丽源的价值观是：出色做茶，本色做人。

自然的生态环境是有机茶园的核心，通过生物多样性系统的建立控制茶树病、虫害，最大限度地避免采用化学农药化肥，是碧丽源的选址原则，并据此确定了土壤保护、水源保护、植被保护和动物保护的策略和茶叶生产规划。

生态茶园的建立离不开可持续的商业运作模式来支撑。碧丽源摒弃任何急功近利的发展模式，而是像培养生态环境一样培育用户和消费者、合作伙伴。

本项目的另一个关键之处在于社会生态的建立。得益于友成基金会的理念倡导和专业支持，碧丽源创始人一开始就被社会企业的概念所吸引，致力于打造有利于农村社区、企业员工、利益相关方共同发展的企业。在建园初期（2007 年），碧丽源邀请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到芒摆村考察，形成了第一份关于企业如何和社会共同发展的“整村推进”的战略计划，明确了“保护自然生态环境和资源有效开发并举，以和谐求生存；追求茶农和茶工的幸福与有质的茶品并举，以义利求发展”的理念，至今依然是企业的指引。

项目实施：自然、经济、社会生态圈的建立

2006 年，科学选址兼顾自然和社会条件。采用茶叶品质风味反向选择的方式，碧丽源在全国主要茶产区进行实地探访和区域性综合品质考量，最终选择在位于北回归线的“生物优生带”的云南沧源佤族自治县芒摆村落落地。

2007-2008 年，在保护生态的前提下开荒种茶。生态茶场利用分布在海拔 1500-1820 米之间共 1 万 5 千亩的抛荒地，通过当地政府支持、动员、组织佤族村民一起开荒，不仅保留了 16 万株当地的原生桫欏木，还保留了梗边草，防止水土流失。

2009-2014 年，茶园建设和国际参与。碧丽源立足于国际市场和国际标准建设生态茶园。2011 年碧丽源·芒摆有机茶园分别获得中国、日本、美国、欧盟有机认证，2012 年成为中国第一家获得“雨林联盟”国际可持续农业认证的企业。此外，2011 年碧丽源和国际客户共同在芒摆村建了“芒摆茶农之家”（社区中心），包括卫生室、技术培训室、图书室、体育活动室、标准篮球场等，为村民的社区参与、项目培训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培育，创造了条件。社区中心的建立及其一系列培训课程的实施，给芒摆村村民的观念和行为方式带来了质的变化：1）改善村民的卫生习惯；2）鼓励并资助贫困家庭孩子去“农校”学习，获得一技之长，引导孩子用知识改变命运；3）丰富了茶农的文化生活（定期举办茶农运动会）；4）茶农爱护环境的意识得到极大的提升，主动维护茶园环境。

2015-2016 年，“65 里林间茶”品牌建立。“有香气性格”的有机茶开始进入市场，受到年轻白领阶层以及具有高品质生活的消费者的喜爱，和越来越多具有责任消费意识以及倡导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的机构客户的认同。

2017-2020 年，生态茶园的价值溢出和社会影响效应。在有机茶市场品牌效应取得进展的同时，碧丽源有机茶园也逐渐成为沧源县的一个独特生态景观，为发展环境教育和乡村旅游产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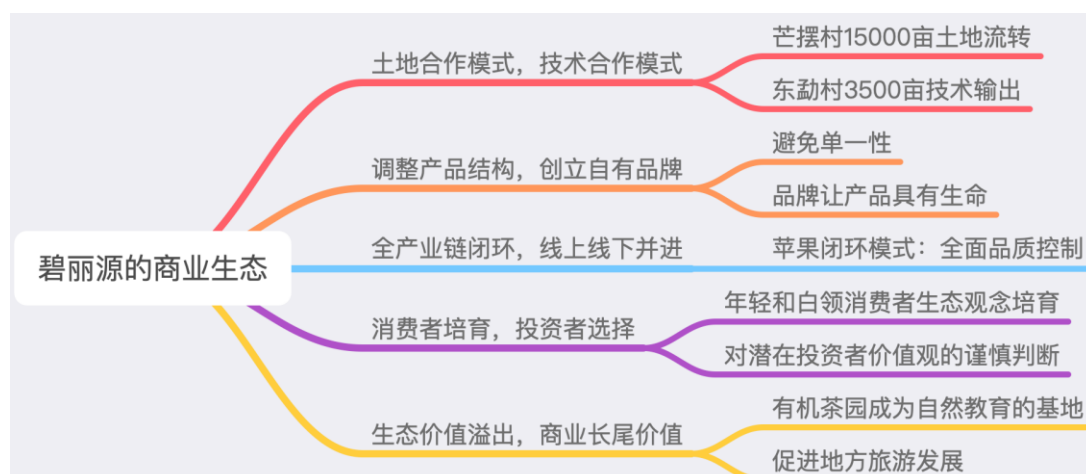
提供了基础。在沧源县政府的支持下，碧丽源正在规划将有机茶园变成自然教育和生态体验的目的地，把现代农业与自然教育结合，融入茶文化、民俗文化等元素的综合性现代生态农业园区。

碧丽源模式可以概括为：以有机生态茶园为基础，以出口和高端市场为目标的自然生态圈、商业生态圈、社会生态圈，同步建设、相互衔接匹配的过程。

1. 自然生态圈建设的关键在于形成立体植被和生物多样性群落，使茶树受到不同害虫危害时，通过不同的植物信息素的产生，吸引到足够多的天敌来消灭害虫，而不需要用任何农药进行人为干预。



2. 商业生态圈建设基于“不求 500 强，但求 500 年”的可持续发展理念，以“十年磨一剑”的时间尺度上来规划企业发展战略，和贫困乡村多种合作模式，创立自有品牌，培育市场和消费者群体，发挥生态溢出效益，创造商业长尾价值。



- 碧丽源的社会生态。 碧丽源通过与芒摆村农户土地流转的方式，整合芒摆村各村民小组集体 11280 亩荒山荒坡，以“公司所有，分户承包”的管理模式开发有机茶园，当地农户在茶园上至少可以获得地租、茶园管理费及鲜叶销售收入。2016 年芒摆村获批“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其主要原因正是碧丽源茶园起到的贡献。截止 2015 年底，芒摆村茶农人均可支配纯收入 9072 元，最高达 11044 元，比全县农民人均可支配纯收入高 1173 元。村民热爱自己的村庄，热爱茶园，企业和社区形成和谐的生态关系：碧丽源通过流转荒山、改变土地的利用方式，建立可持续的茶叶种植、生产加工、销售的全产业链，使村民自然融入现代茶叶产业链中。



社会影响路径

碧丽源案例是近年来中国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和投资人，探索生态农业、农民脱贫致富和农村可持续发展三者间协调、同步发展的一个缩影，是践行企业社会责任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成功案例，其中社会组织（友成基金会）的观念倡导和国际公司的观念认同及支持，对中国企业参与贫困地区发展有机农业，形成良性的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也具有示范价值和引领作用。

从后扶贫时期乡村振兴和企业如何在提升改善社会环境的过程中产生自己的利益、助力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而言，我们认为碧丽源模式未来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扩大其应有的社会影响。

- 从企业端而言，继续摸索并提升其商业模式中的创新性，提升品牌的影响力，让“65 里林间茶”成为中国第一有机茶品牌，以此在国民中倡导品质生活和责任消费的理念；

2. 从政府端而言，国家或地方相关政府部门和研究机构联手，就碧丽源模式背后的生态农业和农村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生态系统建设，组织专题调研和政策研讨，创造有利于负责任的企业成长和投资生态农业的体制、政策和人才环境；
3. 从社会组织端而言，要积极将碧丽源案例推广至联合国 SDGs 的实践经验中，成为中国企业参与 SDGs 建设的标杆，让更多的国家和地区的企业，不仅能参与 SDGs 的实现，并且能在这个过程中获利；
4. 从学界而言，在全国农业高校系统、企业家/大学生返乡创新创业教育培训课程中，介绍“碧丽源案例”，吸引更多的涉农企业家、投资人同社会组织联手，为乡村振兴的新型人才培养做出贡献。系统总结和提炼“碧丽源案例”，争取纳入全球商学院/管理学院系统的企业社会责任（CSR）、责任管理教育（PRME）等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的课程和培训教材中；
5. 把“碧丽源案例”纳入中英两国生态农业合作试验示范项目中，鼓励更多的英国农业企业、贸易公司、科研机构，参与，扩大中国西部欠发达地区特色、优质、有机农产品的出口和品牌建立，并探索“碧丽源模式”对一带一路国家援助和农村可持续发展的意义。

（中国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研究部、武斌）

5 学生能力发展报告

同本项目的研究和社会影响目标密切相关，本项目能力建设目标是培养一批善于理解贫困地区所面临的挑战性问题、热心于乡村振兴事业、乐于发展跨学科思维和跨文化交流的大学生、研究生，其具体目标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突出以现实挑战性问题为导向的理论和学术思考，扭转理论脱离实际或从概念、愿景出发思考、讨论问题的思维习惯或定式，理解现实问题的复杂性；
- 打破狭隘的专业思维束缚，发展跨学科、跨领域思维能力，学习、理解和应用生态系统性概念方法来设计研究项目，准备学术论文；
- 提高理论与实践结合能力、同利益相关者交流沟通的能力，以开放的心态向群众学习，更好地利用田野调查机会发现问题、基层干部群众好的思路和实践；
- 发展跨专业研究设计、田野调查、论文写作和学术交流能力，促进学术产出和项目成果的社会扩散。

上述目标通过组织学生参与项目和课题组会议，举办学术沙龙和方法论讲座，参与田野调研、案例分析、学术论文和项目博客的撰写等方式实现。学生能力发展报告包括两个部分：参与项目学生的问卷调查报告；部分参与项目学生撰写的心得体会。

5.1 参与学生问卷调查报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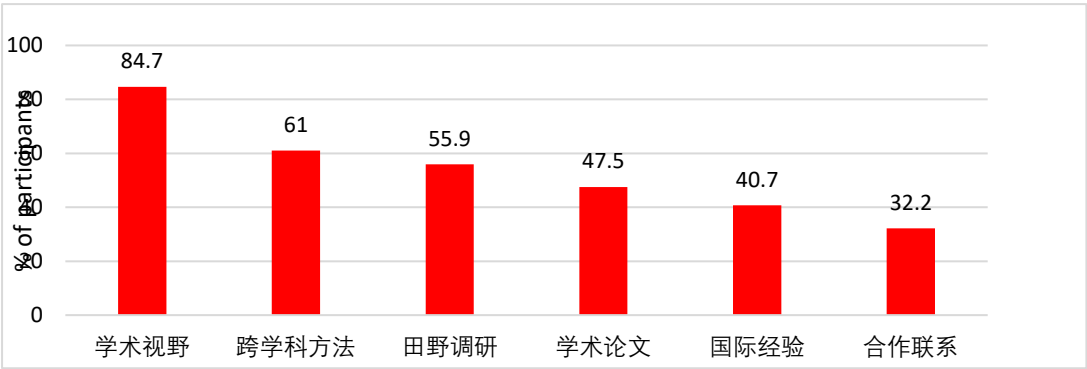
本项目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帮助参与项目的大学生、研究生，理解挑战性问题，发展综合思维和科研创新能力。来自四川农业大学和中国农业大学的 59 名学生参与了线上问卷调查，其中四川农大占 80%（47 名），中国农大 20%（12 名）。参与问卷调查的学生以硕士生为主（52.5%），其次为博士生（30.5%）和本科生（16.9%）。

本项目的突出特点是跨学科参与，涉及专业包括农艺、育种、植物学、农学、农经、管理、金融、社会学、乡村旅游、国际贸易等专业，和农学院、经济学院、管理学院、旅游学院、人文发展学院等 5 个学院，其中，来自管理学院的学生占参与问卷调查学生的一半（50.8%），其它依次为：人文发展学院（20.3%），农学院（11.9%），经济学院和旅游学院（各占 8.5%）。

就学生参与项目的渠道而言，55.9% 的学生以课题组成员的身份参与，15.3% 的学生通过接受论文联合指导的方式（主要是中国农大的学生）参与，而近三成（28.8%）的学生则是通过 GCRF 学术沙龙（先后举办三次：生态系统方法论，研究设计方法论和田野调查方法论）参与项目。就学生参与项目的具体方式而言，多数受访学生至少参与过以下四种活动中两种活动（平均值为 2.5），其中：参与课题组会议和学术沙龙各占受访学生的 71.2%，而田野调查（包括线下和线上调研）和论文/博客撰写分别占受访者的 61% 和 47.5%。

关于学生参与项目的动机问题，问卷围绕拓宽学术视野、学习跨学科研究方法、发展田野调研能力、准备学术/毕业论文、积累参与国际项目的经验、建立更多合作联系等 6 方面请受访者选择，多数学生选择 3 个以上的因素（平均值为 3.2），其中选择拓宽学术视野占受访学生的 84.5%，位居第一；跨学科方法论位居第 2（61%），从第 3 到第 6 位分别为田野调研、学术论文、国际经验和合作联系（见图 5-1）

图 5-1 学生参与项目的动机(多选， %)



通过一年多项目参与，学生究竟在哪些方面有所收获或感受到明显的提高呢？表 5-1 列出同本项目总体相关的 10 个方面具体目标，请受访者打分，最高分为 5，最低分为 1。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受访者对本项目的 10 具体目标均给予以积极的肯定和较高的评价，各项指标的平均值均在 3.6 以上。其中，近 80%的受访者对“问题导向的研究和交流能力”表示认同，给出 5 或 4 的高分，平均值为 4.15，位居榜首。位列第 2 至第 4 位的收获，分别是“用开放思维设计田野调查”、“从挑战性问题出发思考问题”、“本土知识/草根创新的重要性”，得到 70%以上的受访者的认可。即使得分最低的“理解合作社发展与小农赋能的关系”和“提高学术论文/博客的写作能力”的平均值也在 3.6 左右，得到过半受访学生的高度肯定。总体而言，受访学生对本项目学生能力发展方面的各个具体目标均给予积极的肯定和较高的认同，表明本项目在发展学生能力方面的努力和探索，取得了圆满的结果。

表 5-1 您参与本项目的主要收获体现在哪些方面（1 为最小，5 为最大）？

主要指标	平均值	4/5 占比	排序
从挑战性问题出发思考问题	3.90	71.2%	3
合作社发展与小农赋能关系	3.63	54.2%	9
生态系统方法论的重要性	3.81	66.1%	6
搭建利益相关者合作平台	3.69	59.3%	7
用开放思维设计田野调查	3.95	74.6%	2
本土知识/草根创新的重要性	3.95	69.5%	4
问题导向的研究与交流能力	4.15	79.7%	1
研究样本的代表性/选择程序	3.85	66.1%	5
典型案例的边界、初始条件	3.65	59.3%	8
学术论文/博客的写作能力	3.58	55.9%	10

为了检验不同的项目参与方式对学生能力影响的差异，我们要求受访者在表 5-2 中选择合适的栏目打钩。结果显示：

1. 参加项目课题组会议对学生能力发展的四个方面（理解挑战性问题能力，生态系统思考能力，跨界交流能力和研究创新能力）均有帮助，相对均衡，但对理解挑战性问题方面的影响较为明显；
2. 参加项目组织的学术或方法论沙龙对学生提高跨界交流能力作用突出，得到一半受访者的肯定；
3. 对于有机会参与同本项目相关的农村田野调研的学生来说，他们在能力发展的四个方面具有收获，在跨界交流能力提高方面较为明显；
4. 对有机会接受论文（含学术论文和学生毕业论文）和项目博客写作准备指导的学生来说，他们特别强调对科研创新能力的提高，明显高于其它方面的影响。

表 5-2 以下何种参与方式对你的能力发展起到了明显的作用？（%）

参与方式	理解挑战性问题	生态系统思考	跨界交流能力	研究创新能力
项目课题组会议	32.2	20.3	27.1	20.3
学术/方法论沙龙	13.6	16.9	50.8	18.6
农村田野调查	16.9	25.4	33.9	23.7
论文/博客准备	25.4	10.2	20.3	44.1

总结本项目对学生能力发展的影响，受访学生要求对能力提高的四个方面目标和对项目的总体评价打分，分别为：优秀，良好，及格，不及格，失望和不好说。问卷结果显示（表 5-3）：

1) 90%以上的受访者对上述目标的评价为“优秀”或“良好”，有少数学生给出“及格”或“不好说”，无填“不及格”或“失望”；对“理解挑战性问题”和“跨界交流能力”的评价较高，位列第 1 和第 2；3) 71.2%的学生对本项目的总体评价为“优秀”，25.4%为“良好”。表 5-3 从不同侧面确认，本项目在学生能力发展方面，已经取得积极的成果，达到甚至超过项目的预期目标。

表 5-3 从学生能力发展目标角度，您对本项目的总体评价是？（%）

参与方式	不好说	及格	良好	优秀	排序
理解挑战性问题	—	5.1	30.5	66.4	1
生态系统思考	3.4	6.8	33.9	55.9	4
跨界交流能力	—	3.4	30.5	66.1	2
研究创新能力	—	5.1	37.3	57.6	3
项目总体	3.4	—	25.4	71.2	—

考虑本项目结束后，本项目对发展诺丁汉大学同四川农业大学和中国农业大学之间校际合作的影响渠道和学生愿望，调查问卷列举了 4 个建议供受访者选择，分别是：

- 1. 定期举办跨专业学术沙龙，推动生态系统方法论的发展和应用；
- 2. 定期组织跨高校学生研讨会，交流田野调研经验和撰写论文体会；
- 3. 组建学生志愿者系统研究和实践网络，为同诺大合作奠定基础；
- 4. 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对接，讲好“中国故事”。

表 5-4 显示，上述提议均得到受访者的积极回应和充分支持，并能通过组建和参与跨学院、跨高校的学生志愿者网络的形式得到落实。

表 5-4 从扩大本项目的社会影响的角度，你对以下建议持何态度？（%）

建议内容	不好说	同意	完全同意	强烈支持
定期举办跨专业学术沙龙，推动生态系统方法论的发展和应用	5.1	25.4	47.5	22.0
定期组织跨高校学生研讨会，交流田野调研经验和撰写论文体会	3.4	23.7	40.7	32.2
组建学生志愿者系统研究和实践网络，为同诺大合作奠定基础	1.7	22.0	44.1	32.2
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对接，讲好“中国故事”	6.8	27.1	30.5	35.6

（武斌，丁昭，杨道川，牛德梅等）

5.2 参与学生心得体会报告

发展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方法

对于一个刚进入研究生的学生来说，初次调研其重要价值和挑战不言而喻。从第一次接触 GCRF 项目时，自己已经在着手阅读合作社运行机制和绩效评价的文献，并开始写关于合作社的文献综述。从合作社运行机制和绩效评价——合作社信用合作——农村合作金融——要素禀赋对合作社成立及农户入社的影响的文献综述，并和课题组的成员多次讨论设计针对农户入社问卷和访问合作社负责人的问卷。现实总是那么残酷，当真正下了乡，入了村，你才发现自己随生于斯、长于此，却始终不够了解农户、农村和农业；俗话说“五里不同村，十里不同俗”，想要真正了解农村是不可能的，几千年的中华文化分布于全国 18.7 万个村，3.5 万个乡镇，真正认识“三农”是件困难的事情。

好酒不怕巷子深，好事就怕人上心。无论是参与凉山布拖调研新型农村经济组织和村集体经济组织携手脱贫攻坚，走向全面小康之路，还是带队前往彭州调研家庭要素禀赋对农户参与合作社的影响的实地调研，我们都可以感受到，合作社的生命周期和人的生老病衰一样，合作

社成立需要契机，需要平台，农户加入合作社需要社会资本、需要人力资源、需要物质资本等要素。合作社自身理性的，趋利避害，在有限资源且完全竞争市场与不完全平等的地位当中，谋发展是很困难的。正如华为对外宣传那样：“我们只想活下来”，合作社亦是如此。

经历这几次调研经历，我们发现当前的合作社发展以规模小、经营弱、投资分散向组织联合、业务综合、产业融合发展。对于没有成立合作社的地区，村集体经济组织正在奋力突破，探索村委会+返乡创业农民+合作社或企业的发展新路径。贫困地区或发展落后地区唯有重点发展产业，以产业发展促动合作社的成立和发展才是关键。

（杨道川，合作社金融课题组硕士生）

应用生态系统理论研究现实问题

自参与课题以来，收获主要有以下三方面：**一是对生态系统理论及其方法论有了一定的了解。**生态系统是一个进化、发展、演化的系统，要求在研究中需要用发展的眼光观察、思考问题，尤其需厘清事务发展的边界条件与初始条件，分析在不同边界条件和初始条件下可能产生哪些结果。相比于一般的计量分析方法研究一个变量对另一个变量的影响及其中介/调节效应，运用生态系统的方法论分析问题更能了解事物发展的全貌。**二是训练了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思维。**从课题选题伊始，始终围绕研究需要解决的挑战性问题进行思考，从合作社扶贫到合作社发展再到农村可持续扶贫，最终明确合作社扶贫只是诸多减贫手段之一，可持续扶贫的关键在于地区主导产业发展。找准挑战性问题是确定研究是否具有价值的关键。**三是开始关注项目研究的社会影响。**以往我对项目研究的认识多关注于学术成果，关注结题报告及学术论文的发表，对社会影响仅聚焦于政策建议稿。参与本项目研究之后，我对项目研究的社会影响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子课题积极推进黑水蜂蜜的国际市场开拓，致力于为地区实现可持续扶贫开拓实实在在的道路，使我认识到社会影响还可以转变为能落地的具体项目。

（陈锐，合作社领导人课题组博士生）

参与布拖田野调研的体会

此项目中实际参与收获与感悟最为深刻部分为布拖县马铃薯调研，武斌老师提出了此行的三点诉求：一是要向当地干部学习，前期梳理的计划、提问的访谈内容可以参考但是不能死板的运用，而是要将当地好的想法、做法收集汇总，有针对性的提问，二是结合了解自身情况，了解我们（大学、公司等依托单位）一起可以做什么，从中发现共同需求，为后来发展行动方案打基础，三是调研的过程中涉及拍照、录音，农户的姓名等细节时，要特别注意征得受访者

同意，不能犯底线错误。这些考虑具体全面的调研思考方式，都是我们后期自行开展调研工作时，要严格细致注意的地方。

原计划安排同农户对话环节通过提前拟定的问卷进行，而实际调研中，老师们还是鼓励我们直接同农户进行沟通来引入主题，获取我们期望收获的信息，这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新的调研方式，真正了解农户和合作社的需求，这对今后科技小院的工作也有帮助，因为有发现问题才能有可能解决问题。

几天调研下来，通经济、管理学院的老师同学们一同调研，我们之间问问题的角度不同，借此机会打开我们思考问题的角度，了解了多学科多方位乡村调研的方法。GCRF项目不仅提供了多学科学习的机会，也由此提升了我们“科技小院+”新模式，为我们科技小院工作的整体推进打下了基础，在此过程中我们也可以感受到自我的成长与进步。

（徐驰，马铃薯产业化国际化路径研究课题组硕士生）

从田野调查中发现解决挑战性问题的思路

参与此次四川农业大学和英国诺丁汉大学合作的全球挑战研究基金（GCRF）项目感到非常幸运，所获得想法、知识和经历，不会随着这个项目结束而结束。在凉山州，马铃薯既是群众口粮，又是贫困群众种植业的主要经济收入来源。经过前期的调研了解到，当地最普遍的马铃薯贮藏方式为散堆，这样会导致堆内部温度太高，贮藏前期马铃薯很快就会发芽，而在水泥地的情况下会加速马铃薯腐烂速度，而且通常农户居住和马铃薯堆放在同一间屋子，烂薯导致损失情况进一步加重且有害于人体健康。而在美姑县我们发现，村民吉拉波日家使用自家编制的筐贮藏马铃薯，提高了整洁度，筐藏的发芽腐烂率要小很多。进一步对此方法进行研究开发，有助于解决凉山州马铃薯散户贮藏问题，有效减少贮藏损失，提高农户收入。

通过参加会议、和武斌老师的交流以及协助撰写结题报告，我认识到了跨学科学习的重要性。我们作为新时代的农业人才不应该仅仅局限在种植专业知识学习、实践的完善，除了本专业知识的学习外，我们不仅要学习推广和宣传的能力多了解一些社会学、经济学、统计学等相关学科的内容，力求成为一个综合型农业人才。

（朱嘉心，马铃薯产业化国际化路径研究课题组硕士生）

学会抓住和理解挑战性问题

我了解到本项目的总体目标，是从四川贫困地区小农生计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挑战或突出问题出发，通过系统收集概括相关领域产业振兴和合作社发展的成功经验和典型案例，为改善

合作社生态系统、农民组织和农村产业振兴，提供新的理论视角和政策建议。明确了目标后，我们在后续进行调研的时候也就有了切入点。

在下乡调研过程中问到了一位老伯，他说道7月上市的马铃薯可以卖到7、8毛的样子，但是8月份就只能卖4、5毛。这便说明马铃薯在早上市方面也是存在一定竞争力的，只是没有农民愿意提前收获，因为村民认为“7月收获的土豆还没熟透，不好吃，而且放在家里几个月就全坏了，不能吃了，但是8月收获的土豆熟透了，好吃，放在家里也不会坏”。这就是问题所在，一方面提前收获会打断马铃薯的块茎膨大期，从而减产；另一方面提前收获会导致马铃薯淀粉含量积累不足，从而影响口感。

那么农民需要如何从农产品中获利呢？这就需要另一种组织的存在，也就是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民专业合作社将农村里的农户组织起来，进行有计划、有规模的生产，并制定统一的生产标准，使各类农产品品质整齐一致，农民专业合作社已经成为推动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在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实施标准化生产、抵御市场风险、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促进农村和谐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进行调研的过程中，我学会了很多新的关于社会学的知识，跟农学这种专业不一样的地方在于，社会学更多的注重理论学术，探究的是一个案例成功或者失败背后隐含或者代表的一种规律，这是我们没有的一种思维方式。渐渐的我也明白了，如果能够成功的研究农民在马铃薯合作社中参与情况，分析农民如何从马铃薯合作社中受益，那么我们作为马铃薯产业发展这个角度也就能更好为祖国的乡村振兴事业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廖倩，马铃薯产业化国际化路径研究课题组硕士生）

如何做好项目田野调研工作

自去年参加武斌老师主持的英国诺丁汉大学——四川农业大学 GCRF 科研项目以来，通过实地调研、田野调查、会议研讨、报告撰写等方式，我在调查方法、科研思维、研究素养与写作能力等多个方面得到了锻炼、启发、收获与提升。

1. **调查前期——综合选取最优调研点。**这些实践教会了我要做好调研选点的前期准备，以雅安市汉源县作为田野调查点的选取为例，要做好以下考虑：

- 与研究主题高度相关的区域。汉源县是远近闻名的农业大县，是全省现代农业示范县和中国甜樱桃之乡，农业产业规模庞大，特别是甜樱桃、苹果等水果产业发展势头良好，相应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较多，发展状况良好，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和调查意义；

- 具有创新独到之处的研究对象。近年来汉源县在农业发展上探索力度较大，先后实行“互联网+合作社”电商发展模式、“汉源红”区域公共平台协会以及合作社参与扶贫项目等创新方式方法，具备一定的学术研究价值；
 - 选取安全、有效的调研点。汉源县当地有校友担任农业主管领导，能够提供一定的内部资料和经验之谈，利于田野调查的深入开展。
2. **调查中期——实地走访中的经验与方法。**要避免在调查过程中走马观花和狭隘地理解调研主题。以凉山布拖县的调查为例，主要收获的经验与技巧包括：
- 调研主题要深入：围绕合作社内部环境——合作社组织的发展壮大需要怎样的领导人、管理经验、运营技巧和发展机制，合作社外部环境——当地政府给予了怎样的支持和鼓励政策、政府在农民专业合作社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角色转换和作用等多角度、多方位、全覆盖的问题深入考察；
 - 调研内容要拓宽：这次调研中课题组不仅仅局限于政府相关的目标问题，而是围绕合作社领导人成长经历、不同阶段发展特点以及面临的问题，综合考察和分析，合作社发展到底需要一个怎样的生态环境；
 - 注重交流的方式方法：调查中老师教导我们要注重对话的平等性，不以高高在上的姿态和空中楼阁式的提问来询问对象，而是以朋辈式、引导式的方式来谈话，从谈话中发现问题，从问题中引出其中逻辑，引导其不断通过聊天透露真实想法和看法，在做好记录的同时归列出核心要点和新问题用于后期研究。
3. **调查后期——整理、归纳、总结与研讨。**调研结束后，在后期的整理和总结中，通过与武斌老师的三次对话指导博客撰写，一次线上学术沙龙研讨会，多次线下课题研究会议，我对《政府政策环境与农民合作社的可持续发展研究》这一研究主题有了更深入的理解，明白了农民合作社组织发展的生命周期以及特征，通过搜寻合作社典型案例，分析政府在农民专业合作社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角色转换和作用，进而揭示政府政策环境对于农民合作社组织发展的意义和影响，提出营造外部发展环境，打破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瓶颈等相应政策建议。在这些学习和研究过程中，我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收获和提高：辩证看待问题、从现实挑战性问题提出科学研究问题，从田野调查数据中筛选提炼科学证据信息的处理能力，在此基础上提炼合作社发展经验和发展模式的总结能力，撰写课题报告、博客、总结等材料的写作能力等。

（罗磊，合作社政策环境演变与政府介入研究课题组硕士生）

发展以社会实践导向的科研职业

作为一个大学三年级的学生，我参与本项目有一些粗浅的感悟。从今年暑假开始，我多次参与到了项目组与武老师的视频会议，有 GCRF 成员参加的大会议，学术分享沙龙，也有只针对于我们项目组的小会。作为一个科研小白，曾经我总是会觉得科研这个词听起来非常的高大上，想象中也只将“科研”狭隘的框在了一个个实验室中，认为只有自然科学类的才能叫做科研。现在我对科研这个词有了不同的理解：真正做出成果的学者都是付出了非常多时间久了在田野调研中，尤其是人文类的研究，研究方法往往要采取问卷调查和实地访谈相结合，这些不是一个实验室能解决的问题，需要前期大量的资料收集，筛选样本，联系落实到每一个受访者，再理出清晰的访谈框架，而后要真刀真枪的与受访者沟通。访谈中，不能刻意的收集到所有自己想要的信息，需要用开放的心态，听取受访者讲一些你没想到的信息，汇集后再进行分析，得出研究结论。这一套的研究方法虽然传统，但是很有效，而且要真正的做好，需要一次又一次不断深入社会，磨练自己的技巧，提升自己的能力的，要练就好这一身本领，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这段时间项目的参与让我更加坚定了读研的想法，因为我看到了自己有更多的可能性与可塑性，希望未来能在科研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邓碧旖，乡村旅游合作社发展路径研究课题组本科生）

如何从现实挑战性问题出发，发展个人的毕业论文

很荣幸能够参加 GCRF 项目，我觉得我成长了许多，以下是我几点体会。

首先是“什么是好的研究”。作为一名研究生一年级的学生，最初我是迷茫的。上学期我们进行了研究生研讨班学习，内容是关于后续研究的选题。在看了一些论文，绞尽脑汁的去选择视角，选择变量，决定去研究社会资本对合作社成员的参与行为的影响。讨论时当然被老师建议说没有新意，缺少研究价值。后来多次修改我也没有好的思路。所以到底研究目的是什么？什么是好的研究？通过这段时间的学习，我想我大概有了一些答案。我们做研究，可以根据前人的研究，或者现有的问题去解决问题；或者我们可以去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亦或者即使我们没有提出确切的问题，但是我们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议题，别人能接着去研究，这样的研究都是非常有价值的。但是像我之前光坐在自习室，为了写论文而写论文是做不出好的研究的。

第二是关于选题。能有一个好的选题是成功的关键，怎么确定选题，之前我的思路一直停留在，通过文献学习，去找研究空隙，建立新的模型，以理论研究为主导。但是这样可能会使

得我们的研究问题可能并不是真问题。我印象非常深刻，在我第一次和武老师交流的时候，他问了我一个问题。为什么现在要乡村振兴？在交谈之后我第一次有了一个宏观的认识，促进城乡再平衡。因此有了两个问题：即城市的人怎么到乡下去？钱怎么去到乡下？这也奠定了我现在研究的核心问题：乡村人才振兴。在有了大方向之后，与多看论文相反的是，武老师建议说先不要扎进论文里面去，而是去看看报道，找找乡村人才振兴的案例，在这个过程中，我又发现了，现在有三类乡村人才振兴的途径，本地人才培养，返乡回流以及外部社会资本的进入。再结合具体背景信息，我们最终确定了去研究返乡创业者这一群体。那返乡创业者我们需要研究什么呢？这时候我们就去找研究空隙了，有许多学者关注了返乡创业者创业过程中的组织模式，技术模式。但是关注起步问题的就很少了，因此我们确定去研究返乡创业者起步问题。通过此学习，我想说，理论学习是非常重要的，任何一个好的研究都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的。但是我们不能只关注研究基础，而不去观察现有的实际问题，这样可能就本末倒置，很难找到有意义的研究选题。

第三，关于论文计划。从确定题目之后我就开始着手写论文计划，一开始我也没有认识到论文计划的重要性，就觉得写一个差不多的，就赶快找研究对象赶快进行下一个步骤进行调研。进行访谈。但是在第二稿写论文计划的时候就出现问题了，通过与老师的交流就发现我现在的整体思路都偏了，我们是以社会资本为研究视角去解决乡村人才振兴的问题，但是我却落脚在了返乡创业者起步过程中的社会资本。在老师的指导下，我重新调整了思路，抓紧了真正要研究的问题。因此我觉得在进行调研，论文写作之前，写一份思路清楚的论文计划是非常必要，且至关重要的，这可以让我们在之后的研究中，始终能把握准研究问题。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廖露，乡村旅游合作社发展路径研究课题组硕士生）

参与乡村旅游项目调研的体会

作为一名大三的旅游管理系的学生，我以前并没有接触过科研。在我最初的概念里，写论文的过程就是先看一些和自己专业相关的论文，然后寻找还未解决的问题进行研究，最后写成一篇论文交差就可以了。但我当时不明白问题很多：比如未解决的问题就值得研究吗？什么又是好的研究？我们写的论文有什么价值？通过这段时间的学习，我对上述问题有了新的理解：写论文并不是纸上谈兵，为写论文而写论文是没有意义的。在写论文的过程中，需要理清自己的逻辑和真正想要研究的问题，反复追问自己，围绕主题不能动摇。同时在写论文的过程当

中，要坚信自己研究的问题是有意义和价值的，能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依据，这样才有动力继续做下去。

其次是关于选题。我以前认为选题就是看专业相关文献然后根据文献来找有意思的题目进行研究。但是参加了几次会议和学术沙龙后，我的观念发生了一些转变。在第一次的学术沙龙里，有一篇参考文献是一位北大学长写的博士论文，题目是为什么开复印店和打印店的都是湖南人，内容深入浅出，读来一点也不枯燥，而且访谈和案例贯穿其中，很有说服力。我当时的感觉是这篇文章跟其他的论文不太像，其他的论文看起来有一些深奥，这一篇却让人兴致盎然。现在想来大概是选题的原因，学长从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出发，选择了很有意思的题目进行研究，以小见大，从打印店老板的籍贯窥见了中国打印行业的发展史。同时武老师在会议中也反复强调，选题一定要从现实问题出发，题目的选择一定是以问题为导向的，否则理论再天花乱坠，没有落到实处都只是浮云。

最后是关于访谈。以前我只是对半结构访谈和深度访谈有一些粗略的了解。但旁听和记录了几次武老师线上访谈之后，我的体会更加深刻了。原来我的问题是：访谈对象怎么找？如果 he 不想理你怎么办？武老师的回答是，首先是找到你与受访者共同感兴趣的话题，建立起双方互信关系，这样才能得到受访者的积极配合，不仅访谈目标能够实现，而且可能会有意外的收获或研究发现。下来的问题，就是要坚信自己研究的问题有价值，就应该能在当地很快找到帮助或配合你访谈的人了。

我们这次论文的主题是研究藏族返乡创业青年的创业轨迹，希望通过整理案例找出可以借鉴和推广的创业模式。在几次武老师与访谈对象的对话中，我都受益匪浅。首先要有分寸地说明来意，既不冒犯也不多余，接着围绕主题抛出问题，顺着访谈对象的思路进行，并且在偏题时适当往回拉，注意深挖他的背景和经历，不能一味机械地照着提纲复读。

（林心怡，乡村旅游合作社发展路径研究课题组硕士生）

6 主要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项目作为英国诺丁汉大学全球挑战基金资助的试验示范项目，其总目标是基于中国特别是四川合作社发展的探索实践，理解贫困地区合作社生态系统的构成及其影响；通过建构利益相关者间合作平台，共同探讨改善合作社生态系统、实现产业振兴和农村可持续发展的创新思路、路径和政策建议；强化诺丁汉大学同中国相关高校、机构、组织之间研究和人才培养合作。

围绕上述目标，本报告第 3、4、5 章已分别从研究发现、社会影响和学生能力培养三个方面，总结了本项目所取得的成果以及未来努力方向。作为本报告的结论部分，本章进一步概括研究发现、主要成果及其存在的不足，并基于我们的研究发现提出修改的政策建议，供相关部门、组织、机构和团体参考。

6.1 主要结论

就本项目的研究目标而言，基于田野调查和案例分析基础上的形成 11 篇学术论文，可以从中概括出如下带共同性的研究发现或结论：

1. 贫困地区合作社发展研究不能从西方社会合作社发展的成功经验及其所形成的合作社原理出发，采取排斥政府介入的消极态度，而应拓展研究视角，把合作社研究纳入贫困地区扶贫和农村可持续发展的大背景下，全面考虑影响当地产业振兴、合作社发展和小农参与的诸多因素和条件，从而客观地考虑外部介入（包括政府介入）在当地合作社发展中的作用。因此，本报告提出，贫困地区合作社研究应当把合作社发展视为当地农村可持续发展的手段和过程的一部分，强调合作社发展与当地主导或优势特色产业（产品）发展的不可分割性，进而理解政府参与和支持的必要性，尊重、引导和逐步激发农民的合作意愿，从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个方面，探索二者间相互结合、可持续发展的路径和动力机制。
2. 鉴于贫困地区地理资源、生态环境、经济发展、社会文化系统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合作社研究有必要引入一个“合作社生态系统”的概念，以便充分考虑各类环境因素、条件对当地农民合作社发展的制约性，理解合作社发展路径及其动力机制的多样性。为此，本报告的所有学术论文均应用生态系统的理论视角，围绕不同地区、行业和社会群体所面临的挑战性问题，观察不同类型合作社生态系统的起源、特征、作用、过程及其后果，尝试概括其系统构成要素、维度和指标体系，期望能对贫困地区合作社和农村发展研究提供方法论的借鉴和启发。

3. 合作社生态系统的理论价值，在于为全面、客观、深入地理解、分析和解释贫困地区合作社发展的成功经验或失败教训，提供了方法论的依据，因为任何一种成功的合作社发展模式的背后都是由若干或一组关键因素和条件决定的，有其成长的边界条件和初始条件，需要通过生态系统思维来把握和分析。本报告的研究发现，有助于理解有利于合作社发展的生态环境的构成及其特征，明确不同利益相关者在建构和维系此类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为促进本地区合作社可持续发展和创新模式的扩散提供理论依据。
4. 贫困地区农村合作社发展和产业振兴离不开外部介入，以便克服关键资源特别是人才、技术和资金短缺的束缚。在这个意义上，外部介入是合作社生态系统中的最关键的因素，决定了合作社生态系统的性质及其合作社发展的边界和初始条件。鉴于中国的国情和非政府组织不发达的实际情况，贫困地区合作社发展中形成政府主导的合作社生态系统有其合理性，但政府主导并不是唯一的生态系统，且其作用的发挥受生态系统其它因素的制约。本报告的实证研究表明，除了政府主导的生态系统外，还有非政府组织主导的（友成基金会案例）、高校嵌入式的（如“专家大院”、“科技小院”）和城市志愿者发起的合作社生态系统。从合作社生态系统角度，有助于概括中国贫困地区农村发展，特别是近5年来“精准扶贫”、全社会参与对贫困地区合作社发展和农民组织赋能方面的经验，为本地区下一阶段的乡村振兴和农村可持续发展研究提供理论依据。
5. 针对合作社研究中争议较大的要不要政府介入和政府如何介入的问题，报告中提供了多个案例研究，既有政府直接出面组织建立合作社，也有政府积极配合其它组织或个人发展合作社；既有宏观政策鼓励和财政扶持政策，又有微观直接组建和任命合作社领导人。无论何种形式参与，贫困地区政府都是合作社生态系统中的一个重要或关键性因素这一事实不可否定。从生态系统角度来看，任何忽略政府介入因素来研究贫困地区合作社发展规律性，或过分扩大政府介入而忽略其它因素、组织作用的研究，都存在着方法论方面的缺陷。
6. 反映四川省和其它贫困地区合作社发展、产业振兴的最新发展和新鲜经验，本报告的研究范围覆盖不同产业（如：主粮生产、蜂蜜、水果、马铃薯、乡村旅游、电子商务等），合作社发展的关键问题（如：土地流转、金融信贷、人才培养、科技服务），不同少数民族地区（如：四川藏区、彝族、瑶族等），不同群体（如：妇女赋能、大学生返乡创业）和不同方式的外部介入（如：地方政府直接参与、社会组织技能培训、城市志愿者嵌入、高校的“科技小院”与“专家大院”等），这不仅说明合作社生态系统概念框架的方法论价值，而且为相关领域的深化学术研究和理论发展提供了参考文献，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7. 本项目研究的贡献并不局限于中国贫困地区合作社和经济社会发展研究，而且对探索从第三世界挑战性问题出发的跨学科、全方位和利益相关主体参与的学术研究具有方法论方面的启示意义。这是因为，只有生态系统概念才能最大程度的吸纳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不同专业的研究范式，也便于吸收和总结不同利益相关者（包括普通小农群体）的声音、诉求、尤其是经常被学术界忽略的本土知识和草根创新经验。
8. 由于本项目探索试验性质和全球新冠疫情影响，从研究设计、田野调查到文献梳理和理论概括，均存在明显的缺陷和不足，希望本报告的发表能对我们进一步推敲和完善合作社生态系统概念、发展数据分析结果，进而提高学术文章的质量，起到积极的作用。

就本项目社会影响目标而言，本报告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首先，从贫困地区发展中所面临的挑战性问题出发，才能有效地吸引相关政府部门、企业家、合作社领导人和非政府组织的项目参与和积极配合，为搭建相互信任、有效交流、密切合作的创新平台提供坚实的基础，为解决当地的挑战性问题提供新的思路和共同努力的方向、路径。本项目的5篇社会影响报告，分别从四川和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特色和主导产业（凉山州马铃薯、阿坝高端蜂蜜、藏区乡村旅游、生态农业）和挑战性问题（如产业化、人才短缺、观念落后和内生动力不足问题）出发，探索了特色产品产业化、国际化和可持续发展的条件、路径，以及英国和诺丁汉大学在其中可扮演的角色。

其次，贫困地区挑战性问题的解决不是单纯的技术、经济、管理问题，也不是靠一部门、企业和研究机构能够解决的，它需要多学科（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工程技术和管理学科）、多主体（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农工商企业、村集体和合作社领导人以及基层干部群众）通过合适的平台，充分交流、有效沟通，在此基础上发展出具有创新性、可操作性、兼顾不同主体利益、可持续性的发展愿景及其合作线路图，为下一步各方相向而行提供指南，也为今后观察测量本项目的社会影响提供依据。在这方面，本项目的成功成果主要体现在：1）基于布拖马铃薯科技小院的已有基础，拓展了贫困地区科技小院的扶贫功能，形成“科技小院+”的模式，为社会科学利用“科技小院”平台参与以挑战性问题和产业化发展为导向的跨学科研究和服务，提供了基础和平台；2）应用“科技小院+”模式，成功创建邛崃蠡鑫蜜蜂科技小院，并对四川省其它8个科技小院的建立及其功能定位起到了积极的影响，形成模式的扩散效应；3）围绕制约不同产业领域（如马铃薯、高端蜂蜜、乡村旅游、生态农业）发展的突出问题，组织跨学科综合考察和同利益相关者的交流对话，明确了各领域未来发展方向、合作平台参与方的

共同目标及其发展路线图，并以考察报告、项目申请和合作意向纪要的方式，提交四川省政府和相关组织部门，为下一步组织实施打下了基础。

第三，本项目社会影响的突出贡献，在于明确指出了社会创新和社会组织/企业对于解决挑战性问题和产业化发展的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and 角色。它不仅体现在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的最大挑战和短板，是缺少小农的声音、参与和内生动力、内在潜力的有效挖掘利用，特别需要通过强化社会创新和社会企业家的参与加以弥补，进而形成自下而上的发展同自上而下的干预之间的有机结合。同等重要的是社会组织在对小农和弱势群体（如农村妇女）赋能赋权、转变观念、技能培训和草根企业家成长方面的特殊贡献，为边缘贫困地区农村社区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在这方面，本项目通过发展同友成社会企业家扶贫基金会、丹巴云和森林学校、蟲鑫蜜蜂合作社、碧绿源等公益组织和社会企业的合作，为创建有利于贫困地区产业化创新的社会生态系统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试验示范平台。

第四，国际化是本项目的多个领域社会影响中的共同要素，它为发展和强化中英两国间围绕本地区优质、特色农产品/服务（如马铃薯种薯生产、高端蜂蜜、乡村旅游、有机农业）出口方面的合作，实现双方互利共赢和加速本地区特色产品产业化、合作社发展和农民收入增长等方面，均匀画了清晰明确的愿景和路线图。进一步，本项目揭示了英国相关企业、公司和部门参与中国西部特别是西南贫困地区乡村振兴、绿色农业和乡村旅游等方面合作的思路 and 具体案例，有助于进一步发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和中国政府“一带一路”战略的对接渠道和机制，也为中英两国正在进行的有机农业、食品安全标准和世界气候大会等领域的合作项目，提供了可供利用的试验示范基地和案例支撑。

最后，本项目搭建了一个跨专业、跨高校、跨国界的大学生农村创新创业、可持续发展合作平台，涉及诺丁汉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四川农业大学和宁波诺丁汉大学，通过友成基金会和丹巴森林学校的参与，围绕四川乡村旅游和大熊猫保护区农村社区发展已达成合作意向，待全球新冠疫情结束后，即可组织实施。

就本项目学生能力发展目标而言，本报告可以得出如下结论：首先，通过五个项目课题组的学术讨论、定期组织研究方法论沙龙、共同组织线上线下田野调研和联合指导学生学位论文的方式，本项目为诺丁汉大学同四川农业大学和中国农业大学多个学院、不同专业、不同层次上百名学生参与学术研究和社会影响实践提供了机会，也为进一步发展省校合作（四川省-诺丁汉大学）合作、校校合作（诺丁汉大学-四川农业大学，诺丁汉大学-中国农业大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其次，同学生项目参与的渠道和机会相匹配，本项目学术能力发展的四个方面的目标（挑战性问题导向、跨学科思维、跨界交流能力、科研创新能力）被证明是合适的和可行的，已得到大多数参与学生的认可和接受，并体现在他们在十个具体问题上的看法和评价，说明本项目学生能力发展目标已成功实现，并为今后围绕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和英国挑战研究基金项目高校学生的参与和组织，通过了设计依据和案例参考。

再次，以挑战性问题为导向的研究和方法论训练对参与学生影响和冲击最大，有助于他们改变理论脱离实际的思维定式，学会倾听和理解边缘小农的所面临的挑战和限制，并通过同利益相关者的交流，发现本土知识和草根创新的对解决当地挑战性问题所做出的贡献，进而拓展他们的视野和知识的来源。为此，参与学生对以挑战性问题为核心的能力发展目标的研究和社会实践活动，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并给予高度的评价，也为农业高等教育系统的改革提供了新的思路 and 案例参考。

最后，本项目所搭建的以解决挑战性问题为目的的、利益相关者参与的平台，对于参与学生发展跨学科、跨界交流能力作用明显，得到了参与学生较高的评价，也为发展和强化大学与社会的交流互动，鼓励大学生、研究生发展以贫困地区的社区发展为主题的学术研究和社会创新实践活动，提供了案例参考。

6.2 政策建议

基于研究发现，本报告特提出如下政策建议供本项目的利益相关方参考。就中国的相关部门、企业、机构、社团和媒体而言，本报告的政策建议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 应着力于以小农赋能赋权的核心、以发展本地区具有资源和市场比较优势的特色产业发展为主线的合作社生态系统和网络平台建设，创造有利于小农之间合作共赢的社会舆论、资源匹配、多个利益相关者相向而行的环境条件。
2. 地方政府应着力于启动、创造和完善有利于本地区合作社发展的生态系统建设，既要积极参与、有所作为，又要避免过度介入、盲目干预，善于调动可利用的资源，把握干预的节奏、力度。在这方面，黑水县政府引入发达地区明星合作社来发展当地蜜蜂产业和合作社的做法，值得借鉴。
3. 应用合作社生态系统概念，进一步总结近 5 年来合作社扶贫的成功案例，揭示政府介入成功的条件和失败的教训，发展出一个适用于贫困地区政府介入的指标体系和系统管理软件。

4. 应大力提倡非政府组织、高校和研究机构、城市志愿者团体参与乡村振兴和合作社发展，并为此提供政策和政府财力支持，创造更为宽松的合作社生态系统环境。

对国际社会而言，中国近 5 年来政府主导、全社会参与的大规模扶贫干预，不应该用“中国特殊论”加以忽略，或以违反“合作社原理/原则”为由予以排斥。本报告以大量客观和较为深入的案例分析，揭示了创造合作社生态系统的重要性，对解决第三世界“小农”赋能赋权这一挑战性问题，促进农村扶贫帮困、可持续发展等方面，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就发展中英两国商贸、科技、教育和人文领域的交流与合作而言，本报告有如下政策建议：

1. 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和“一带一路”战略目标的对接上，建立一个中英农村发展创新研究合作网络，以便客观、系统地总结中国西部地区政府主导、全社会参与的扶贫模式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启示意义，促进中国、英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围绕食品安全、有机农业、乡村旅游、合作社发展等多领域发展研究合作，扩大中英两国在第三世界农村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发言权和影响力。
2. 在中国西南部建立若干中英合作有机农业、特色农业、乡村旅游试验示范特区，共同探索生态农业产业化、国际化和合作社同步、协调发展的路径及其机制，引领本地区乡村振兴和可持续发展，也服务于第三世界农村合作社领导人和企业家培训。
3. 借鉴和总结全球挑战研究基金项目经验，在中英两国牛顿合作基金和其它双边研究项目合作中，增加跨学科、问题导向和用户参与的内容，以便更好地服务于乡村振兴和可持续发展的人才培养。

7 附录

7.1 诺丁汉大学-四川农业大学全球挑战研究基金项目团队简介

诺大-川农大全球挑战研究基金项目总负责人武斌博士

武斌博士系英国诺丁汉大学商学院创新创业中心高级研究员，拥有物理学、哲学、人文地理学学位和跨学科研究项目和管理经验，曾被多个国际组织、欧盟、英国政府聘为顾问，主持和承担相关研究项目或基金会研究课题，主编出版了6部有关中国农村可持续发展，农民技术创新以及高等改革的英文著作，曾担任过知名国际学术期刊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Business and Society*, *Journal of Integrative Agriculture* 的客座编辑，《华人研究国际学报》的联合主编。目前，他负责协调诺丁汉大学同中国重点高校（中国农业大学，四川农业大学）、研究机构（中国社科院农发所、中国农科院信息所）和非政府组织（友成社会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在乡村振兴和农村可持续发展领域的研究合作、项目申请、青年教师和留学生的联合培养工作。他目前负责诺丁汉大学全球挑战研究基金试验示范项目：中国贫困地区的合作社生态系统与小农赋能—四川案例研究。

合作社政策环境演变与政府介入研究课题组负责人傅新红教授

傅新红教授，本项目执行负责人，四川农业大学管理学院院长。她是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四川省人民政府研究室咨询专家、中国农业技术经济学会常务理事等。从事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农村合作经济等教学科研工作。主持和主研国家级、省部级和国际项目80多项。公开发表学术论文160余篇，其中SSCI、SCI、CSSCI、EI等收录论文60余篇，核心刊物70余篇。出版专著11部。主编、副主编规划教材9部。获得科研奖项21项，其中省部级二等奖2项、三等奖6项；5份成果专报获多个省级领导批示。培养毕业博士6名，硕士78名。

四川贫困地区马铃薯产业化国际化路径研究课题组负责人王西瑶教授

王西瑶，四川农业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全国科技助力精准扶贫先进个人，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四川布拖马铃薯科技小院首席专家，美国爱达荷大学访问学者，获四川省科技进步一等奖、中国农业农村部中华农业科技奖、省教学成果特等奖

等。指导“小平科技创新团队”等大学生创新创业团队。四川省农技协副理事长，国家马铃薯产业科技创新联盟常务理事。农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

合作社领导人成长路径与环境条件研究课题组负责人张社梅教授

张社梅教授是四川农业大学管理学院农林经济管理系主任。她是四川省天府万人计划入选者、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四川省委首批新型智库“农业农村经济改革发展研究智库”专家、中国蜂业经济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从事科研教学工作10余年，致力于农业产业组织发展、农业技术经济等领域的科研教学工作。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蜜蜂产业技术体系子项等省部级课题30余项，获省部级奖励4项，出版著作6部，发表论文100余篇（其中SSCI、CSCD收录48篇），受邀在国际、国内会议上做学术报告30余场，撰写的政策建议稿5份受省级领导批示。培养硕博士20余名。

中国农业大学国际发展与全球农业学院/人文与发展学院齐顾波教授

齐顾波，中国农业大学国际发展与全球农业学院/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96年于中国农业大学获农业经济学博士，在发展导向的国际农业研究中心，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等机构做过高级访问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为资源管理与可持续农业，农村技术与制度创新，中国与非洲的农业合作，国际发展合作。承担多项国内外研究课题，发表相关论文几十篇，论著多部。研究区域涉及中国大部分省区，以及亚洲、非洲的十多个国家。与中国农业农村部，加拿大国际发展研究中心，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国际农业发展基金，瑞士发展合作署，英国国际环境发展研究院等机构开展多项综合农业发展，以农民为中心的农业技术发展，社区为基础的资源管理，应对气候变化的农业生产策略，循环农业等研究。在中国科技部、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国际扶贫中心支持下，与英国、巴西、非洲各国的研究机构合作，开展农业援助的国际比较研究，中国与坦桑尼亚的农业技术创新合作的行动研究，以及带路减贫国际交流合作机制

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合作社发展路径研究课题组负责人耿宝江博士

耿宝江博士，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四川农业大学旅游学院旅游管理系主任；四川省人才交流中心双创导师。研究方向为乡村旅游与社区发展，目前已出版著作3部，公开发表论文10余篇，主持或参与乡村旅游规划、森林公园规划、乡村振兴规划等课题项目30余项。

农村合作金融生态变化与合作社金融研究课题组负责人丁昭博士

丁昭，四川江油市人，四川农业大学经济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国际农业经济学家学会 (IAAE) 会员、美国农业与应用经济学会 (AAEA) 会员、四川省金融学会会员，担任 Agricultural Economics、China Agricultural Economic Review、International Food and Agribusiness Management Review 期刊审稿人。

学习经历：2018 年毕业于德国基尔大学，获农业经济学博士学位；2014 年毕业于四川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获管理学硕士学位；2011 年本科毕业于四川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获经济学学士学位。研究方向包括：普惠金融、行为经济与金融。研究涉及发展经济学、金融学、福利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和消费经济学等多元学科领域。先后参与过多个国家级、省级科研项目，发表多篇 SSCI、SCI 学术论文。

项目团队成员总名单

诺丁汉大学、宁波诺丁汉大学、中国农业大学成员		
1	武斌	诺丁汉大学商学院高级研究员，本项目总负责人
2	Scott McCabe	诺丁汉大学商学院副院长，教授，本项目团队成员
3	陈金华	诺丁汉大学商学院教授，本项目团队成员
4	杨妮	诺丁汉大学生物学院教授，本项目团队成员
5	王仪	宁波诺丁汉大学商学院教授，本项目团队成员
6	齐顾波	中国农业大学全球发展与国际农业学院教授，本项目团队成员
7	牛德梅	本项目助理
8	叶葳	本项目助理
合作社政策环境演变与政府介入研究课题组		
9	傅新红	四川农业大学管理学院教授（课题组负责人）、本项目执行负责人
10	刘宇荧	博士、讲师
11	刘国强	农业经济管理 博士研究生
12	章睿馨	农业经济管理 博士研究生
13	陈吉平	农业管理 硕士研究生
14	向文筠	农业经济管理 硕士研究生
15	罗磊	农业经济管理 硕士研究生
16	廖昱颖	农业管理 硕士研究生
17	乔大宽	农业管理 硕士研究生
18	范娇	农业管理 硕士研究生
19	陈雨诗	农业经济管理 硕士研究生

20	刘子祺	农业管理 硕士研究生
合作社领导人成长路径与环境条件研究课题组		
21	张社梅	四川农业大学管理学院教授（课题组负责人）
22	陈锐	农业经济管理 博士研究生
23	莫经梅	农业经济管理 博士研究生
24	方柯钰	农业经济管理 硕士研究生
25	罗娅	农业管理 硕士研究生
26	梁景智	农业管理 硕士研究生
27	黄悦	农业经济管理 硕士研究生
28	张艳萍	农业管理 硕士研究生
29	龚倩	农林经济管理 本科生
30	邹涵	农林经济管理 本科生
31	李蓝欣	审计学 本科生
32	陈心语	农林经济管理 本科生
33	傅卓颖	农林经济管理 本科生
农村合作金融生态变化与合作社金融研究课题组		
34	丁昭	博士、四川农业大学经济学院讲师（课题组负责人）
35	申云	博士、讲师，四川农业大学经济学院区域经济与金融研究所办公室主任
36	杨道川	农村发展专业 硕士研究生
37	张警晔	农村发展专业 硕士研究生
38	柳媛媛	农村发展专业 硕士研究生
39	洪程程	金融学专业 硕士研究生
40	陈樱汶	农村发展专业 硕士研究生
41	楼宇晴	经济学专业 本科生
42	杨力闻	经济学专业 本科生
43	尤冉	经济学专业 本科生
44	郭洪熙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 本科生
45	段晓莹	投资学专业 本科生
46	陈効莉	金融学专业 本科生
47	何祥	投资学专业 本科生
48	高玉婷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 本科生
49	陈怡西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 本科生
50	龙亭秀	经济学专业 本科生
51	刘夏	投资学专业 本科生
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合作社发展路径研究		
52	耿宝江	副教授（课题组负责人）
53	梁佳	博士、四川农业大学旅游学院会展专业教师
54	彭生刚	都江堰市旅游协会秘书长
55	廖露	旅游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
56	曾丽萍	旅游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
57	郭丹丹	旅游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
58	漆珍麟	旅游管理专业本科生

59	黄静	旅游管理专业本科生
60	邓碧旖	旅游管理专业本科生
61	林心怡	旅游管理专业本科生
62	范诗敏	旅游管理专业本科生
63	张琬娅	旅游管理专业本科生
64	李经珍	旅游管理专业本科生
65	杨婧怡	旅游管理专业本科生
66	陈媛媛	旅游管理专业本科生
67	黄洁	旅游管理专业本科生
四川贫困地区马铃薯产业化国际化路径研究课题组		
68	王西瑶	教授（课题组负责人）
69	彭洁	植物学 博士研究生
70	刘一盛	四川农业大学校外研究导师、成都万春智汇孵化器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71	杨翠芹	副教授
72	余丽萍	讲师
73	邓孟胜	植物学 博士研究生
74	蔡诚诚	植物学 博士研究生
75	杨勇	作物 硕士研究生
76	徐驰	农艺与种业 硕士研究生
77	冉爽	植物学 硕士研究生
78	廖倩	农艺与种业 硕士研究生
79	朱嘉心	农艺与种业 硕士研究生
80	唐梦雪	农艺与种业 硕士研究生
81	张志伟	农艺与种业 硕士研究生

7.2 布拖马铃薯产业化联合考察报告

凉山彝族地区马铃薯产业化是英国诺丁汉大学全球挑战研究基金资助的四川贫困地区合作社发展研究项目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四川省和诺丁汉大学之间 2019 年 11 月成都高层会议确认的 2020 年省-校合作的重点领域。在四川省委组织部和省农业农村厅的大力支持和协调下，诺丁汉大学和四川农业大学组成了马铃薯产业化联合考察团，旨在通过对凉山州样本县——布拖县的实地考察，发现马铃薯产业化发展的动力机制、发展模式、减贫效果，及其马铃薯产业化发展所需要的顶层设计、外部条件和诺丁汉大学的作用。考察团一行 20 余人在诺丁汉大学高级研究员武斌博士、四川农业大学项目协调人傅新红教授和四川农大马铃薯创新团队负责人王西瑶教授的率领下，于 2020 年元月 5-8 日对布拖县进行了为期 3 天的参观走访，涉及马铃薯育种、生产、加工、流通和销售多个环节和布拖科技小院、产业园、示范基地、农民专业合作社和村集体组织，同布拖县政府和相关部门领导、企业家、驻村帮扶干部、村集体和合作社带头及其彝族农户等进行了广泛接触、交流和座谈。

考察团成员一致认为布拖马铃薯产业化发展必须面对和解决四个方面的挑战或问题：一是传统小农的转型问题，需要克服规模小、商品率低、土地流转难的瓶颈；二是彝族农户对新技术的观望、被动接受和依赖政府补贴的态度；三是马铃薯产业链中存在着诸多断环、加工技术缺位、产业组织化程度低、同市场衔接差等问题；四是彝族人才短缺问题突出。

针对上述挑战，本报告提出了布拖马铃薯产业化发展思路，其核心内容是“科技小院+”的发展模式：通过提升布拖马铃薯科技小院的功能定位，建构新型的帮扶合作平台，为村级集体经济和专业合作社发展注入活力；通过英国诺丁汉大学深度介入，实现英国马铃薯公司（James Hutton Ltd）同四川喜玛高科农业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等对接，发展产学研一体化的国际合作平台，实现布拖县乃至四川省马铃薯产业的国际化。具体而言，“科技小院+”的发展模式包含如下四大工程：

1. 科技小院功能提升工程：发展“帮扶干部+科技小院+国际合作+村集体组织”的新模式
2. 帮扶体系的功能优化工程：强化科技小院同帮扶干部之间的横向联系和推广服务功能
3. 全产业链开发工程：从规划、组织、政策多方面延伸马铃薯产业链条，对接国际大市场
4. 领头雁培育工程：发展同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四川农业大学等的战略合作。

考察团认为，围绕四川省马铃薯产业化，四川省和诺丁汉大学之间可以在如下几个方面发展和强化合作：1）技术方面：就马铃薯的风味科学、加工贮藏、新品种开发和梯级良种繁育体系建设等领域开展合作；2）管理科学方面：围绕马铃薯产业链延伸、国际品牌创造、科技小院和帮扶体系的功能优化等问题展开合作；3）产业化带头人的培训培养方面：通过“请进来”、“走出去”、参与式互访的方式，加速智力引进和本土人才的成长。

7.3 黑水蜜蜂产业化考察报告

养蜂业在中国是一项传统优势产业，也是中国最具重要贸易经济效益的特色产业。2000年以来，无论是蜂群饲养量还是蜂产品产量，中国均居世界第一位。据统计，全世界现有蜜蜂近6000万群，中国约占八分之一强；蜂蜜产量中国约占世界总量的30%，出口量约占世界出口量的1/3，从业人员约在30万人。

由于蜂产业具有投入小、见效快、不占地、劳动强度低、从业人群要求不高等特点，在中国的扶贫事业中，蜂产业作为贫困地区绿色发展的一项重要产业被大力推广。四川是中国扶贫攻坚

的重要地区，生物资源丰富，蜜蜂饲养规模居全国第一。目前，四川蜂群总量超过 164 万群，占全国蜂群总量的约 1/6；蜂农 7 万多户，占全国总养蜂人数的 23%。2015 年以来，全省重点开展中蜂产业扶贫工作，已有 50 多个县将中蜂养殖列为扶贫重点产业，中蜂饲养规模近年来快速上升。目前全省中蜂养殖数量已达 93 万群，超过意蜂数量 22 万群；建成养蜂农民专业合作社 509 家，蜂蜜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9 个。2019 年，全省蜂蜜产量 5.5 万吨，蜂产品出口量 1500 多吨，养蜂直接产值 60 亿元左右。

然而，四川蜂产业的资源优势仍未得到充分发挥，表现为大而不强，优质不优价，出口量小（位居全国第 11 位），对贫困地区产业振兴和和贫困农户生计保障的贡献有限，提升空间很大。为了理解贫困地区蜜蜂产业发展的瓶颈，发现当地蜂产业振兴的思路和对策，诺丁汉大学全球挑战研究基金项目与四川农业大学管理学院组成“贫困地区蜜蜂产业化”合作研究团队，希望通过对阿坝州黑水县中蜂产业扶贫项目的诊断、分析，提出政策建议，在多方参与配合下进行试验、示范和推广，为加快贫困地区蜜蜂产业化进程，推动高质量蜂蜜出口英国和欧洲市场，进而带动养蜂合作社的发展和农户的稳定脱贫致富，走出一条新的路子。

本项目 2020 年 3 月启动，受疫情影响，课题组通过电话采访、微信社交软件等，先后与黑水县科学技术和农业畜牧水务局产业负责人王维东副局长、畜牧技术指导农艺师西格基以及长期支持的帮扶机构-邛崃虫鑫养蜂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王顺进行了交流和资料收集。2020 年 6 月 7-8 日，课题组一行 5 人又亲自赴黑水县开展实地调研，通过走访、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召开座谈会等多种方式，全方位了解黑水县蜂产业的基本情况、发展瓶颈、技术需求和发展趋势。

综合考察和分析后，提出以下几点发现。

1. **生产环节粗放、产品产量提升空间大。**黑水县本地蜂农年龄结构老化，文化水平较低，观念落后，很难接受技术更新。蜂业普遍作为家庭副业形式存在，饲养方式传统，生产技术陈旧，管理粗放，甚至缺乏管理。养蜂人员技术水平和产量提升的潜力较大。
2. **加工包装营销环节滞后、严重制约产业升级。**目前，当地已建立养蜂合作社，在养蜂的组织化和对接市场上初步取得了进步，但是产品的初加工仍然比较粗放，卫生环境有待提升；包装设计缺乏，产品规格和档次无法提升，产品质量优势难以发挥。物流成本高，运往大城市物流费用约为平原地区的 4-5 倍，销售半径较小。产品营销宣传仅凭口头描述，缺乏专业营销队伍。
3. **政策资源供求部分错位、资源配置不合理。**按照政策要求，政府通过扶贫项目采购的种蜂和蜂箱等物资仅能用于向贫困户发放，但部分贫困户缺乏养蜂意愿与能力，这一定程度上

造成扶贫资源配置的不合理和浪费。

4. **帮扶机构公益性突出、持续扶贫机制未形成。**参与黑水县扶贫的外部企业通过长期业务接触，与当地现任领导建立信任关系，在贫困帮扶参与中公益性明显超出利益性。且外部企业对当地领导换届后，扶贫事业的持续性抱有怀疑，影响其在当地进一步的产业开发与投入。外部帮扶与当地产业发展之间没有建立长效扶贫共赢机制。
5. **地理交通局限大、环境制约因素多。**首先是冬季恶劣气候突发，温差大，威胁畜禽及作物生存。其次是交通不便限制发展。目前在交通运输部的大力关心支持下，黑水县交通运输条件已经得到了一定改善，但路途的遥远依然影响着包括教育、人才、医疗、经济社会发展等诸多方面的问题。此外，黑水县从农奴社会一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当地语言与外界甚至藏区其他语言不通，对外沟通闭塞，无法吸引外部人力资本。

基于上述发现，我们提出了黑水县蜂产业发展的政策建议。

1. **树立高端直销多元发展理念。**黑水县拥有得天独厚的优美自然环境，且退耕还林后种植作物以中药材为主，高品质药蜜产品特色明显，其产量有限。因此，首先应制定高端化、直销化的商业模式。尽快对产品的特效和营养物质进行鉴定，突出治愈功能优势，瞄准细分市场群体；并尝试建立从生产端直接到消费端的社区支持农业模式，跨越中间商，优质优价才可能实现。其次，依托中蜂繁育基地和周边的药材苗圃、沿河旅游景点，将蜂产业的科普教育、休闲康养、农事体验等多功能融入一体，加快开发。
2. **动态化培育产业链开发主体。**当前阶段，本地产业发展各类人才均较缺乏，在招聘困难的情况下应充分“借力”发展。可采取委托加工、包装设计的办法，请长期帮扶专业机构代理开展后续业务。同时，重点遴选本地年轻人走出去学习，条件成熟后可考虑在当地的蜂产业合作社延伸加工业务，或者与外部公司合作建立股份制企业。与外部帮扶企业的合作，应当注意形成与贫困地区共赢的发展模式，符合市场发展规律，最终减少对公益性的依赖。
3. **积极扶持养蜂合作社不断壮大。**本地合作社作为带动农户、服务农户的重要组织，已经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进一步发展仍然需要在技术服务、对接市场、社区营造三方面下功夫。技术服务上可通过核定蜜源植物，匡算承载能力，提高养蜂户的养殖规模和养蜂能力，挖掘产量潜力。对接市场上要积极学习新媒体新零售的技术手段，除了充分利用天猫、京东等第三方平台外，还要重视抖音、微信群等新型营销模式，建立自己的客户群，不断打响黑水中蜂蜜的品牌。最后，合作社不仅要重视社员的教育，还可以努力搞好社区

营造，通过持续的培训、示范和教育，辐射带动当地其他养蜂户，促进养蜂人改变传统观念，增强现代化技术学习能力，增强对养蜂事业的热爱。

4. **开放提升不断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可借助诺丁汉大学平台，开展高端优质黑水中蜂蜜的营养成分、风味特征进行科学测试鉴定；同英国养蜂学会、蜂产品消费合作社等机构建立联系，打开英国和欧洲市场；同诺丁汉大学商学院、友成社会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四川农大管理学院、邛崃虫鑫养蜂专业合作社联手，对本地区合作社领导人和返乡创业大学生进行培训，加快新型蜂农的成长和产业化升级速度。

附：2020 年 4 月中国蜂蜜出口统计

2020 年 4 月蜂蜜分国别出口统计				
类别名称	数量(吨)	数量同比(%)	金额(万美元)	金额同比(%)
日本	5171.51	289.84	1069.95	292.59
英国	3389.56	144.93	573.20	138.90
沙特阿拉伯	844.95	147.51	167.27	158.96
比利时	730.80	-8.00	107.59	-27.68
西班牙	567.24	39.71	97.57	35.12
波兰	505.24	-36.18	90.77	-32.87
葡萄牙	365.40	20.00	63.03	15.88
澳大利亚	321.30	410.00	63.79	462.07
南非	316.92	8.83	61.59	18.65
德国	308.28	1.24	54.45	-0.88

2020 年 4 月蜂蜜分地区出口统计				
类别名称	数量(吨)	数量同比(%)	金额(万美元)	金额同比(%)
安徽	4284.59	86.35	826.40	86.01
湖北	3137.21	145.99	571.66	159.62
浙江	2124.69	210.24	398.88	189.31
辽宁	1279.30	71.82	223.93	63.18
江苏	968.84	79.40	204.29	94.61
天津	589.86	-12.10	102.15	-15.00
山东	511.76	-29.64	102.72	-25.05
上海	396.82	216.34	64.72	197.29
宁夏	142.10	-21.88	27.64	-29.07
河南	117.74	-100.00	21.90	-100.00
四川	101.54	66.72	20.99	106.78
青海	81.20	-100.00	16.24	-100.00
广西	44.60	-100.00	10.89	-100.00
湖南	40.02	-100.00	8.63	-100.00
吉林	35.11	112.81	12.79	137.48
广东	8.68	-88.90	21.72	12.23

7.4 项目博客发表目录和链接

- [Connecting small farmers to big markets](#)
- [Pathway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via potato industrialisation in China?](#)
- [Rural Revitalisation in China – Dr Bin Wu](#)
- [Empowering potato farmers in rural China](#)